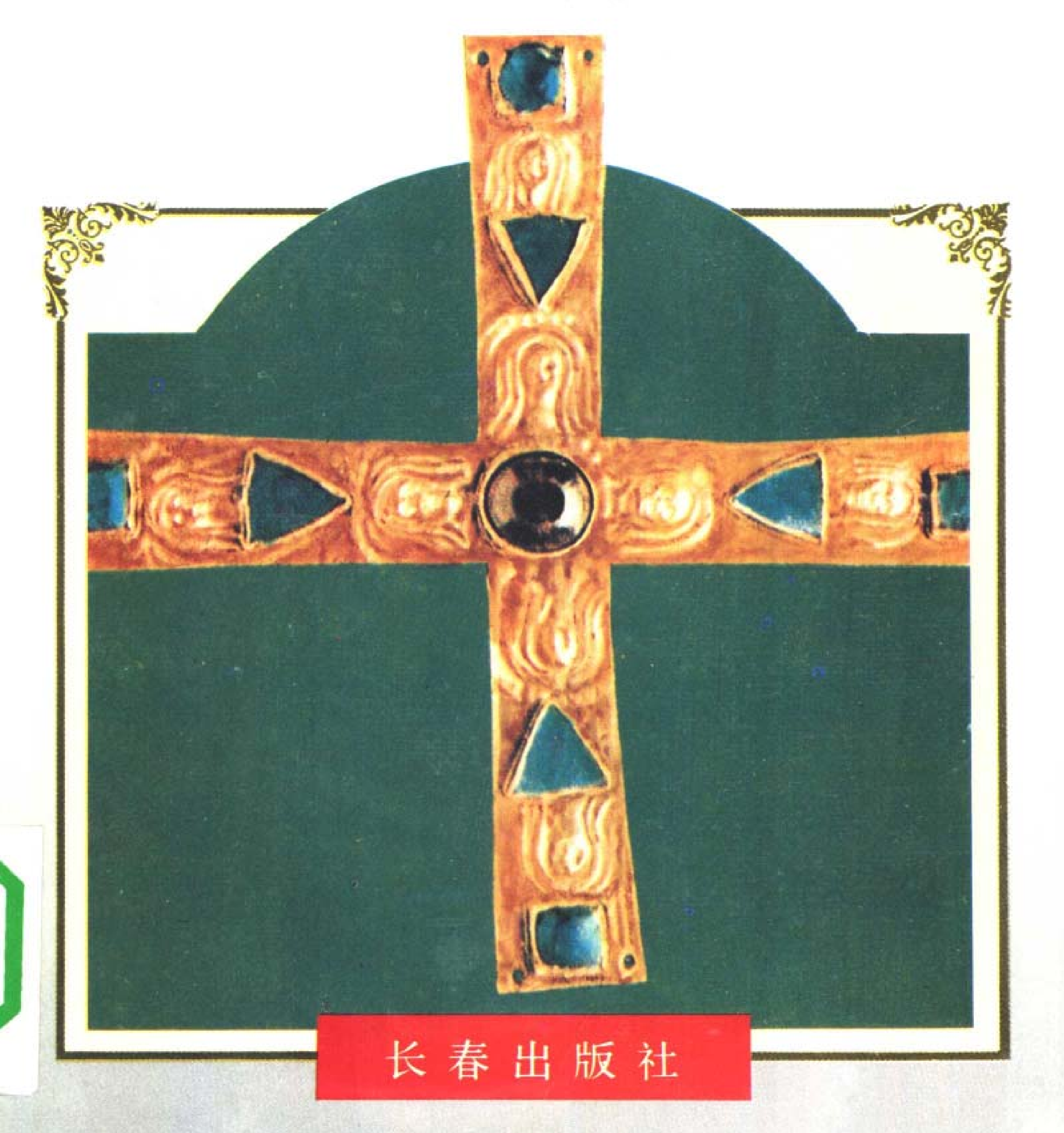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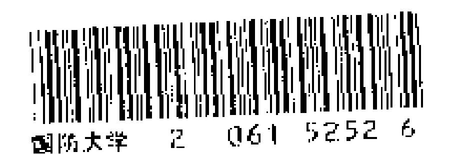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合不上的圣经

——伊甸园的美梦和罪恶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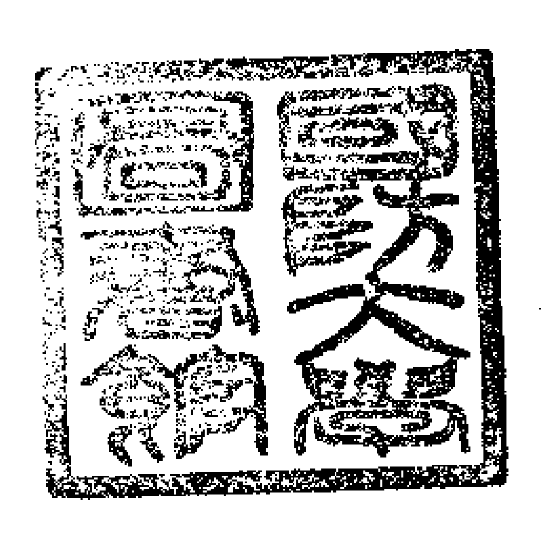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合不上的圣经

——伊甸园的美梦和罪恶

张永春 阴玺 冯晖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合不上的圣经

张永春　阴玺　冯晔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攀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8.7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3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1.0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人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跋涉的骆驼

这是一部因无知和虚幻而弄混了的民族童年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雏形是多么幼稚可笑而又令人敬畏

——题记

神话迷雾中的真实：犹太民族早期史

这是一片形状狭长而地形复杂的地区，平原、旱地、山区、荒芜旷野错落并存；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雨水稀少、物产不丰，资源匮乏。

它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是公元前1223年（或1225年），埃及法老梅尼普塔炫耀战功的碑文中刻记：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的种族并非灭绝。

关于希伯来民族英雄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

出埃及的传说，通常认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12世纪初，腓力斯人入侵这一地区，将之称为巴勒斯坦，直至现在。

它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从考古发现得知，这地方在远古的时期就曾有若干小城镇，并有人按时耕作。但后来因气候变化，常住居民搬走了，又迁来一些游牧部落。他们相互打斗，掠夺别人的牲畜和女人，将自己的强横意志建立在刀剑之上。他们之中，就有后来在世界文明发展中起过伟大作用的希伯来人（即犹太民族）。

遗憾的是，我们对这群人的始祖几乎一无所知，无法弄清他们从哪里来。开始，我们依据的唯一根据是《旧约》。这是一部被传说和神弄得面目全非的著作，我们只能从中找到零散而可靠性很小的史料。后来，随着考古学家们在巴勒斯坦沙漠上的辛勤挖掘，我们积累了日益增多的史料，大致可以理清这个曾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而后来流浪四方的民族的早期经历了。

犹太人最早的祖先大概是住在阿拉伯沙漠上。只是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哪一个世纪离开故居而进入西亚的肥沃平原。我们只知道他们曾经漂泊了数世纪之久，想取得一块自己所有

的土地，但失败了。随后，他们可能在埃及居住过一阵，后来由西奈沙漠侵入被他们称为“上帝应许之地”的巴勒斯坦，与迦南人进行不断的战斗，并逐渐定居下来，建立了国家。另一观点则认为，公元前2000年，希伯来人的祖先哈卑路人由东北方侵入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的一个半游牧部落，历数世纪。

希伯来人占领迦南的时间是公元前1230年，离实行扫罗统治下的王权制（公元前1023年），相隔了两个世纪。《圣经》称这个时代为“士师执政的时代”。

进入迦南时，希伯来人还不是一个民族。后来，它逐步从半游牧的民族社会向民族统一的农业社会过渡，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希伯来人与迦南人、叙利亚人、亚述人、巴比伦人、阿拉伯人都同属于古代的赛姆族，语法结构、词汇都相近。因此，希伯来人与巴勒斯坦的迦南人逐渐同化。在迦南人的先进经济影响下，以色列部落进入农业社会，他们学会修建蓄水池，努力从事沙漠和森林的垦殖工作，以满足对土地的急需。在这种变化过程中，部落首领逐渐富有，形成了贵族

家族的统治。

此时希伯来民族的政治结构，集中表现为宗教联盟，也就是将12个部落团结在宗教周围。他们信奉的唯一部落保护神是上帝耶和华，示罗是他们选择的共同的宗教活动中心，象征上帝同在的柜就保存在这里。每次与异族战斗之前，各部落就在吉甲和示剑两地集会，举行宗教典礼，祈求圣明的上帝保佑他们取胜。然而，正如巴勒斯坦的地形只适合于发展分散的部落制度一样，希伯来人各部落似乎都不关心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因而《圣经》记载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于是，迦南人和腓力斯人的军队便时常出现在希伯来人的领地上，杀人放火，掠夺人口和财产，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最初，犹太人抵抗威胁的办法是组成部落联盟，由被看作是上帝选定的、被赋与上帝智慧、集先知、统帅和救世主三位于一体的士师领导，和入侵者进行战斗。《圣经》的《士师记》中就提到过这个时期许多有名的士师，如俄陀聂、以笏、女先知底波拉及先知耶弗他、参孙、基甸、以利、撒母耳等。必须指出，没有一个士师可以

称为全以色列的领袖，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尚未联合成一个统一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在战斗中几乎是屡战屡败。公元前1050年，在与腓力斯人进行的亚弗之战中，他们甚至丧失了上帝的圣物——约柜。

这是全民族的灾难。

这一不幸说明，为了抵抗腓力斯人，以色列人必须有一个共同能控制全民族的权力中心。于是，各部落首领不断扩大权力，由此加速了国家的形成。从公元前11世纪末叶起，以色列部落联盟在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统治下（公元前1020～930年）形成统一王国，通称以色列王国时期。

关于这一转折时期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在《圣经》中有关扫罗登基的记述中看到一些。

《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向士师撒母耳请求："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象列国一样。"

可是，撒母耳却告诫百姓，国王的统治是危险的，他说：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

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头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的最好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百姓对这些危险置之不理。撒母耳无奈，便给百姓找了一个合适的王。

他就是扫罗。

以上就是《圣经》上有关扫罗登基的记录。

扫罗是最小的部落便雅悯中一个名叫基士的农民的儿子。据说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于是，扫罗成了无可争议的国王。他全力投入了反击腓力斯人的斗争并很快取胜，成功地将敌人赶出了以色列人居住的地区，随后，扫罗又向其它邻族，即东西和东南面的摩阿布人、阿蒙人和阿拉米人以及南面的亚玛力人发动了多

次报复性战争，战绩累累。

无疑，扫罗是士师时代的古老部落组织和完善的大卫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人。是他，选择了基比亚作为都城，并利用手中的宗教权力初步统一了各部落。

大卫是犹太部落农民耶西的儿子。还在幼年时，就因在战斗中杀死腓力斯巨人哥利亚而出名。他曾在扫罗军队中担任要职，后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王国。扫罗王死后，大卫经过长期斗争，夺取了王位，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

大卫英勇善战。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击败了腓力斯人、阿蒙人和摩阿布人；征服了亚玛力人，并吞并了以土买；同腓尼基人，其中包括推罗王，建立了同盟。他使大部分地中海沿岸地区成为向他纳贡的藩属并迫使邻国承认它对从外约旦河到东面阿拉伯沙漠的统治要求。

大卫将首都设在耶路撒冷，即大卫城。他将以色列人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并为它设计了一座华丽的圣殿。

从那时起，这座和平的城市耶路撒冷，即大卫城，就成了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和向往的圣

地。今天，这座城市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应归功于它在犹太史上所占有的特殊地位。

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公元前 970～930 年）。

在他统治时期，王国从未受过战争的蹂躏。虽然他没有给以色列增添新的疆土，可是却通过不一般的外交途径确保了以色列在当时毗邻的大国中享有平等地位。他用联姻建立起来的友好同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还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物质利益。此外，所罗门在具有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城市如埃及至大马士革一线上的夏索和米吉多，通往红海商路的咽喉塔马尔以及守卫耶路撒冷以南地区的要地哈兰，构筑了防御工事。

他还建立了一支航海舰队，进行贸易活动，使他的国家变成了四方贸易的主要转运地。财源滚滚而来。

这时，近东的国际环境也十分垂青于所罗门。尼罗河西岸的强大帝国埃及日薄西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四分五裂，无力染指以色列王的领地。

以色列王国如日中天。大批新的城市和村

镇涌现；人口增加了一倍，总数达到80万。后人总结到："王国经过所罗门的手而得到了巩固。"

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统治时期，合称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自这以后，王国一分为二，倍受外族的欺辱，最后不得不流落四方。

王国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社会矛盾的激发和异教的传入。

王国的繁荣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好处。相反，由于君王穷奢极侈，他们被迫过着困苦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所罗门为了支付日益增长的费用，推行了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这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专制君王的铁蹄之下。

同时，与外族日益频繁的交流导致了多神教在王国的流行。当时整个以色列盛行信仰巴力神。王国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被摧毁了。

所罗门死后，王国悲剧性的分裂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征服、杀戮和抢掠。这一年，是伟大的救世主耶稣诞生前930年。

北方各部落建立了以色列国，公推从埃及

流亡归来的耶罗波安为王。而南方的犹太国（亦称犹太王国）仍以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为王，定都耶路撒冷。在两国中，以色列王国版图较大，经济也较发达，而犹太国无论在疆域还是资源方面都不如前者。这两个兄弟国家各自为政，时而结盟，时而交战，互相消耗对方和自己的实力。这是一种毁灭性的作法。因为巴勒斯坦地区虽然资源贫乏，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四周强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不断发生战争。尤为不幸的是，统一的以色列王朝分裂之时，四周又出现了诸大强国。

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公元前 722 年（或 721 年），北部的以色列国为亚述人所灭。136 年后，犹太王国也不可避免地亡国了。

犹太民族辉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下面叙述的，是他们由鲜血、泪水构成的民族屈辱史。

定都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国经历了 19 个王的统治，延续达 200 年之久。耶罗波安和他的继任者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维护王国的生存。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当与不正当的战争，与阿拉米人打、与犹太国打、后来又与亚

述帝国对阵。

不幸的很，在这些以弱抗强的战争中，以色列国很少取胜。到公元前721年，强大的亚述帝国发动了一场总攻击，占领了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从此，北方王国就成了历史的回忆。在遗留至今的铭文中写道，亚述国王萨尔贡以占领“暗利家族的大片土地”和虏走“二万七千二百九十二名以色列人”而得意洋洋。

和它的兄弟[illegible]运气好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它[illegible]比[illegible]的国家，只有便雅悯和犹太两个[illegible]对它的影响小；它可以依赖可靠的[illegible]统和[illegible]定的共同信仰，耶路撒冷的圣殿就[illegible]神[illegible]征；它的地形有利于防守，这使得它成功地抵抗了贪得无厌的埃及人的进攻。

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后，犹太王国“就象一棵被亚述的板斧砍断，枝叶已枯萎了的树木”。而展开的斗争使犹太王国被卷入了世界内部权力角逐的漩涡，无力自拔，被迫沦为大国的附庸，苟延残喘。

公元前7世纪，米堤人、迦勒底人战胜亚述。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军队攻陷亚述首都尼

尼微城，灭掉了亚述帝国。

随后，巴比伦又与埃及展开了无休止的战争。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拉尔美战胜埃及法老尼柯，迫使埃及势力退出亚洲。

失去了埃及保护的犹太王国门户洞开。于是，巴比伦挥兵直入，一举征服了这个国家。但是犹太人并未屈服，举行了一次起义，很快被镇压，傀儡西底家做了十年犹太王国的国王。他最后举行起义，遭到了血腥地屠杀，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遭焚毁。《圣经》上说：他们拿住了王，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他们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又用铜链锁住他，将他带到巴比伦去。犹太王国的王室、祭司、贵族、工匠被带往巴比伦。

这一年，为公元前586年。

犹太王国灭亡了，以色列人开始了“被虏流亡”的时期，直至公元前539年波斯战胜巴比伦为止。

公元前539年到333年间，波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达两个世纪。波斯统治者为了利用以色列人抵抗埃及和新兴的希腊的入侵，释放了一批被巴比伦俘虏的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

并允许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的波斯统治者在诏书中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太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太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愿上帝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都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于是，以色列人在来自民间的宗教领袖“先知”号召下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

公元前 516 年圣殿完工。

公元前 445 年，以色列人尼希米受波斯王之命回耶路撒冷修建城墙，并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

公元前 397 年，波斯王又派犹太文士以斯拉回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

从公元前 333 年至公元前 167 年，是希腊统治巴勒斯坦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对波斯、埃及和巴比伦的征服象一道闪电，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亚历山大的成就并不限于他的出征。他同时把希腊文化遗产的新生和推广当做自己的天职。这一行动给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首先是各国各民族间的隔绝状况被打破，各个民族开始与异族杂居交往，甚至通婚，在散居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中间，也因此而出现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思想倾向，

其次，希腊语变成了被征服地区的流行语言，思想交流日渐密切；

最后是西亚的宗教也扩大了各自的影响。犹太教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视为民族神的耶和华变成了世界神。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巴勒斯坦先后由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统治。托勒密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埃及为核心，向南延伸。从公元前301年至公元前198年，这个王朝统治巴勒斯坦达百年之久。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在叙利亚以东建立了王国，以叙利亚为中心。公元前三世纪，塞流古为了与托勒密王朝争夺霸权，进行了多次战争。处于中立地位的巴勒斯坦屡遭战火的损伤。

于是，犹太人不得不四处逃亡，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克里特、塞浦路斯、爱琴海岛屿、希腊、埃及和北非各国。

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开始接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经商致富，成为犹太人吸收希腊文明的中心。

战祸再次光临巴勒斯坦。

从公元前二世纪起，罗马开始强盛。公元前190年，初试锋芒的罗马军队在小亚细亚大败塞琉西王国的军队。饱受塞流西王国奴役的以色列人乘此机会，在祭司玛塔赛亚的儿子、绰号玛喀比（意为锤子）的犹太、约拿单、西门三兄弟领导下起义，赢得了以色列的独立。耶路撒冷的圣殿恢复。

但好景不长。罗马帝国继续向东扩张。公元前64年，叙利亚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而以色列的两派奴隶主贵族为争夺耶路撒冷圣殿大祭司的职位，都向罗马争取支持。这给了异族以可乘之机。

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挥兵直驱耶路撒冷，屠杀了12000犹太人。自此，以色列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大批犹太人被带走，散居各地，

有的替人算命，有的沦为乞丐，惨不堪言。

自此，犹太人真正成了没有国家的民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00年。直到耶稣诞生1900多年后，犹太人才再次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有关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一部充满了流浪、血泪的苦难史。正是从这种苦难的经历中，酝酿出了影响世界文明的两大宗教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

犹太民族被异族的刀剑征服了；而他们，则用《圣经》征服了强大的异族。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

铁蹄践踏下的拯救：犹太教的形成

人类文明已进入了高度发展的时期。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设备完善的生活设施、宇宙飞船、新型电脑、上天下地入海……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哲人们说得好：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

还有一位伟人宣称：我比别人看得远，只是因为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这就是历史的延续性。

所以，当我们将目光越过漫长的时间，投向人类茹毛饮血、筑巢而居的蛮荒时代时，就不会对我们的祖先们面对大自然的风雪雷电而惊慌发抖、屈膝磕拜的种种无知举动感到可笑了。

所以，当我们探索人类宗教的起源时，我们便能用一种客观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挑剔得近乎刻薄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刚刚脱离动物世界的我们的祖先如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混沌未开，一片迷蒙。他们怕火、怕闪电、怕惊雷，怕一切足以伤害他们甚至毁灭他们的自然之物。

于是，他们幼稚而无知的头脑中便幻想出一个超然卓立、掌握世界的“神”。

于是，他们便对这个神顶礼膜拜、诚惶诚恐，以求免掉神的发怒。他们崇拜的对象，有茫茫苍穹、有太阳、有月亮、有山、有水，甚至一棵枯树、一株野草。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向我们解释的宗教的起源。

犹太人的祖先曾经生活在茫茫沙漠上。千里黄沙，烈日如火。自然界对他们的最大威胁是

干旱。

没有水，人会渴死，牲畜也不会存活。可是沙漠里没有河，连绿洲也少。水的最大来源就是雨了。

下雨时，人就可以储存水，地上也能产出草，牛羊便饿不死也渴不坏了。

于是，祈祷下雨，便是远古的犹太人常进行的活动；祈祷的对象，便是雨神。

它的名字，叫耶畏（又称耶和华）。

耶和华是以色列各部落共同信奉的主神。

那时候，以色列人还信奉其它神祇，宗教仪式包括杜论杀人献祭。《旧约圣经》中就记载着以色列人把战败被俘的亚玛力王亚甲杀了向耶和华献祭。耶弗他为感谢耶和华保佑他作战胜利，杀女儿献祭。这种地方神与主神共存的状况，一直存在了很长时间。

以色列在定居巴勒斯坦时，和迦南人有许多共同的宗教崇拜，敬奉树木、石柱以及各种自然力。在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末期，一位名叫撒母耳的士师四处奔走，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其国王，就是上节提到过的扫罗。政治的统一，为宗教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扫罗死后，大卫继位。他借助“耶和华”战神的威力，外扫强寇，内修德政，扩大了王国的版图。

所罗门王统治时期，以色列国势日盛，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亚洲西部的一个强大富裕的君主专制帝国。所罗门除了运用自己的世俗政权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帝国外，还借重于主神耶和华的力量，统一宗教的崇拜。他用了七年时间，在首都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闻名于世的大圣殿。所罗门亲自主持了圣殿的落成典礼，并代表全体臣民向神主祈祷。

整个典礼持续了两个星期，但影响却保持了几千年。

耶和华圣殿成为以色列人崇拜的中心，耶路撒冷成为人人向往的圣地。原来的主神耶和华的形象和威力大大增强，逐渐而变为以色列的民族保护神。犹太教亦由主神时期进入民族神时期。

在耶和华神的升华过程中，先知们的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宣扬对耶和华的崇拜，贬低地方神的地位。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这方面的根据。

但是，耶和华还只是以色列国家和民族的保护神，以色列人还远远没有形成宇宙一神教的观念。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教还没有产生。

促成真正的犹太教产生的动力是以色列民族的悲惨经历。扫罗、大卫、所罗门王的时期是值得以色列人自豪的，但太短暂了，很快被更漫长的黑暗所掩盖。诚如读者在前一节所读到的那样，笼罩在以色列人头顶上的总是屠杀、放逐和奴役。亚述帝国、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断的入侵，迫使以色列人意识到，伟大的民族保护神耶和华的形象必须有所改变。于是，犹太教开始了缓慢而坚定的发展。

公元前 445 年，犹太人的波斯大臣尼希米为犹太教的复兴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命令巴比伦犹太学士以斯拉向犹太人宣传《摩西五经》(即律法书)，这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为犹太教确立了第一部成文的神圣经典，即《旧约》中的第一部分的律法书。

波斯教关于末日审判论、天堂地狱论和善恶论等神学理论，对犹太教的发展有着重大的

影响，这使犹太教仿效波斯教祭司教制，形成了以巴比伦学士为主体的犹太祭司阶级。这一变化标志犹太教开始进入成熟。

希腊人统治时代，犹太教神学进一步发展。大批犹太人云集亚历山大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团。他们把古希腊哲学思想注入犹太经典中，并接受了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思想，从而产生了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的犹太希腊哲学。

公元前1世纪60年代，罗马帝国的铁骑闯进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血与火的野蛮统治。犹太人奋起反抗，于公元前53年、公元66年和公元115年举行三次大起义，均被镇压下去，150万人被杀，幸存者绝大部分被放逐出巴勒斯坦。

反抗罗马统治者的希望灭绝了。绝望之中，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只好把目光投向冥冥夜空，希望耶和华派救世主弥赛亚到来，在地上建立一个由神统治的、自由幸福的千年王国。他们还意识到，犹太人之所以被赶出家园，四处飘荡，是因为他们曾犯过罪，应受到耶和华的惩罚，这就是“原罪说”。

丧失了家园的犹太人浪迹天涯，所到之处，

都是一幅幅凄惨的画面。他们看到，其他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和他们一样痛苦不安。这使犹太人深深感到：不仅犹太民族需要一个“救世主”，其他民族也需要“救世主”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作为犹太民族独一无二的神耶和华，也就扩大成为其他民族之神，而被作为整个人类这神看待了。

犹太教在经历了主神耶和华、民族神耶和华之后，终于走向了世界神耶和华的成熟阶段。

在笔者撰写这本有关宗教的通俗性读物时，不能不提及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的“先知运动”。这一时期被称为犹太教历史上伟大的“先知时代”，因为它不仅使犹太教拥有其官方祭司阶级制定的教律，而且还形成民间先知们新颖思想的训诫，以及创作出富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先知文学。

下面就是关于这一促使了犹太教和犹太神学迅速发展的伟大阶段的简要叙述。

“先知”实际上是犹太教内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在社会矛盾尖锐和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以耶和华的名义向统治者和人民发出预言和警告，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进行抨击，以使犹太民

族从苦难中获救。所以，先知们的主要使命在于宗教和道德方面。他们广泛传播那些已成为习俗的伦理和全部戒律，使之成为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哲学。这种哲学已为事实证明是可以长存的。

先知中最伟大和最为杰出的代表有：阿摩司、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

几代人以来，先知们都把以色列国家的灭亡当作一个预言的主题：上帝破坏了自己的创造构。所以，当亡国的灾祸降临时，犹太人不但没有表现出人们在某些难以理解的灾难发生时所产生的愤慨与悲观，相反，犹太人萌发了新的希望，即令人欣慰的，获得拯救的诺言总有一天会成为事实。以色列只要恭顺地接受惩罚，真正悔悟，那么他们就可寄希望于未来。在先知的诺言的鼓舞下，以色列民族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犹太教却发展壮大并越出了巴勒斯坦。

在希伯来人的精神世界里，古典先知们的著作构成了一个整体。尽管他们经历了动荡的犹太社会的不同时期，各人看到了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先知们却超越了各自的时代和历史事

件，构筑了共同的宗教原则和伦理规范。因为先知们都从同一个基本观念出发，即“一个上帝，一个唯一的创世主和士师，一个非神话的、非魔术的神——一个不屈于命运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意志”，所以先知们的经典性预言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而是着眼于建立人类和社会的制度。这些预言，在犹太教义中具有永恒的意义。

从先知们的著作中，我们可概括出先知思想的三个方面。

首先是道德戒律。

虽然先知们不是最先提出人们应该遵守道德戒律的，但他们肯定是最早不依靠任何礼仪或行为准则来阐明善、恶之类概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上帝向人们提出的要求不是狂热崇拜，而是要有良好的道德：只要人行善，就可以在人世实现上帝的意志，崇拜本身并没有真正的或超验的意义。

先知阿摩司这样解释礼拜仪式：上帝不需要任何祭品；纳献祭只是为了对人类表示恩惠。只有从象征方面看，礼拜才有意义；只有有助于认识上帝，礼拜才有意义。如果不诚实、不善良、无人认识上帝，这样的礼拜只会变成对上帝名

声的亵渎。

《何西阿书》上说得好：

“我喜爱善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

《弥迦书》宣扬道：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之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所以，先知们猛烈地攻击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以赛亚首先看到偶象崇拜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全人类也是一条歧路。因为偶象崇拜不仅抹杀了上帝的灵光，而且使人产生了统治他人的野心。它是尘世一切社会弊端和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以赛亚看来，以巴别的通天塔和坚固的城堡为象征的、无止境的、人类的功名欲暴露了统治他人的虚荣心。以赛亚警告道：“高台倾倒”将宣告偶像崇拜的结束，到那时一切高傲的东西都将被贬低。

第二，社会公正和政治清明。

“先知时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外患频频，先知们深深意识到道德准则的建立对以色列民

族生存的重要，所以先知们谴责社会道德败坏比谴责任何别的东西更为激烈。而且他们抨击的火力不再单单对准个别人，象拿单对大卫的谴责和以利亚对亚哈的谴责那样，而是集中于整个社会，他们要整个民族对其罪恶负责并以灭亡相威胁。

阿摩司认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应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

以赛亚则大声呼吁：“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的，为孤儿申冤，给寡妇辩屈。”

先知们特别强调统治阶级的罪恶。何西阿走得更远，他谴责君主政体，说它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背叛：

“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愁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火中将王废去！

先知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的伦理观点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最强烈地谴责穷兵黩武，并认为，以色列依靠军事力量就是一种罪恶。这一观点包含着宗教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他们把以色列争取独立的斗争也看作了反抗上帝，反而把屈膝投降看做是忏悔和改过。于是就出现了奇特的说法：只有自己放弃斗争才能得到拯救。《耶利米书》上写道：

“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是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座城池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这就是彻底的不抵抗主义了。

第三，以色列必将得救。

这是先知启示的主要内容。先知们并不认为以色列将彻底灭亡，相反，以色列将以思想而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因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得到了一项委托：人类应该通过以色列学习“认识上帝和遵守他的戒律”。

先知们设想：以色列在遥远的将来将由一位公正的王来治理。到那时，不仅人类将会得到上帝的恩惠，而且动物的生活也将改变。人类与

动物之间几百年来的敌对状况将会结束。人类在这个历史发展的顶峰会重新联合起来；各族人民将分享上帝只赐给以色列人的恩惠。在“最后的日子里”，天下一切民族不仅同享上帝的恩惠，而且在他的法庭面前也一律平等。

这就是先知们宣传的末世论思想的核心。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在这种理想的梦幻中揭开了未来的纱幕。他坚持说，那时的人皆为兄弟，不会再有战争：“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先知们宣称：人只有停止尊奉自己的神，才能获得解放；人必须放弃对自己所制造的偶像的崇拜，摆脱权力欲、贪婪和统治野心，并应该破除对国家的迷信；人若不把他们的道德义务看做是先验的、由上帝所规定的戒律，就不可能获得拯救。

人必须先忏悔，而后上帝才喜爱他们。

以上就是犹太教的形成过程，下面让我们看看犹太教的圣典的形成。

犹太教的圣典便是被称为《圣经》的《新旧约全书》中的《旧约》部分。它其实是保存下来

的以色列人的史籍、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分。它所记载的，是被称作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的部分经历。但圣经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希伯来人在其大半历史经历中也没有圣经。那个被尊为祖先的亚伯拉罕没有圣经，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圣经，伟大的国王大卫和所罗门也没有圣经。

以色列人曾创造过许许多多的作品，大多没有严格限定的章法要求。这些著述最初写于王国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年）的早年，其中有许多形诸笔墨前就在民间口头流传。它们包括英雄传说、古老的爱国诗歌、神迹故事、神圣的法规、世界的起源（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族谱和家谱、宫廷档案，特别是形成于出埃及和征服迦南时期的故事。它们近乎于希伯来民族史的实录。但这时的作品与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似乎还没有直接联系。

很显然，上述作品是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经过加工之后才成为犹太教圣典的。而“圣经”一词，则是公元四世纪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发明的，他把犹太人的所有圣书统称为《圣经》。所以，如果你在公元一世纪对当时的犹太人讲“圣经”这个词，他们准不会

知道你说的是何物。

犹太教的圣典《旧约全书》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虏归回后，开始收集古代典籍进行编纂加工，历时约4个世纪（公元前6世纪至2世纪）逐渐形成的。

《旧约全书》共三十九卷（在希伯来文古本中合并为二十四卷），分为律法书（亦称“五经”或“托拉”）、先知书（又分为前期先知书和后期先知书）和圣著（亦称文集），它实际反映了犹太教圣典汇编成书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在公元前444年之前不久，编集的内容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所以又称“五经”(Pentateuch)，这是个意谓“五卷书”的希腊词，表示该部分的现存形式。而希伯来语“托拉”(torah)则表明这部分的真义或基本性质：它是耶和华在西奈山给摩西的“教诲”。（作为“托拉”的译名，“教诲”比“律法书”更得当。）圣经其余各卷都不象“托拉”这样被视为神灵的直接赐与。“托拉”是犹太信仰的基石，犹太人一年到头在所有聚会中仪式化地朗读，逐章逐节地读，从头读到尾。

律法书以古代神话传说为引子，中心是三部法典。

《创世纪》是以色列人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伊甸园、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和洪水传说都是取自巴比伦的古代传说。古巴比伦人对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冲积平原称伊甸；洪水传说从发掘尼尼微古城遗址的城砖上可以查考出来，更早的还有苏美尔人的洪水传说，这些都要早于以色列人流传的神话。至于《创世纪》中的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是史诗式人物，无从查考。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到二十三章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法典，耶和华传十诫是它的前言，反映了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的社会关系。它虽名为摩西制定，而其中提到的耕地、葡萄园，显然是农业社会的事物，当为以色列人定居巴勒斯坦进入农业社会才形式的。《摩西十诫》中的许多条文很明显地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抄袭修改而来，甚至摩西从神领受律法《十诫》也与汉穆拉比王从太阳神领受律法的传说十分相似。从以上可能看出，编纂圣典的以色列人将农业社会的法律提到游牧时代，其动机便

是想依托传说中的民族英雄摩西而取得权威地位。

《圣命记》第十二至二十六章是以色列人的第二部法典。它的产生背景是：公元前621年，犹太国王约西亚为了使犹太国免遭以色列国被灭的命运，维护奴隶主与祭司贵族的统治，伪称大祭司从圣殿中发现了古代律法典籍，并依此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反对多神信仰，废除偶像崇拜，确立一种神教。但约西亚王还未来得及将它定为法律，便因战败被俘而为埃及法老尼柯处死了。到以色列人结束“巴比伦之囚”重返家园后，这部法典才被正式确认。据记载，公元前400年后不久，文士以斯拉就在一个庄重的聚会上向民众宣读了“耶畏（耶和华）籍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于是，“摩西五经”从俘囚后幸存的大批书面材料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为正在形成的犹太教的最高法典。

《利未记》是第三部法典，通称祭司法典。它和《申命记》一样，反映的都是公元前8～7世纪犹太的社会经济状况。当时，犹太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者贪污腐化，广大平民生活困苦，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便借宗教权威

树立自己的法权。于是便产生了《摩西五经》。

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190年完成。这一阶段共汇集了《先知书》八卷，包括早期先知书四卷——《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实际上，它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传说与后来以色列各部落联盟的历史，以及以色列王朝所罗门登位直至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灭犹太国、以色列人被虏为止的历史。"晚期先知"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合为一卷)。应该指出的是，"早期"、"晚期"并不是著作出现的先后，而是指被列入圣典的时间先后。由此可见，这批经卷具有仅次于"托拉"的神圣性。它们在"托拉"之后不久便成为正典，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托拉"被确定正典时各先知书就已存在一样，当先知书被确认为正典时，后来构成文集的各卷也已存在。每次确认正典都要经过筛选，其间，某些被认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书卷首先得到认可，从大量其它资料中选出，被赋与正典资格；剩余者则留给将来备用。

先知书各卷充斥着道德教训，述及希伯人的光荣历史，增补了被掳后的若干情况，并展示

了对光辉未来的希望。它们之中，阿摩司和稍晚的弥迦反映了农民对奴隶主、放高利贷者的仇恨，弥迦咒诅耶路撒冷必变为瓦砾的乱堆，阿摩司咒诅当权的大祭司及其子女都将死于刀下。继阿摩司之后，以先知以赛亚得名的《以赛亚书》是公元前 8～2 世纪许多先知文学作品合成的，它的前半部反映了亚述军队入侵巴勒斯坦造成的灾难。阿摩司、何西亚、以赛亚前三十九章的作者，弥迦都是公元前 8 世纪的先知。公元前 7 世纪的先知有那鸿、西番雅、哈巴谷、耶利米，都在以色列人被虏往巴比伦以前。6 世纪的以西结、《以赛亚书》第四十到五十五章的作者等表达的则是以色列人被虏巴比伦时的亡国之痛。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是公元前 6 世纪末叶到 5 世纪中叶以色列人返回以色列重建圣殿时期的先知，表达了以色列人的希望。

第三阶段。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如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公元 100 年，犹太教正典正式形成定本，如外国学者 J·B·加百尔在《圣经中的犹太痕迹》中表述的看法。本书大致采用第二种说法。

犹太历史上的两次新的危机加速了正典的

第三部分，即圣著的成书。一次危机来自奋锐党人领导的反对巴勒斯坦罗马人的犹太起义。公元70年，罗马士兵在梯特的率领下攻陷耶路撒冷，洗劫全城，焚毁了圣殿。一个名叫约阿南·本·撒该的犹太祭司死里逃生，来到耶路撒冷西部的一个小村庄詹尼亚，组成一个议会，以取代曾在耶路撒冷占统治地位而现在已消亡的犹太教公会。詹尼亚议会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宗教使命：找出犹太教不依赖圣殿而存活的途径。这时与500年前"巴比伦之囚"后的情形颇为相似：犹太教的崇拜中心被毁灭，民族信仰面临严重的危机。詹尼亚议会挽救此危机的措施便是确定第三批书卷（即文集）的构成。这样，到公元100年的时候，犹太教正典终于形成定本，犹太教自此成为所谓"一种书的宗教。"

圣著共有十一卷，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诗篇》、《箴言》、《约伯记》；然后是五小卷：《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雅歌》；第三部分是《但以理书》、《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历代志》。

应着重指出的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犹太教会堂中，《五经》每

三年通读一遍，《先知书》也经常宣读，圣著则每年读几次；涉及教义问题，《五经》是最高权威。

至此，犹太人用自己的泪水和智慧产生了自己的宗教。

第二章　人间苦难与天国的解脱

当现实的苦难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许多人便仰望茫茫苍穹，祈求救世之星的出现

——题记

来自心灵的曙光：《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

翻开《圣经》，我们不难发现，虔诚的信徒们早已为他们圣灵的主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在他们的笔下，主是万能的，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关于救世主耶稣的传说：

公元前4年。

在位于加利利河谷一个小山坡下的拿撒勒城，住着一位名叫马利亚的童贞女。当时马利亚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了，但还没有出嫁。

一天，马利亚梦见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遣，

来到马利亚面前，对她说：

“马利亚，不要害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将要怀孕生子，可以取名叫他耶稣。”

不久，马利亚果然发觉自己怀孕了，她非常惊慌，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约瑟发现自己未婚妻怀孕后，想暗暗将她休掉。这时，天使在他梦中显现，告诉他马利亚是一个圣洁的童贞女，她身上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于是，约瑟遵照天使的吩咐，把马利亚娶了过来，但在孩子出生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同房。

当时的罗马皇帝奥都古斯有这样一个旨令，他的所有臣民都必须登记在册，而且必须在规定日到原籍所在地登记。

约瑟是大卫的后代，他应该回原籍伯利恒去。于是，就在马利亚产期快到的时候，约瑟带着她离开拿撒勒城，长途跋涉地奔向伯利恒。

到达伯利恒后，城里所有的客店都满员了，约瑟和马利亚无处安身，只好暂时住在马棚里。马棚里没有床，只有马槽。

就在这个简陋的马棚里，可怜的马利亚分娩了。婴儿呱呱落地后，夫妇俩按照天使的旨意给孩子取名耶稣。

就在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伯利恒郊外的牧羊人正在守护羊群，天使出现了，告诉牧羊人们，说今天在伯利恒生下一个救世主，这就是基督。这个婴孩在马棚里，身上包着布。

于是，牧羊人急急地跑回城里，寻找到那个婴儿。回去便把这件事传开了。

婴儿诞生后不久，曾被抱到圣殿、让头生的男孩称圣归主。在祭祀结束后，碰到一位耶路撒冷的名叫西面的老人和一位年长的女先知，他们说了许多关于解脱之日已来到的话。西面老人还祈求耶和华让他平安死去，因为他已经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救世主了，这位救世主将引导他的人民离开邪恶和堕落的道路。

这时国家的统治者是希律国王，这个老国王住在耶路撒冷阴暗的宫殿里。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当官员们谈起伯利恒的那个婴儿的事情时，希律害怕极了。因为犹太是个小国家，几百年前是属于大卫家的，而大卫正是伯利恒人。所以，希律便开始担心有人篡夺他的王位。于是，他下令杀死所有三年之内在伯利恒出生的男孩，以根除后患。

就在希律下令后的不久，约瑟又梦到天使

显现，向他陈述希律国王要杀死这个孩子的命令。

约瑟惊醒后，急急忙忙带着马利亚和孩子连夜逃走了。

等到希律死了，约瑟才带着妻儿回到以色列，定居在拿撒勒城。

拿撒勒城位于加利利南部，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在这里，小耶稣伴着当木匠的父亲约瑟和勤劳慈爱的母亲马利亚度过了童年。

耶稣 12 岁这年，父母照例带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习惯，在那里住一段时间。逾越节的庆祝活动男的跟男的在一起，女的跟女的在一起，不许混杂，而唯有小孩子可以不受性别限制自由地跑来跑去，愿意跟父亲就跟父亲，愿意跟母亲便跟母亲。

逾越节期满后，约瑟与马利亚随着人群往回家的路上走，仍是男的自成体系，女的与女的结伴同行。当时，耶稣并没有随父母返回家，而是仍逗留在耶路撒冷。而约瑟以为耶稣随马利亚一道同行，马利亚则以为他同约瑟在一起，直到宿营地，夫妻会合后，方觉孩子不见了。他们找遍了整个人群，都没发现耶稣。

既然在宿营地找不到，夫妻二人又折回到耶路撒冷。找了三天，终于在圣殿发现耶稣了，他正坐在教师们中间，边听边问，对答如流，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

那时的12岁男孩，是很贪玩的，并且也听不懂那些奥妙无穷的律法书和先知书。但耶稣却偏偏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父母看到儿子在圣殿中，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耶稣自小没有上过学，本不应该知晓那么多。可他们哪里知道，耶稣是生而知上的，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他的智慧是与日俱增的。

耶稣渐渐长大成人了，他对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都非常感兴趣。这时，他的一位名叫约翰（人们通常称他为施洗者约翰）的表兄正在死海的僻静海岸上，思索着宗教问题，他大声疾呼，告诫人们，要为自己的罪行和罪恶忏悔。耶稣受他感染着，追随着他，要在浑浊的约旦河水中受洗。

当约翰为他进行施洗后，耶稣决定到旷野去，探索一下自己的心灵。在这期间，他很少吃饭，也不常睡觉，他确实有必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生活中见到和经历的一切，以便计划将来做

些什么。

他感到了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世俗的素质，他感到了自己必须向天下苦难的人民宣讲忍耐，仁慈和谦卑之道。于是，他决心要走出去，把他头脑中最主要的想法告诉那些愿意听的人，把自己献身于这个美好的事业中去。

他终于走出了旷野，离开了父母，冒着被放逐，憎恨和死亡的危险。那年，他三十岁。

耶稣一个接一个地方的走着，他接触过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非常乐意听耶稣给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因为那都是以前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充满善意，宽恕和热爱的话，他们都称耶稣为主，耶稣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耶稣和他的陪同者一道，从迦拿走到迦百农，这是一个坐落在加利利海北岸的小村落。

就在这个村子里，住着两位渔民，一个叫安得烈，另一个叫彼得，他们聆听了耶稣的教诲后，认定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因而，毫不犹豫地最先作了耶稣的圣徒。

之后，耶稣又收了几个门徒，他们是雅各、约翰、腓力和拿但业。这些人忠实地追随在耶稣左右，听耶稣宣讲道义。不久，全国都知道，国

内出了个先知，名叫耶稣，他说全人类彼此间都是兄弟姐妹，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敬爱的上帝的孩子。

在追随耶稣的人们中，各种类型的人都有，耶稣从中选出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些使徒跟耶稣上了一座山，听他讲人生哲理。耶稣是这样说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务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得到的赏赐是大的，以前的先知，人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他又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而

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他还教给使徒们一段祈祷文，作为每天指导行动的准则。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险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门！

他主张"爱人如己"，他讲的道义是用通俗的语言，用小故事的形式铭刻在众人的心间的。这与法利赛派主张的那些狭隘的信念完全不同。他一次次冲击着罗马帝国的陈旧观点。他曾借口医治一个有病的妇女而公然破坏安息日的惯例，他也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赶起了喧哗的商人而触怒了法利赛人。这些举动都向世人表明，他要与陈旧的犹太人的偏见完全决裂。

他并没有主张反对罗马帝国，但他也从未表示拥护它；他既没有讲，也没有鼓吹任何足以被认为是对既定法律的一种公开挑战的言论。

他只是要人们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去判断。所以，在法利赛派看来，他比所有最凶恶的反叛者更危险。

耶稣继续为自己所作的事奔走着，他很清楚地明白法利赛派对他的态度，以及他们想对他采取的行动。然而，他却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

他的门徒对他都很虔诚，他们和睦相处，互相友爱、互相容忍。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却和众人不同。他叫犹大，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出生在犹太地区。其余十一人都是加利利人，因而，犹大认为自己由于籍贯与他们不同的原因，常常受到冷落，而且总觉得耶稣偏爱那些人，而置他不顾。这种想法时时占据着他的头脑，使他心中总怀着满腔的怨气和准备报复的念头。

报复的机会终于找到了。当耶稣和门徒到耶路撒冷时，法利赛派正为如何抓获耶稣而苦恼着。这一天晚上，当门徒熟睡之后，犹大就从屋子里溜了出来，他跑到了法利赛派的公会里去，要向他们报告耶稣现在的行踪。

这个举动正中法利赛派的下怀。他们知道，耶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果公开逮捕

他，会遭到大众的抗议。所以，如果能探到耶稣的行迹，趁夜里悄悄抓住他，不是很好吗？如何能悄悄逮住耶稣呢？犹大的报告及时解决了他们苦恼的问题。为了犹大提供的珍贵线索，他们付给他三十个银币作为回报。

耶稣苦难的日子来临了。

那天是逾越节。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去往城里，找了一间旅店，订了一桌酒席，准备在一起聚餐。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耶稣说话很少。当门徒用不解的眼光看着耶稣时，他开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看啊，那叛徒之手，与我同在一张桌子上。"

门徒们震惊了。这时，犹大站了起来，悄悄溜了出去。不一会儿，他领了一队兵，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手中举着兵器，灯笼，冲进了旅店。犹大走向耶稣，准备亲吻他，耶稣说：

"犹大，你用亲吻的暗号来出卖我吗？"

话音刚落，士兵们便扑了上来，可怜的耶稣就这样被出卖了。

耶稣落入法利赛人手里后，他们既不查问

证据，也不听取任何证词，就把这个拿撒勒人判处死刑。

根据惯例，罪犯通常是用石头击死的。但在法利赛人眼中，耶稣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对他的惩罚应该带有羞辱性。而在当时，唯有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是最重的，所以，法利赛人决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示群众。

耶稣的苦难日来临了。这一天，他拖着身子，把十字架慢慢背上了山顶，然后，士兵们把他钉了上去，剧烈的痛楚使耶稣感到难以忍受。周围的群众看到他所受的折磨，纷纷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的耶稣已经听不清别人的声音，也看不清周围人的表情了。他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他在做最后的祈祷，祈祷上帝宽恕他的敌人所作的事情。

接着，他死了。

以上便是《圣经》上关于耶稣的传说。《圣经》上还记载着耶稣死后三月又复活，继续讲道的事情。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呢？耶稣是否确实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争论纷纷，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第一，认为基督教不是耶稣创立，历史上的耶稣是为人们的需要虚构出来的。其依据是：

（1）同时代文献记载上从未提到过耶稣其人。

1世纪有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斐洛与传说中的耶稣是同时代的人，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耶稣此人。而1世纪的罗马著作中也很少提到基督教和基督。罗马的著名历史学者塔西佗倒是在其著作中提到基督教了，但却根本没有涉及到耶稣这个名字。2世纪的传记作家苏艾托尼乌斯在他的《尼禄皇帝生平》中称基督徒是“信仰一种新而有害的迷信的人”，又说犹太人“在一个基督的煽动下多次闹事”，同样的没有提到耶稣。

从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耶稣并非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罢了。

（2）《圣经》上所载的耶稣的生平事迹是虚妄的，附会的。

从耶稣的诞生来看，《圣经》上说耶稣是由

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的恩惠怀孕而生的。同时代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宣称他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是他母亲睡梦中受孕而生的。非常有趣的是，东方宗教中的释迦牟尼也是因母亲受神灵之孕而出生的。这三个人的巧合令人感到惊奇。可见，古代的人们都为自己的民族描绘出一个圣人，而这个圣人的出生方式几乎都是由神受孕而生的，这是各民族的通例。所以，耶稣的出生是经过神秘宣染的，并非真实的。

从耶稣施行奇迹来看，当时的罗马皇帝韦思巴西安曾称，他自己就施行过许多奇迹，他曾用唾沫抹在瞎子的眼上，使瞎眼复明，也曾治好过一个残废人的手。这与《圣经》中关于耶稣使瞎子复明，跛子行走的事迹是相似的。

从耶稣传教的内容来看，《圣经》上记载耶稣传授的祈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古代的以色列人有一种阿拉梅语的感恩祷文，其中有这样的话：

"愿他的尊名在照他旨意创造的世界中伟大神圣，愿他的国在你们生前和整个以色列族面前建立起来。"

第二种观点比较流行，即认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

面对征服者的屠刀，有人洒尽了反抗的鲜血；有人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于是便有了基督教的诞生

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是世界上最强盛、地域最宽广的国家。

300年的刀光剑影，300年的铁马纵横，罗马帝国的强横意志辐射到了辽阔的疆域：西到大西洋，东到幼发拉底河，北到多瑙河、莱茵河，南面跨越地中海直到撒哈拉大沙漠的北缘，其中除意大利外，还包括30多个行省。

奥古斯都皇帝不可一世，指挥着25个军团的士兵来往驰骋，用长剑与大刀维持着各民族对他的屈服。

有土地就有财富。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流入罗马皇帝的国库，流入罗马贵族们的腰包。东方殖民地富饶、肥美的耕地、牧场、森林、矿场、鱼塘落入罗马统治者之手，分给了移居殖民地的罗马公民。

失去了土地的犹太农民沦为游民，四处游荡；过去的一些小生产者和小奴隶亦在罗马征服者的掠夺下纷纷破产，陷入生活的困苦之中。反抗的怒火在蔓延，在炽烧。

公元64～65年，罗马帝国各省大饥荒，巴勒斯坦更是颗粒无收，饿死之人处处可见。压抑了很久的犹太人的反抗之火终于燃遍全境，他们攻击罗马军团占据的城堡，杀死罪大恶极的罗马征服者，剥夺不义之财。

罗马皇帝恼羞成怒，责令行省长官进行血腥镇压。举着尖刀利刃的罗马士兵大批冲向巴勒斯坦，攻城掠地，杀人放火。一场血腥而漫长的屠杀之后，圣地耶路撒冷的每块土地上都有死尸伏于其间，起义的犹太人被大批地钉死在木架上，7万多人被卖身为奴。基督教就产生于犹太亡国到66～70年大起义的这个时期。

社会矛盾尖锐，生活在动荡，使当时的一些思想家感到危机四伏，没有出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斯多噶派希腊哲学在罗马帝国风行一时，二者交互影响，宗教色彩极浓。新毕达哥拉斯派宣扬外部世界的非真实性，认为唯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其次，人可以靠某种

神秘经验与神相交，超脱肉体，使灵魂飞升于世界之上。斯多噶派哲学家则强调天体神圣说，认为天体控制地上人类的命运，人间则是整个宇宙的缩影，都是由一个绝对力量统治着；在现实生活中宣传盲目顺服命运的宿命论，鼓吹恬淡寡欲。

这种流行罗马帝国的哲学传入犹太人地区，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与犹太教思想的混合学说，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和新斯多噶派的塞涅卡。恩格斯曾指出，斐洛对基督教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说，当时“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传播”。“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斐洛生活的亚历山大城受希腊文化影响很大，他熟悉希腊的文学、哲学、甚至对希腊文比对希伯来文还精通。同时，斐洛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当地犹太教会堂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对犹太教的教义了若指掌。这为他融合两派哲学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斐洛的贡献就在于他与塞涅卡一道，把斯多噶的泛神论（主张自然本身便是神）和柏拉图

的灵魂不死学说结合在一起，认为肉体不过是灵魂的载体，把人世生活看作是未来永恒的阴世生活的准备，宣扬神秘主义宿命论和禁欲主义，鼓吹人的美德就是安于命运，因而要求人们对苦难的现实采取容忍的态度。这种学说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斐洛的贡献远不止此。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和犹太教的天使是一个东西。他把上帝看成是不可名状的、无从界说的、超越一切时间观念的神，并在上帝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之间，安置了一位神性的"逻各斯"，他称这为"上帝之子"、"第二位神"。他提出了"逻各斯"（道）即神的理性的主张，把"逻各斯"解释成上帝对世界的一种作为，是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中介。这种"逻各斯"的神秘主义概念，后来成为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义的基础。在《新约圣经》的《希伯莱书》中，就是把"逻各斯"看作上帝与自然和人类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体，并用它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在《约翰福音》中，把"逻各斯"看作是一种永恒的神性，肯定"逻各斯"在启示中的重要作用，且创造了"逻各斯"下凡化为肉身的耶稣基督等。按照斐洛的解释，肉体是灵魂的

牢笼，肉体和人的本性都是罪恶的开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彼此分离的，但它们之间一个中介，这中介就是救世主，人在救世主的帮助下即可得救。

无疑，上述斐洛的宗教观和伦理学构成了基督教关于“神人”教义的基础，它们包括：

①原罪论：人的本性是有罪的；

②救世论：上帝会派遣救世主来拯救人类的灵魂；

③信仰论：强调不是用牺牲和烦琐的礼仪，而是通过忏悔把心奉献给上帝；

④禁欲论：蔑视世俗的物质享受。

与基督教产生的思想背景相伴随的是广大的下层群众对精神安慰的需求。在当时血腥而恐怖的环境下，受尽压迫的奴隶、隶农、小手工业者、破产的商人等，对当权的统治者充满了强烈的仇恨。他们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强大的罗马帝国政权依然高高在上，巍然耸立。理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被弄得粉身碎骨。一次次滴血的镇压之后，许多人心中反抗的意志崩溃了，慢慢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这时，他们不免寄希望于幻想之

中，期待一个伟大的神灵将他们拯救出苦海。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世纪罗马帝国宗教盛行的社会基础。

罗马在征服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同时，也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条件，这就使各民族宗教注定要趋于没落。但是产生宗教的阶级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只是条件不同，需要适应新的罗马世界帝国条件的宗教。所以，包括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在内的民族性宗教逐渐消亡。

于是，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统治者需要这三方面交汇影响之下的新的世界宗教——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初期基督教是1世纪上半叶犹太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出现的一个犹太教新宗派。它与犹太教的其它几个政治宗教派别一样，都信仰犹太教先知所预言的将有一位救世主弥赛亚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统治。但对于怎样迎接弥赛亚来临这一点上，它既不象狂热派鼓吹以革命行动促使天国来临；也不象艾赛尼派标榜

禁欲，另立聚居社团，与社会隔绝；也不象法利赛派保守传统的犹太法律，而是鼓吹坐等天国降临的一种弥赛亚运动。他们宣传以色列人历来所盼望的神的国即将实现，弥赛亚即将来临，现实世界的一切即将完结。在此之前，便已有一个施洗约翰进行这种宣传。

依据史料的分析，历史上存在施洗者约翰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确有其人，传说中的耶稣很可能是他的信徒，即后来所称的拿撒勒派。当时狂热派主张武力革命，而拿撒勒派的施洗约翰和耶稣则把以色列得救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神。这个传说中的耶稣并没有系统的教义理论，只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宣传“天国近了”，号召人们“悔改”，同时主张废除宗教仪式上的繁文缛节，也不赞成法利赛人的自命清高，艾赛尼派的离群索居。他拥有一小批追随者。他后来被罗马统治者处死。死后门徒奉他为救主基督，从而创立了犹太教的一个新派别。

这个犹太教的新宗派虽然反映了犹太人民反对罗马统治者与犹太民族上层贵族的统治，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广大奴隶、释奴、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下层群众在起义一再失败后的

一时消极情绪。它所表示的不是不畏死亡的斗争，而是慑于淫威的温顺与本份。

作为犹太教的新派别的基督教最初出现于巴勒斯坦农村。它在犹太教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巴勒斯坦受到抵制，但却随着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一道流入叙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的奴隶和获释的奴隶、贫苦居民、手工匠等下层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逐渐战胜林立的各民族宗教，而成为广为人接纳的精神信仰。

从一天始，基督教就接受了犹太教的一神观念、弥赛观念，并超越了犹太教的民族狭隘性，而具备了世界宗教的特征。

首先，如前所述，后期犹太教已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耶畏（耶和华）变成了世界唯一的神，这样就使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但是后期犹太教仍坚持犹太人在各种族中的优越性，是"选民"的观点。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打破了犹太人基督徒拥有优越地位的观念，宣称各民族在上帝的眼光中均是平等的。这一观念正适于在民族杂居的罗马帝国境内广泛传播，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宗教。

其次，鼎盛一时的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出现了危险的征兆，前途暗淡，危机四伏。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许多人悲观绝望，或从肉欲的享受中寻求解脱，或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作为当时精神慰籍的帝国内的各种宗教除了用献祭来祈求神的福佑外，并不能给陷于苦痛、徘徊之中的心灵带来什么安慰。唯独初期基督教宣扬的“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这一信仰，犹如天际的一道曙光，给陷入精神黑暗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处于无权地位，只能追求思想安慰来摆脱绝望处境的下层民众，人个因信奉基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摆脱对命运、死亡和各种鬼魔的恐惧，哪怕是被社会鄙视的罪人，也一样可以得救；对于忧于帝国衰败，政治上又失意的上层人士来说，基督教的灵魂得救说给了他们心灵上的安定感和生命永恒感。故而，基督教不但可以在下层民众中很快发展，而且也迅速传播于上层社会。

基督教简化宗教仪式，使人们从当时各派宗教的繁琐的饮食和洁净的清规戒律的重重束

缚中解脱出来。在基督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的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这与罗马教和东方各民族宗教的空洞无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更能满足当时追求思想安慰的群众的精神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基督教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城市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从一开始，就在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中向前发展。恩格斯在论述初期基督教时就曾指出：

它"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初起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

从基督教保罗派的《哥林多前书》及《启示录》中，均可以看出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如《启示录》的作者就咬牙切齿地宣称：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

以博爱面目出现的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宗教仇视的血腥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初期基督教不单纯是一个宗教派别，还是下层民众中一个以神秘宗教为思想基础的互助社团，而且与当时的手工工匠行会组织结合在一起，使之在城市中获致了迅速传播的土壤。由于初期基督徒本身就来自下层民众，所以罗马帝国内广泛存在的行会组织和互助团体为初期基督徒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初期基督徒指望弥赛亚很快降临，轻视财产，又沿袭犹太教传统，把每天公用就餐作为一项宗教活动看待，称作“爱筵”；教徒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各种经济上的互助关系。

在这些城市的犹太人中间，也兴起了诺斯替教派。其阶级基础是一些高级工匠、经商致富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不满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基于利益的考虑，亦不欢迎武装革命。这个派别的教义是：认为对神的知识，不是普通人所能明了的，惟有“属灵”的人才能懂得；世上的罪恶来自物质的本性，在现世生活中没有改善社会的希望。1世纪上半叶的犹太神学家斐洛就是这种

思潮的一个主要代表人，也是有著作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诺斯替派哲学家。

当初期基督教传入爱琴海地区各城市时，正如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由于阶级地位政治倾向不同，对共同信仰的救世主将如何来临，抱不同的见解，分为不同的派别一样，初期基督教亦分裂成许多派别。其中之一，便是由诺斯替派演化而来的保罗派。这一派的主张也是犹太的一神论和死而复活的神秘救主耶稣基督，加上末世论。但它的末世的内容，已不再强调在地上建立神的统治，而变成了信徒的个人得救。初期基督教宣传神的儿子由天降临，渐渐被赋予新的解释，变成信徒"受洗归入基督成为一体"，进入"天上的神国"了。初期基督教宣扬弥赛亚即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教徒除一心等候外，不再做工，以致全靠基督教社团的公共用膳维持生活。保罗派从有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这种公共聚餐的行为。他们训斥贫穷的教徒：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

保罗还训诫教徒"要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

己的事，亲手做工，……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初期基督徒一心等候弥赛亚将带来一个新的“神的统治”，保罗派却从维护奴隶制社会出发，进行道德说教。这样，保罗派便把初期基督教这种弥赛亚运动改变成一种信仰神子死而复活称为救主基督耶稣的神秘宗教。

初期基督教的弥赛亚宣传是以穷人为对象的，这些穷人没有钱供给初期基督教徒社团，反需乞求于后者的救济。保罗派虽也向下层民众宣传，但它有中产阶层为后援。他们都很富裕，并有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的妇女参加。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宣传力量上，保罗派在当时基督教各派别中首屈一指，他们用大量的钱财补助各地教会，逐渐在思想上控制了这些教会，再进一步在组织上取得了这些教会的的领导权，并最后在初期基督教内部占了上风。这样，因反抗罗马统治者失败而产生的以下层民众为主导的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因中产犹太人的加入而与罗马帝国的统治需要取得了某种默契。

随着基督教的迅速传播，它与犹太教的分歧越来越大。思想原则、政治主张和组织结构都

表现了这个生长于犹太教母胎之中的新派别越来越远离犹太教，并最终脱离犹太教而形成自身独立的形态。下列因素的叙述或许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待基督教最终告别犹太教的必然结局。

信仰上的分歧。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者，祈求救世主弥赛亚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统治的千年王国；而基督教徒却宣称：要靠圣灵重生，进入天国，以获得永生，完全否定了任何地上的千年王国。犹太教把救世主弥赛亚作为反对罗马帝国，恢复犹太王国的“复国救世主”；基督教则要求把救世主作为人类世界的救世主。犹太教把自己的民族作为上帝的第一选民，认为上帝对犹太人特别宠爱和优待；基督教徒则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上帝施恩典于一切不同民族的信徒。犹太教强调遵守宗教律法，认为只要严格遵守宗教就能得救；基督教徒则认为得救来自上帝的恩典。犹太教徒反对基督教徒宣称耶稣是救世主；基督教徒则通过《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编造出耶稣的家谱，来论证耶稣就是犹太先知预言的救世主。

政治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反抗罗马统治

的政治倾向上。在基督教前期，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用炙热的鲜血铸写了对罗马入侵者的反抗。《新约》的《启示录》中，就借怪兽影射了罗马皇帝尼禄，并预言神将战胜尼禄，拯救犹太人。可是到了早期基督教的后期，基督教徒在对待罗马统治的态度上，发生了很大转变。转变的关键就是公元 66 年至 135 年这 70 年间犹太人进行的四次大起义，即公元 60～70 年的第一次大起义；公元 79～81 年的第二次大起义；公元 113～116 年的第三次大起义；公元 132～135 年的第四次大起义。第四次大起义的参加者有 20 万人，被镇压杀害的达 18 万人之多。正是在这四次血腥的搏斗中，基督教与犹太教正式决裂。第一次大起义时，初期基督教社团中还有一部分人对起义表示了同情之心，而耶路撒冷大部分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被围困前就逃出去，越过约旦河避难，因而得免杀头之祸。在犹太人第二次、第三次出现的《十二使徒遗训》中，写着如下的告诫：

"要温顺，因为温顺的人将承受土地。"

到第四次大起义时，基督教会又通过《约翰福音》，借耶稣之口明确宣布：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还说：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这时，基督教已站在罗马帝国一边，把犹太人民的苦难看为神的诅咒。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基督教发展了它的“自我意识”，产生了独立的经典和教会组织。

基督教的经典产生于1世纪下半叶到2世纪下半叶之间。当时，基督教徒已开始组织成教会，需要对教徒进行教诲。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经典，礼拜时还是沿袭犹太教会堂的做法，诵读犹太教的经卷。后来，基督教传播到非犹太人中间，形成所谓外邦人教会，这些人对犹太教经卷并不熟悉。更主要的，基督教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单纯引用犹太教经典来反击犹太教的诘难往往很难奏效，而且，它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是犹太教经典无法回答的，必须另作解释，这就促使基督教必须突破犹太教经典的范畴。最使初期基督徒手足无措的是：初期

基督教宣传的末日很快来临的盼望一再落空，一些当初狂热信服这个新教派的信徒渐渐丧失了信心。这使得初期教会要作出末日何以还不来临的解释，逐渐冲淡末世很快来临的热望，对现世生活也不能再弃置不顾。信仰的重点也由救主基督从天降临的奥秘移到救主的生前，声称他生前便已完成了拯救世人的工作。

基于上述的新问题，各地基督教会撰写了许多讲道文章和训诲词，在礼拜时当作经卷诵读，各地区的这类训诲词又互相传抄交流。其中一些价值较高，很具说服力的篇章慢慢获得了较高信誉，被当成阐述教义的权威著作。《新约》便在这种情况下脱胎而出。

收入《新约》的《启示灵》是某一个小亚细亚的犹太基督徒所作，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作于公元 68 年尼禄皇帝自杀到 70 年耶路撒冷被攻陷这一期间。其它部分一般认为作于图密善统治（公元 81～96 年）后期。书中借怪兽影射罗马皇帝尼禄，预言他即将回来，施行恐怖统治 42 个月，之后末日来临，神将打败尼禄，火焚罗马城，捆绑魔鬼 1000 年，千年王国将在人间出现，犹太人也因此而获救。书中表达了对罗马皇帝

的仇视，但隐于宗教神秘主义的迷雾之中。而且，此书对后来流传的耶稣在世的事迹，只隐约提到他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可见，此书尚未摆脱初期基督教幼稚模糊的特征，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状态。明显的证明是，《启示录》中所用于预言的许多材料出自《旧约》。如四个骑马的带着战争、饥荒、瘟疫给人类，来自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怪兽出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用以比喻神的统治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来自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圣城耶路撒冷”取自旧约《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以下。代表救主的羔羊也取自犹太教的宗教观念。

《新约》中被称为保罗书信的共14封。这批书信约出现于1世纪下半叶至2世纪初叶。它们反映保罗派的政治态度、神学与教义主张、宗教道德以及当时教会的一般情况。这些书信并不重视耶稣的历史存在，很少提及耶稣，它们所描述的救主与当时流行的神秘宗教的内容却很相近。在政治思想上，这批书信鼓吹对当权阶级的顺服，《罗马人书》就公开宣称：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

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对于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保罗书信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憑借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归服基督。”

保罗书信从神秘宗教的基督观出发，鼓吹对现世人生的彻底否定态度。它们宣称“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世人处于“罪与死的律”辖制之下，世界则是“服从在虚空之下”，人生只有“叹息劳苦”，基督的责任只是救人“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一彻底否定人生世俗生活的哲学，成为

保罗派奉行顺从罗马统治的奴化政策的理论基础。他们宣扬“在患难中要忍耐”,“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不要以恶报恶”。尽管保罗派大讲道德、操行,但在行动上却贪图现实的肉欲享受,达至顶峰。在保罗派的内部,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之事层出不穷,许多人犯罪,污秽、奸淫、邪荡,无所不为。作为斯多噶派哲学家的塞涅卡一面大讲操守,鼓吹禁欲,一面却供奉于罗马宫廷,充当尼禄皇帝的老师,玩弄阴谋权术;一面鼓吹安贫乐道,一面却大肆挥霍金钱,生活腐乱。充分表现了保罗派虚伪的特征。

公元66～70年犹太人民大起义之后,罗马统治者实行恐怖的高压政策。罗马皇帝图密善禁止犹太人传教,违反禁令改信犹太教的判处死刑,财产没收,隐瞒犹太教身份的亦处以重刑。公元96年,图密善处死他的近亲克雷门斯,罪名是不信神,追随犹太教仪,克雷门斯的妻子多米娣拉也被放逐。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加快了与犹太教分离的步伐。这一过程具体反映于《新约》中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原无作

者，大致可以判断是第二代的保罗教徒所著。书中渲染了往日各种战争所带来的悲惨状况，说“家业被人夺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全书站在反犹太教的立场上，利用犹太教经典，宣称犹太教徒与神立的约是旧约，已然失效，神决定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既然如此，以前的旧约必然渐旧渐衰，并归至消失。作者否定犹太教的地上“千年王国”，说基督徒只是地上漂泊的客旅，他们的真正之家在天上，由神预备好了。同时，为巩固基督徒的信仰，作者极力强调对神的信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与《希伯来书》出现的同时代，在当时犹太人聚居的中心地区之一的亚历山大城出现了一个无名作者写的《巴拿巴书信》，它呼吁基督徒彻底否定犹太教律法，宣称《五经》只能作为隐喻来理解，如以色列人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不是指巴勒斯坦，而是指救主基督；这位“基督”，并不象犹太人所说是人的儿子，是大卫王的后裔；“奶与蜜”指的是基督教信仰；犹太教经典《五经》中所讲的“割礼”，应看作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犹太教圣殿充斥罪孽，理应受到惩

罚，故而遭受了焚毁的命运，真正的“圣殿”是基督徒的心灵。《巴拿巴书信》反犹太教色彩极其强烈，难以为与犹太教有着渊源血缘关系的基督教接受，在当时流传不广，后来也未列入《新约圣经》。但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情形，从中可见一斑。

较《希伯来书》晚出，托名保罗所作的《歌罗西书》、《以弗所书》承袭了《希伯来书》的思想，一方面反对犹太教，另一方面一再表示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顺服之意。保罗教导教徒：

“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象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象是讨人喜欢的；要象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象服事主，不象服事人。”

如前所述，初期基督教的信仰中心是末世论，安心等待世界末日的很快来临，坚决不接受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敌视周围的一切。但冷酷的现实是，世界末日迟迟未来，相反，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奴隶制出现总危机的条件下，罗马社会却有了某种相对的安稳。这势必要对救主基督的信仰重作解释。于是，世界末日很快来

临的观点被关于灵魂不死和来世生活的教义所取代。这样，基督教便由敌视现世秩序转向迁就现实秩序。为此，对救主的信仰中心逐渐由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再来，转移到他的生前，由此产生对耶稣生平事迹的描绘，力图表明他在世时甚至一出生，就是救主基督。这个一直笼罩在迷雾中面目极其模糊的历史人物耶稣，原来只是信仰的对象，逐渐被说成他的全部活动就是要创立基督教。反映这一内容转换的便是《新约》中的《福音书》。很明显，《福音书》不是基督教兴起时的产物，而是后来基督教徒根据当时的宗教需要逐步发展出来的。

在使徒时代，"福音"只指口传的关于救恩的喜讯，后来逐渐把这些喜讯记录成书，遂成为记录耶稣言行的《福音书》，并在书名上加上作者的名字，以示区别。当时出现的《福音书》种类极多，但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取得了"首正经"的地位，其它各卷都被视为"伪经"了。公元180年左右，法国里昂主教爱任纽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异象中的狮、牛、人、鹰分别象征《四福音书》：狮子象征至高的能力和王权，这指《马太

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主宰并管理全世界；牛象征谦卑的事奉，指《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里，耶稣是一位谦逊、忘我、勤勤恳恳地为人服务的典范；人象征智慧，指《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里，耶稣是一位分享世人的喜怒哀乐的普通人；鹰象征神圣，指《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是启示上帝真理、救赎人类的"人子"。后来，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就把这四个形象分别作为《四福音书》的标记。

《新约》的四本《福音书》中，《马可福音》通常以为出现最早，开始流传的时间约在1世纪末，最后定型于公元130～140年。历来认为，《马可福音》的作者是使徒马可，又名约翰，出生于耶路撒冷利未支派的一个富有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希腊文有相当的造诣，其表兄是基督教初期教会活动家巴拿巴。马可作这本书是为了向所谓"外邦人基督徒"介绍基督教教义，因而很少引用《旧约》。他强调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是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以自己的死亡来救赎万民，有"赦罪的权柄"，有战胜魔鬼的能力。他具有谦逊、忍耐、勤恳的

"孺子牛"式的品德。书中记述耶稣服事人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关于训诲的记录。"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概括耶稣的活动，所以后人又把本卷称为《仆人的福音》，把"牛"作为本卷的标记。

《马太福音》大约自公元125年左右开始流传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教会，最后定型于公元140年左右。它把原来流行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阿拉梅文福音与《马可福音》拼凑起来。因此，书中既称耶稣是犹太大卫王的后裔，又采纳了保罗派所宣传的耶稣是神子；既肯定《旧约》和法利赛人，又反对拘泥于法利赛人的宗教律法。全书是针对犹太基督徒而写，书中增加了下列内容：耶稣家谱和出生故事；耶稣受洗；耶稣的训诲；耶稣行了十个神迹；耶稣召选十二门徒，其中《马可福音》所称税吏利未，到《马太福音》中改成税吏马太。此卷的作者马太宣扬了下列神学思想：

(1) 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是新摩西，是安息日的主人，比圣殿还要大。

(2)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具有审判万民的权

柄，能使死人复活，而且自己也死而复活。

(3) 耶稣建立的教会就是天国，彼得掌管天国的钥匙，是教会的有形的元首，享有管理教会的最高权力，这一说法是罗马教皇成为普世教会元首的理论根据。

(4) 未来的天国就是永生，进入这个天国要进窄门，需要努力争取。

(5) 卷末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提法被教会作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根据之一。

大约2世纪30年代，在希腊罗马又开始出现一本《路加福音》。作者路加是希腊人，生于叙利亚的安提阿，受过高深的教育，曾作过医生，据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均出自他手。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皈依基督的希腊人和其他非犹太人介绍基督的福音。他依据《马太福音》为蓝本，编造救主出生在伯利恒，借犹太教传统称作“大卫之城”的伯利恒，以证明耶稣是大卫王的后代。由于路加长期随保罗传教，他的神学思想与保罗的完全相同。所以，有人把《路加福音》称为《圣保罗福音》。本卷特别强调救赎的普世性和基督对罪人的爱，如：

把耶稣的家谱上溯至亚当，最后还加上了一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由此强调整个人类不分种族都是上帝的子民，救赎不是只局限于选民，而是给予全人类，“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作者用浪子回头和迷途的羊等比喻来强调耶稣对罪人的爱，甚至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时被钉的一个犯人说了一句同情他的话，耶稣就应许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此外，本卷还特别重视祈祷，因而又称为“祈祷的福音”、“罪人的福音”、“上帝慈爱的福音”、“贫苦人的福音”、“世界救主的福音”等，后人亦以“人”作为本卷的标记。

以上三部福音对耶稣的弥赛亚式刻划，虽然不断增加，基本观点一致，都称耶稣被圣灵选召，成为救世主，但都还没有把耶稣称为神，它们通常被称为“同观福音。”而最初流传于公元135年、最后定型于150～160年的约翰福音与前述三福音不一样，它所描述的耶稣完全是神的道成为肉身。《约翰福音》产生的时代正是犹太人第四次大起义失败之际，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异常迫切。此卷以诺斯教派的思想为基

础，直截了当地否认耶稣基督是地上的王。它借耶稣与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对话，宣称信徒要靠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国，得以永生，这就否定了任何地上的千年王国。书中还描述耶稣行迹使五千人吃饱之后，犹太人要强逼耶稣为王，为耶稣所拒绝。它一再声明：基督与基督徒都“不属世界”，还借耶稣之口明确告诉罗马行省长官彼拉多：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这与前三部福音书中，耶稣被处死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建立于诺斯替派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保罗书信》和《约翰福音》大大影响了4世纪后官办基督教。这反映了1世纪下半叶到2世纪中叶这100年间，基督教在斐洛学派影响下，把庸俗化的希腊斯多噶哲学与犹太神学结合，开始形成它的教义时，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因而它一建立，就为希腊、罗马人所接受。这构成了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官方宗教的内在依据。

在《新约》中还有一本《使徒行传》，约出现于2世纪30年代。一般认为，它与《路加福

音》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它的主旨是借描绘彼得与保罗的传教活动，掩盖调和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基督徒与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之间的矛盾，而同时又强调彼得为初期教会的领袖。其所表述的神学思想有：

(1) 教会是上帝建立的，因为耶稣是弥赛亚；

(2) 圣灵一直在指引、协助初期教会的工作；

(3) 把圣灵与圣父、圣子同列，具有“三位一体”的初步概念；

(4) 后世教会的一些“圣事”活动均可以在本卷中找到依据。

除上述收入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外，从2世纪初起，教会中还流传有《彼得福音》、《腓力福音》、《多玛福音》、《犹大福音》、《马提亚福音》、《马利亚福音》、《夏娃福音》、《十二使徒福音》、《希伯来人福音》、《拿撒勒人福音》、《埃及人福音》和《真理福音》以及不以“福音”命名的《十二使徒遗训》、《彼得讲道录》、《彼罗启示录》、《保罗行传》、《牧人书》、《罗马教会致哥林多教会书》等。这些著作亦曾在教会内得到公认

的地位。

与经典形成的过程相伴随的是基督教会及宗教礼仪的逐步完善。从《新约·哥林多前书》记载的有关基督徒集会的情况来看，公元1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会开始建立时，组织极其简单，没有常驻的职业传道人，任何男女教徒都可自称有所谓“属灵的恩赐”，在狂热的宗教集会中任意呓语。宗教仪式之后，共同用膳，表明信徒在基督里合成一体。这样的教徒集会自然需要有点钱又有闲的教徒来组织和主持，他们被称为长老，执事。公共用膳和救济贫苦教徒，需要有人管理财务，这个财务管理人就以当时称呼异教神庙财政官的名字（原意是监督人）命名。最初，管理财务的人，地位在长老之下。随着富有教徒逐渐增多，教会所收捐项日加，财务管理越来越重要。教会主持人首先就要掌管经济大权。初期教会中，宗派林立，各命正统，互相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裁决教义争端，需要有规章纪律，并能付诸行动。这时，教会主持人掌握财权，也就逐渐掌握了神权。由此逐渐确立了基督教会的主教制，时间约在2世纪中叶。这个时间出现的《罗马教会致哥从多教会书信》

提出基督召选使徒，使徒委派主教会吏，主教会吏如无不端行为，不能免职。它表明主教制的正式建立。

对于基督教来说，作为一种宗教而没有礼仪是一个危险的兆征。在争取信徒的斗争中，基督教与之较量的对手，正凭借一大套有声有色的、感情洋溢的崇拜活动和法术活动把群众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基督教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崇拜活动和法术活动，以与其竞争对手抗衡。同时，生活实践也表明，基督教能够从各种信徒由之而转入基督教的那些宗教中借取这些活动。

基督教教会用以建立其崇拜体系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它除了可以吸收犹太教的宗教礼仪外，还可以从希腊化世界的诸宗教中吸取更多的内容。而且，基督教礼仪的确立正是建立在同化其他宗教的礼仪、风俗和教会制度的坚强信念之上的。其结果就是兼容并包，把犹太教的仪式和异教的仪式全都吸收过来，同时，予以改换和更替。

圣餐礼是基督教礼仪中确立最早的。我们从“福音书”关于最后晚餐的传说中，可以找到基督教对圣餐礼一词的含义所作的专门解释。

从起源上来说，这种礼仪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和图腾崇拜。一个人吃神的肉，喝神的血，就会获得他的力量和智慧，胆量和谋略。在基督教历史的早期阶段，圣餐礼是基督教仪式的中心内容，对于整套礼仪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大规模地举行这种仪式，结果就演变成社团成员的公共聚餐。这种聚餐，希腊文取名“agape”——爱筵。事情不能只限于集体进食，尤其不能只限于吃“主的肉和血”，仪式进行中势必还要念许多祈祷文以及诵经讲道之类，这在基督教仪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演变成为礼拜程式。

基督教的另一项礼仪是受洗礼。在最初几代基督徒中，加入新宗教的大都是成年人，那时就是给他们施洗礼。但后来教籍变成世袭，父母自然总是让自己的子女生下来就做基督徒。所以，新生婴儿的洗礼成为一种宗教习惯和宗教法规。

洗礼和圣餐礼是以后逐渐形成起来的基督教仪式的基础。它们与基督教的经典《新约圣经》和教会主教制一道，构成了基督教成为一个独立完备的新宗教的标志。

屈辱的下跪：基督教成为国教

诚如19世纪的英国基督教学者韦士考所指出的那样，初期基督教的发展是由下层民众而及知识分子，然后达到统治阶层，并依附剥削阶级取得发展，日益成为剥削阶级奴役下层民众的工具。

到公元2世纪中叶时，基督教就已具备了与罗马政权结合的内在条件，尽管此时的罗马皇帝总以敌视的眼光看待这个新兴的教派。这些条件包括：阶级基础、宗教教义、新约圣经的定型、基督教全国性机构的确立。

阶级基础。基督教初兴之时，其信徒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如奴隶、手工业劳动者、破产的小奴隶主、商人和城市贫民等。最初，它在犹太教会堂中活动，随后，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出现分歧，被后者赶出会堂。基督教需要有自己的活动场所，还需要有人供养一些游行的“使徒”、“先知”，进行宣传与组织活动。而经济上赤贫的奴隶们根本无力提供这一物质条件。但倾心于基督教义的一些富裕的上层人士则可以提供基督

教的活动经费。到1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中的保罗派就已经依附奴隶主和经济宽裕的教徒，在他们家中建立教会，并为这些教徒到处扬名，抬高他们的地位。那些富有的教徒，在教会里享有特殊地位。新约中的《雅各书》说教徒集会时，有钱教徒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走进教堂，就被教会执事引导坐在好位上，穷教徒穿着肮脏衣服走进去，却被执事命令站着或坐在地下。随着富有阶层加入教会的人增多，富有的教徒不仅掌握了教会的领导权，还可以自立教派，宣传一套合乎自身利益的教义。

宗教教义。初期基督教本来是宣传一个拯救教徒、伸张正义的救世主。它虽然消极地等待救世主的降临，但还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罗马帝国的不满情绪。而在建立教会，上层统治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后，那个拯救教徒脱离苦难的救主耶稣，就变成了教导信徒忍受苦难的榜样。较早出现的《罗马人书》还只是提倡消极顺服“在上掌权的”，发展到2世纪中叶.《提摩太前书》就开始训诲教徒要为君主和一切在位的祈福。在对待罗马帝国的态度上，基督教一方面宣传“神的国不属这世界”，借以阻止教徒投入反抗罗马

帝国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宣传“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是神的佣人”，借以动员教徒承认并支持罗马帝国政权。到2世纪中叶，查士丁就把顺服罗马帝国，向帝国交税纳捐说成是遵循耶稣的教导，还说，基督徒虽然只敬拜神，却为能忠诚服侍皇帝而欢欣，基督徒不仅承认国家的权力，还为皇上的权力祈祷。此时，基督徒效忠罗马统治已被看作是遵循耶稣的教导。与此相关的教义是，下层教徒忍受现实的、特别是罗马统治带来的苦难被赋予了一层信仰上的意义，被看作是信心的磨炼，信徒将得到神的国作赏赐，它宣称：

“主叫我们：不但爱邻舍，也爱仇敌；叫我们不但慷慨施舍，而且自动献给那剥夺我们财物的人。不要计较他们的恶，但要顺着自己的美意与天父的榜样而行。因为天父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

从此，基督教的救世主形象就日益强调它是一个甘心忍受苦难的奴仆，忍受苦难就是战胜苦难。这样，甘愿忍受苦难俨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了。

基督教的全国性发展与罗马统治的需要合

拍。进入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尖锐斗争的艰难时期。帝国危机遍及经济和政治生活、社会和个人生活、内政和外交局势以至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条件下，罗马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动荡不安的处境，由于流行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日益加剧。而这一动荡、昏暗的思想环境，无论对基督教还是对其它宗教而言，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契机，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其中哪种宗教更加富于生命力。不言而喻的是，基督教正是处于生机勃勃的上升阶段。因为它具有在上个世纪就已形成的世界主义倾向并具有民主性，对社会下层故作姿态地表示仁爱，而实际上又并不威胁有钱有势的社会阶层，这使得基督教迅速超过罗马国教和其它宗教，占据了帝国各族、各阶层民众的心灵。同时，基督教宣扬不抵抗和绝对服从，对罗马当局采取披肝沥胆的效忠态度，真正吻合了当权者的统治要求。因为影响遍及全国各阶层而又不主张分裂和反抗的基督教不会象帝国内部的地区性、民族性宗教那样助长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倾向，造成杂乱无章的混乱局面。所以，在占满罗马帝国宗教舞台的各种崇拜中，没有什么崇

拜能比基督教更能被罗马皇帝用作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

但是，上述条件并不表明基督教就能立刻获得罗马当局的青睐。从3世纪起，基督教在帝国疆域内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就同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教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罗马教神化罗马帝国的皇帝，强制各民族崇拜罗马皇帝，企图以此来强化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督教则鼓吹天国即将来临，号召人人悔改，声称只要认罪就能得救，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帝国、民族、家庭的神祇和神权统治，从而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基础、打乱了固有的秩序。这是罗马皇帝不能容忍的，尽管他们意识到基督教宣扬的顺从意志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罗马统治者在对基督教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也不断迫害基督徒。戴修斯在位时，他为了恢复罗马教的地位，强迫基督徒向罗马神献祭，抗拒者立刻处死。公元284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登位后，通过伪造基督徒两次放火梦烧宫廷事件，于公元303年发动了对基督教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宫中的基督教官员和其他官员被悉数处死，教会财产被没收，《圣经》被销毁，教徒

集会被禁止，并强迫人民接受罗马国教。

罗马政权对待基督教的矛盾心态决定了基督教之成为国教尚需一段时日。这就使得公元3世纪至4世纪初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呈现较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但在基督教内部，已掌握教会的社会上层人物却表现了苦苦单相思的倾向，他们觉得，争取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许可是他们心灵稳定，生活安裕的最大保障。因此，面对徘徊观望，时喜时怒的罗马统治者，基督教会频频挥动翠绿的橄榄枝，迫不及待地迈开了争取罗马统治者的步伐。

基督教会的这一行动从1世纪末开始，其代表人物便是出身于奴隶主阶级的、被基督教会称作“教父”的一批基督教神学家、著述家、护教家。

2世纪初叶，帝国东部教会的希腊神父瓜德拉都向罗马皇帝哈德良送呈护教申诉书。

2世纪中叶，罗马皇帝安托宁时代，基督教护教学者查士丁在其著名的《护教首篇》、《护教次篇》之中，陈述了皇帝应允许基督教存在并发展的理由。他说基督徒奉公守法，致力帝国内部

和平，不求发财，还救济穷人，并申辩道：

“当你听说我们(基督徒)盼望一个国度，你也许以为我们所盼望的是人世间另一个国度，但我们所指望的是来世的、上帝的永恒国度。”

“我们的义务是：把属该撒的归给该撒，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我们称颂上帝，在其它一切事上，我们都甘心情愿地服从皇上，确认你是君主，是民众的领袖，我们祈求上帝使你执政掌权充满智慧。”

到奥里略时代(公元169～177年)，小亚细亚撒狄城主教梅利又向皇帝呈献《护教篇》，宣称，基督教应运而生，将为罗马帝国带来福祉。

2世纪末，护教家德图良又向当时的罗马皇帝塞佛鲁·卡拉卡拉送呈《护教篇》，指出，基督徒不以向偶像献祭的方式为皇帝祈求平安，而是向那永恒、真正的活神吁求，赐皇帝平安。德图良还力陈基督徒与罗马帝国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我们为皇上，为整个帝国祈祷，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理由，因为我们知道，那可怕的天地末日，幸亏仰赖罗马帝国方始延期来临。我们祈求天地末日延缓到来，使我们不致遭难，故此，我们盼望国运长久，神按立皇帝于列国之

上，为神施行审判。”这样，早期基督徒盼望改变罗马统治的末世说，却变成了基督教会祈求罗马帝国国运长久、使天地末日延缓来临的学说了。

面对高高在上的浩浩皇威，圣洁的耶稣弯下了尊贵的膝盖。是十字架的堕落，还是堕落的十字架？

1世纪末至3世纪末基督教会争取罗马统治集团的努力收效显著。1世纪末叶，罗马政治集团中的反对派开始拉拢基督教以壮声势，罗马皇族成员不断有人皈依基督教。3世纪上半叶，罗马皇帝亚历山大·赛佛鲁的母亲在安提阿成为基督教主教奥利金的门徒，而且，帝国行省总督、财政官员与基督教主教有密切的往来关系。

于是，罗马统治者对待基督教的政策由镇压与怀柔交替并用逐渐变为以怀柔为主，并最终将之视为罗马国教，作为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

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外有日耳曼人的侵扰，内有奴隶、隶农与城市无产者、贫民的不断起义，统治集团内部又为争夺权力而战火绵绵。

工农业凋敝，商业萧条。整个帝国大厦已成总崩溃之势。

此时当位的戴里克皇帝面对山河变色之危，计无所出，只得求助于传统的罗马国教，宣布自己就是万民仰视的神。但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行省的将军拥兵自据，为争夺皇位兵戈相见，这就无形之中粉碎了“皇帝即神”的神话，罗马国教也随之瓦解，再也无力为罗马帝国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如同溺水将死的人一样，濒临灭亡的罗马皇帝急不可耐地抓住了基督教这棵救命的稻草。

公元311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加勒里乌及其继任者莱西尼乌和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君士坦丁联名发布《宽容敕令》，宣称：

“为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曾致力重建罗马古代典制和统一社会制度，其中对背弃祖代相传宗教的基督教，要求他们返回正路。……在要求基督徒服从古代典制的法令颁布以后，绝大多数人已返回正路，但另有不少人现在既不到神庙，又不敬拜他们的上帝。有鉴于此，我们现在宽宏大量，准许这些人继续当基督徒，恢复礼拜场所。基督徒今后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并应为

国家社会免遭灾难、得享安宁祷告上帝。”

这表明，罗马统治者已公开承认基督教有维护帝国统治的作用，与其听任群众不信任何宗教，不如宽容基督教的存在。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莱西尼乌在米兰晤面，联名发表著名的《宽容敕令》(又称《米兰敕令》)，以便利用基督教徒。《敕令》中宣称：为了确保社会安宁，民众的宗教信仰都受保护；罗马神庙和它的祭司、大祭司都维持旧制，皇帝还保持“至高祭司”的尊号；基督教的集会场所一律无偿发还，教会的其它财产也同样发还。罗马帝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基督教会拥有财产。

在基督教成为国家教会的演变中，君士坦丁的作用不容忽视。君士坦丁是一个极具眼光的政治家，雄心勃勃，力图重振罗马帝国的声威，外侮敌寇，内弥混乱。他正确地意识到，帝国上层集团内旧皇族所代表的旧奴隶主贵族统治已陷入重重危机，无力自拔。所以，他转而依靠一批新兴奴隶主贵族，作为与西部帝国的统治者莱西尼乌争夺帝国统治权的力量。由于罗马国教长期为旧奴隶主贵族所控制，而立意推

翻旧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新奴隶主贵族不能再依赖罗马国教这个思想武器，便求助于基督教，以之与罗马教抗衡。君士坦丁更是寄希望于基督教，对之极尽拉拢、利用之能事。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发布一系列诏令，命非洲行省长官火速归还教会一切房地产及其它财产；承认主教在教会的领导地位，诏令迦太基主教可从国库中支取神职人员的一切开支，并且指示他镇压“异端分子”，一经发现，立即向法官报告。

公元 323 年，君士坦丁战胜莱西尼乌，夺得皇位，暂时统一了摇摇欲坠、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他大力收买、支持基督教会，修建教堂，把罗马拉特兰皇宫拨作主教官邸，皇族中的一些公主也纷纷修建教堂。君士坦丁还颁布一系列法令，教会可以承受教徒遗产，释放奴隶要向教会备案，犹太人如迫害基督徒，处以火刑，教会经营的工商业，与地方长官、高级元老所经营的工商业一样，享受免税特权。

在军事得胜，皇位巩固的情况下，君士坦丁逐渐加紧利用基督教，削弱旧的罗马国教。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堡建成，各地神庙的塑像被拆除，运往君士坦丁堡装饰城市，并停止兴建新的

神庙。在君士坦丁扶植基督教的措施下，大批民众改信基督教，中等阶级的上层，鉴于基督教神职人员享受种种特权，也纷纷皈依基督教，设法取得神职人员的身份。一时之间，基督教队伍迅速膨胀，俨然为一家独尊之势。

教会的发展、壮大是以听命于皇帝为前提的。君士坦丁在培养基督教势力的同时，也严格控制基督教，使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的神圣权威，不断受到世俗权力的挑战，基督教会从教义、宗教活动到人事、经济均得听命于皇帝。

4 世纪初，帝国东部最重要的基督教中心亚历山大城的教会大主教为扩大个人权力，与神甫集团发生了尖锐冲突，由此引起了各地教会的长期纷争。这显然不利于君士坦丁扶植基督教充当统一帝国的政治思想工具。为此，君士坦丁采纳其宗教顾问何西乌的建议，于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亚召开全帝国的宗教会议，参加的有近 300 名主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尼西亚会议。

在尼西亚会议开幕之时，这位尚未入教的皇帝亲致训词，呼吁教会的统一，反对分裂。在

他的授意下，会议制定了旨在统一教会信条的《尼西亚信经》，强迫主教们接受，不从者立即逮捕入狱。《信经》抬高基督的地位，与神“同性”；同时规定教会法规二十条，加强主教权力；另外，加强皇帝对教会的控制权，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宗教会议，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加强主教的权力，也就是加强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因为主教全由皇帝任免。通过这样的措施，君士坦丁牢牢掌握了基督教会，不仅用来巩固国内统治，还用之于对外扩张。

君士坦丁死后，其继任者继续支持、控制、利用基督教。君士坦丁的次子康士坦蒂曾宣称：“我的意愿就应当成为教会的经典”。4 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会在城市中依靠皇帝刀剑的支持，已压倒罗马国教。375 年，革拉先任罗马皇帝，禁止向神庙献祭，皇帝也不再继续充当罗马神庙的“至高祭司”。382 年，革拉先应罗马主教请求，发布命令，强制帝国西部教会接受罗马主教管辖。公元 391～392 年，狄奥多西皇帝连续颁布法律，禁止在任何场所（无论神庙、公共场所或私人家中）献祭，异教神庙一律关闭，违者罚款黄金二十五镑，进行献祭活动的房屋、土地

被没收；知情不举的，科以同罪。一般认为，狄奥多西的392年法令标志着基督教正式成为了罗马国教。

这样，从313年的《米兰敕令》时起，经过80年，基督教终于取得了唯我独尊的最高宗教权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基督教伴附世俗政权发展，最终获致了中世纪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其权威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所以说，公元392年的法令应该算是基督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章　狼狈为奸的哲学

共同的利益需求，使上帝和国王走到了一起，很快，《圣经》与马刀一同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

——题记

"世人之城"的哀叹与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教义及历史哲学的系统阐述

强盛的罗马帝国存在了3个世纪，终于走向了它的暮年。从4世纪开始，帝国大厦在夕阳的照射下摇摇欲坠。昔日的繁荣如同烟飞灰灭，不复回返了。

英明的狄奥多西一世皇帝死后，帝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硝烟弥漫，刀光剑影。

公元395年，地域辽阔的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部。纵横亚、非、拉的帝国铁骑已成昔日辉

煌。

面对蜂涌而来的日耳曼民族的强大铁军，西罗马帝国抵抗无力，节节败退。

公元 407 年，哥特人侵入高卢；

公元 409 年，汪达尔人侵入西班牙；

公元 410 年，西哥特人攻陷“永恒之城”罗马，将罗马城洗劫而空，大部分罗马奴隶主贵族被处死、被俘、被卖为奴，或者逃亡到北非和亚洲；

公元 429 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海侵入北非，占领了这片西罗马帝国最富庶的土地；

公元 476 年，日耳曼族灭掉西罗马帝国，占领了帝国内的全部土地，奴隶主大土地制几乎全被消灭。

而建立于奴隶制社会基础之上的早期基督教亦随之没落。占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对于代表大奴隶主、本身又占有大量土地的基督教会采取敌视态度，剥夺教会田产，逮捕、驱逐教会人员，致使许多主教、教士逃亡，教会无力活动。而同时，罗马帝国内的旧奴隶主贵族又把帝国的衰败与覆亡归罪于基督教，他们恶毒嘲笑基督教，说它不仅未能保护罗马帝国，连基

督教堂本身也被洗劫。

刚刚兴盛起来的基督教似乎走到了尽头，正如天主教的初期教会史家杜申所描述的那样，对于基督教来说，公元5世纪是“一个哀伤的世纪，一个分崩离析、没落毁灭的世纪。”

假如基督教真的就此衰落以至灭亡，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文明的两大文化源泉之一。它的影响深远，它的历史地位，正在于它面对困境时的顽强生命力。

这就表现在，当基督教与衰弱的西罗马帝国一同被日耳曼人鞭挞、杀戮时，仍在思想上发展、成熟，具有了开启、引导人们走入中世纪大门的内在素质。如果说，日耳曼入侵大潮冲击之后尚有什么存在下来的话，那就是基督教和破乱的罗马城墙。

那个保存和发展了基督教的人是奥古斯丁主教（公元354～430年）。

他是西方基督教会的著名主教安布罗斯的弟子、北非希坡城的大主教。

从如下一段关于他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发展的杰出贡献：“自使徒时代以来，古代教会在奥古斯丁身上取得了最

高的宗教成就。尽管由于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性质与东方不同，因此他对东方教会影响较小，但整个西方基督教都蒙受了他的恩惠。西方宗教生活具有远远超过东方宗教生活的优越性主要是他留下的遗产。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大多数特点起源于他的神学思想。同样，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在灵性上都可以追溯到他。”

简而言之，是他，使基督教具备了统治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思想素质。

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生于努米迪亚的塔加斯特，即今天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区的苏克赫腊斯。其父是异教徒，地位甚高，但家产不多，为人懒散，世俗气重，直到临死前才皈依基督教。其母是位很高尚的基督徒妇女，对儿子抱有热切的希望。

奥古斯丁先在塔加斯特附近的马都拉上学，之后前往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养成了勤奋求知的好品德。在听了著名主教安布罗斯的动人讲道之后，他研读了《圣经》内容，逐渐信服基督教义，并于公元386年放弃信奉了9年之久的摩尼教，转而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会史上

影响深远的宗教思想家。

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把宗教看作是同活生生的上帝建立至关重要的关系。他在表述其神秘主义的虔诚的《忏悔灵》一书中很好地阐明了上述观点。此书一直是描写宗教经验的经典作品。他写道：

“你（指上帝——作者）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

因此，“亲近天主，为我有益，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内，我也不能在我之内。而你则‘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你是我的主，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

“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致这力量的门路，可是无从寻觅，一直到我拥抱了‘天主与人类之间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赞美的天主，’他呼唤我们。”

“主啊，我要热爱你，感谢你、歌颂你的圣名，因为你赦免了我如许罪恶。我的罪恶所以云消雾散，都出于你的恩赐与慈爱，而我所以避免不犯，也出于你的恩赐。”

这种表白个人虔诚信仰的话语之深刻是自

保罗以来教会所未曾听到过的，因而对后来的教会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如果说，奥古斯丁感情世界里的上帝，是一位人可与之建立个人联系的神，人只能在他那里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善；那么，奥古斯丁在描述哲学意义上的上帝时，他采用了从新柏拉图主义借用来的术语。上帝是纯粹的、绝对的存在，他不同于一切形式的、变化无常的被造之物，他是一切真实的存在之物的源泉和基础。奥古斯丁很好地将这一观念运用于阐述构成西方神学思想的决定性内容三位一体学说之中了。他在其巨著《三位一体论》中写道：

"圣父、圣子、圣灵，一位上帝，唯一、伟大、全能、善良、公义、慈悲，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

"圣父、圣子、圣灵，具有同一实体，上帝造物主、全能的三位一体，在不可分割的进行同一工作。"

"不是三位上帝，也不是三个善，而是一个位上帝，全善、全能，三位一体本身。"

与德尔图良等神学家说圣子与圣灵从属于圣父不同，奥古斯丁更强调三者的统一性，以致

把三个“位格”说成完成全等同。“在这三位一体中，三位是如此地绝对等同，以致就神性而言，不仅父不比子伟大，而且父和子加起来也不比圣灵伟大。”

由于这种统一性和等同性的观念，奥西斯丁主张：

“道只从圣父上帝而生，圣灵主要也由他而出。而我加上主要这个词，是因为我发现圣灵也由圣子而出。”

这一观念在西方教会广为流传，在公元589年于西班牙召开的第三次托莱多会议上被承认为属所谓的尼西亚信经的一部分。

对于道成肉身，奥古斯丁既强调其神性，也强调其人性。“上帝之子耶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万世之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人……因此，就其是人而言，圣父比他伟大”。他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介，只有通过他，罪才得赦免。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历时13年写成的《上帝之城》。此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反驳旧奴隶主贵族对基督教的指责。书中第一至十卷，论述罗马历史和宗教，宣称它面临的灾难是

罗马人的罪孽所造成的，异教神祇并未给罗马人带来任何好处，罗马人在基督教流行之前灾难更多。从第十一至二十二卷，奥古斯丁阐述了全书的主旨，即世人所谓“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他号召人们要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这个“世人之城”是社会秩序的必要保护者。奥古斯丁虽然看到了罗马帝国覆灭的前景，但还力图为垂死的奴隶制社会辩解。他说，帝国的命运、个人的祸福只是神的计划所预定的旨意中的一个片断，比罗马历史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历史。“世人之城”只是暂时的、不完全的，“上帝之城”则是永久的、完美的。围绕这一主旨，奥古斯丁论述上帝与天使、撒旦与魔鬼创世，人类始祖亚当的犯罪造成人类与之俱来的罪恶品质。在旧约下的拯救因世人犯罪未能实现，基督于是来临，施行救赎，设立教会及其圣事，最后基督将再临施行审判，那即是世界的结局，是上帝之城的永恒胜利。

正是在这本书中，奥古斯丁表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观点，即原罪说和预定论。

原罪说的最初来源是 2 世纪教父所鼓吹的“奴隶受苦是犯罪的惩罚。”奥古斯丁大大发展

了这一观念，宣称，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再加上自己的罪恶生活，整个世界充满了邪恶虚伪，人从出生时起就有了罪恶的品性，所以，全人类注定要永远受到惩罚，经受磨难之苦。在这种原罪状态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解脱，现在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要得到解脱，只有靠这位救赎者的恩宠。”

得救来自上帝的恩宠，这种恩宠是人完全不配得的，是完全白白赐与的。上帝从世人中挑选他中意的人，这些人是上帝预定要得救的，不论他们行善也好，作恶也好。这就是基督教神学中的“预定论”思想。依据“预定论”，世人靠自身努力毫无得救希望，只能指望“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则表现在基督身上。奥古斯丁写道，所谓“拯救”就是甘当奴隶，甘当奴隶就是在苦难中得救。总之，苦难是命中注定，任何努力都是徒然，唯有甘受苦难才是得救之道。这是神的预定旨意，神的恩典。

这样，奥古斯丁阐述的这套系统的神学理论，就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法兰克王的征服：政权与神权

恩格斯在其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换言之，欧洲的封建化过程就是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过程。

尽管从野蛮荒原杀来的日耳曼人一度对基督教会采取敌视态度，抢掠财产，焚烧教堂，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基督教比政治、法律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因而不容易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衰亡下去。相反，从认识根源来看，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不能解释支配人们生活的外部力量；而且，基督教拥有联系群众的教会组织形式，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基督教渡过灭亡的危机而残存下来。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中的罗马教会（西派教会）面临的危机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东派教会的牵制和压迫；二是日耳曼人的敌视和屠杀。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东西教会之争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但东部教会迫使西部教会接受其为基督教首席教会的想法依然实现无力，而第二个问题则关系着罗马教会的生死存亡。所以西派教会主要考虑的应是：承认“蛮族”所建立的国家这个现实，向那些地区派出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积蓄力量，重振西派教会。于是，一批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教士们或步行，或骑马，翻山越岭，深入日耳曼人的占领区，进行不倦的说教活动，以感化那些野蛮、凶残的北方入侵者，使之皈依于十字架的神威之下。

总之，由于基督教本身的成熟和发展，也由于它还有浓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需要，也由于传教士的艰苦努力，罗马教会很快与落后的日耳曼人结合而重焕光彩了。

准确点说，6世纪以后，基督教与当时崛起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的法兰克王国结合，而逐渐发展。

法兰克王国是由克洛维建立的。他是法兰克部落同盟的诸王之一，精明强干，雄心万丈。他利用与其他部落联盟，从高卢北部向中部、南

部扩张，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以诡秘的阴谋和冷酷的杀戮，除掉了法兰克诸王，将整个法兰克诸部落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如何统治刚刚掠夺到的地区？如何保护眨眼间拥有大片土地的法兰克贵族的切身利益？克洛维选择了基督教会。

公元 496 年，当日耳曼其它部落仍在到处屠杀基督教神职人员，焚烧基督教堂时，克洛维却出人意外地命令他的族人和士兵全部受洗加入罗马教会。他还接受了当时高卢南部维昂主教阿维都提出的入教条件：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而且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使人民全部信教；向征服地区人民传教。

事实证明，克洛维的这一政治措施收效甚巨。得到罗马教会支持的法兰克军队在与日耳曼诸部落的战争中如虎添翼，屡战屡胜。

公元 496 年，克洛维挥戈东上，征服阿雷曼尼人；公元 507 年，南伐西哥特王国，由于罗亚尔河沿岸城市主教的支持，克洛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波瓦提埃之役，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二世战死，亚奎丹地区全部并入法兰克王国版图；吞并西哥特之后，克洛维凯旋回都尔，就在这

时，他收到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的敕书，任命他为执政官。在都尔圣马丁教堂里，他穿上紫色袍服，披上披肩，头戴王冠，接受臣民的叩拜。墨洛温王朝从此确立。

为了表彰罗马教会，克洛维于公元511年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法规。这些法规同时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反映了封建统治初期便开始形成的封建神权统治。它重申了古代罗马法中神庙的神圣地位的观点，规定：凡是犯有杀人、盗窃、奸淫罪的，可到教堂避难，任何人无权进教堂搜捕犯人；奴隶如进入教堂避难，只要奴隶主声称他认罪可予赦免，便应立即强制将奴隶送回主人，如奴隶拒绝离开教堂，奴隶主可进入教堂搜捕；教堂举行弥撒礼时，周围全体居民必须参加，礼仪未结束前不得离开教堂；新的封建主帮助教会取得更多财富，富有教徒捐赠教会的土地、葡萄园、奴隶或其它财物，一半归主教所有，另一半由其他神职人员均分；教会及神职员的财产免税；教会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神职人员的任命必须经国王或地方法官批准。

公元549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又进一

步扩大了教会的特权，它规定：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有任命主教的权力；主教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有权处分被控告犯有渎职罪的法官；教会的产业永远属于教会；教徒死后，其财产归教会所有，其他人不得染指侵占；教会的产业全部免税；一切神职人员都免除任何劳役负担。

这样，教会便获得了它在西罗马帝国时期远远不能比拟的权益。到公元7世纪初叶，它已成为法兰克王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取得了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法兰克王国国王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有全体主教参加；教会法规在任何场合都应贯彻实施；任何神职人员触犯国家刑律时，只能由主教按教会法规审理，国家法庭无权插手判决。当时，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实际上是国家法同宗教法"合二而一"的作品。从《撒利克法典》中有关"神意裁判法"的内容中就可很好地看出这一特征。

"神意裁判法"源于古日耳曼人崇拜异教诸神时的习俗规定，其内容是：法庭把奴隶或农奴投入深水中，如果他有罪，则水不会接受他，因而他会浮起，那样他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无罪，则将下沉，从而溺死；或是命令奴隶或农奴

把手臂伸入沸水中，或手持烧红的铁块走若干距离，如果三天后未被烫伤，则为无罪。如果贵族教徒被控犯罪，则只要他到教堂起誓，声称无罪，他便认为无罪；后来又增加出所谓助誓人，陪同宣誓，相信被告无罪。如贵族杀死一个自由人，有七个助誓人便可以摆脱罪责。一个自由民教徒如杀死另一个自由民，则需有十一名助誓人。另一种搏斗裁判法，也叫上帝裁判法，也是应用于贵族和自由人，认为上帝会使无罪者获胜。这种“神意审判法”一直沿用到13世纪。

克洛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地给予教会各项特权，这一做法从较短的时间看，“利益”的方面甚为显著，但是在这种“利益”的背后，却隐藏着教会在统治集团中地位不断上升，以至形成了“势大盖主”的矛盾，在以后几百年中发生了“主教叙任权”的问题，并由此发展为“教权同皇权孰大孰小之斗争”，这样的后果，恐怕是克洛维所未预料的。此是后话。

此时的罗马教会，依然处于法兰克王国的严密控制之下，羽毛未丰。法兰克王有任命主教的权力，神职人员想要谋取主教职位，必须出钱向国王赎买。从6世纪起，出钱赎买主教职位已

成惯例。国王为多收贿款，有时把同一主教职位卖给两人，由他们两人同任一个教区的主教；也有时，过不多久，又把原来的主教撤职，以便重新出卖职位。

尽管如此，基督教会的势力仍在国王严密监视的眼皮底下迅速地膨胀。其显著标志就是教会日益发展为大封建领主。

墨洛温王朝拉拢教会的主要手段是大片地赠给教堂土地。这使得教会拥有的土地增加。7世纪时，不少教会拥有7000～8000处庄园，拥有2000处以下在庄园的教会只能算小资产者。在高卢西北部的纽斯的里亚，教会拥有将近总面积1/3的土地。

如何获致更多的财富?6世纪在日耳曼族地区活动的爱尔兰籍基督教传士柯伦班的事例为我们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当时，修道院在西欧出现，柯伦班就是以建立修道院著称。同时，他闻名如世的还有敛财的手段。在他的修道院中，修士们终日劳动，患病也不得休息，每顿饭只有一片面饼和开水，每晚还要按宗教条例禁食。体罚是家常便饭，最轻微的触犯院规也要打6鞭，如果与一个妇女说了话，而无第三者在场，

要打 200 鞭，或折成禁食两天。柯伦班就这样依靠修士们的血汗聚敛了大量财富，并成为三座修道院的总管，俨然统治一方的土皇帝。

如果说柯伦班的活动代表了教会在经济实力上的增长，那么，被称为“伟人”、拉丁教会四大教父之一的教皇格列哥里一世(公元 590～604 年在位)的成功则代表了教会政治地位的日趋上升。

格列哥里一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受过严格而系统的教育。他起初充当罗马城执政官，公元 590 年当上教皇。

当时罗马教皇须经东罗马皇帝批准，才能祝圣登位，东罗马皇帝便以此控制教皇，并分享教皇的部分经济收入。

格列哥里一世野心勃勃，不满于受人控制现状，寻找一切机会摆脱东罗马皇帝的控制。6 世纪末，伦巴人挥戈直驱意大利北部(当时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还属于东罗马帝国)，罗马城与东罗马帝国的联系被完全隔绝，格列哥里乘机掌握了罗马城的统治权。之后，他与伦巴王谈判投降，并劝说东罗马皇帝与伦巴人媾和，承认伦巴人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同时，格列哥里利用当

时的混乱形势，把他的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以及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的广大地区，成为意大利中部诸省的实际统治者。在罗马城内，他是行政长官、掌握武器、控制法庭监狱、铸造货币、管理市场、修建城垣、办理学校等，可谓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然而，格列高利的野心远不止于这些。他以意大利为基点，将教皇权力向四周辐射，争取西班牙的西哥特王皈依罗马教会，拉拢高卢的墨洛温王朝，并将势力伸向不列颠和北非。

在6世纪末的不列颠，日耳曼人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建立了7个独立的王国。入侵的日耳曼人信奉异教，对不列颠人所信奉的罗马帝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凯尔特教会加以无情破坏。格列哥里一世为扩张教皇政治势力，于596年命令40名修道僧去不列颠，并指示他们："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仪式节期与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稳步前进"。这批修道僧先争取了一个日耳曼国王率领全国到大河里受洗入教，然后建立修道院，定居下来。此后，不列颠

经过100多年的混战、相互屠杀，到7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人才征服全岛，稳定局势，基督教会以引进罗马法、设修道院帮助新统治集团巩固统治，从此教会、修道院大批设立起来。

格列哥里一世不仅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政治野心家，也是一个精明、苛刻的大土地领主。他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收取现款或实物地租。每个庄园交给一个管家（通常是神职人员）来管理，管家必须向教皇送呈详细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庄园经营情况和当地教区神职人员的行动。格列高里则坐镇教堂，向各庄园的管家发出详细的指示。如他曾不倦地教导西西里的副管家兼教廷代表彼得如何多收益：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立即出售，这样至少还能从它们身上捞得一些利益。"

"所有属于教会的农具必须在它们因年久而锈成废铁以前售出。……应把你们所征集的全部缴款送来，连同全部帐册。"

格列哥里还大规模经商，向埃及运销木材，向君士坦丁堡运销麦子，把撒丁尼亚的生铁运销给东罗马皇帝制造武器，为此，教会制造了自

己的船舶，作为运输工具。

格列哥里竭力推动在西欧各地建立修道院，作为受教皇统治，巩固并扩张封建统治的中心据点，以适应当时战争连绵不断，旧的奴隶制帝国分崩瓦解，许多大土地领主割据称雄、混战不已，而广大民众思想不稳的动荡形势。当时的修道院并不象后来那样是教士的团体，而是在封建压迫剥削下走投无路，被迫依附教会，过宗教苦修生活的俗人的团体。这些人一进入修道院，便受国王委派的修道院长严密控制，不再过问政治。在国王贵族的扶持下，修道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大的修道院往往有上千名修道士，小的修道院亦有二、三百名修士。

在修道院里，修道士们必须严格遵守《圣本尼狄克特法规》。此法规由意大利贵族出身的本尼狄克特制定，他曾主持6世纪上半叶西欧最著名的卡西诺山修道院。法规内容概括如下：

进修道院充当修道士必须宣誓、听命、安贫、守贞；

修道士不得有任何私人财物，一切都属于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基督的代表，”他有权惩罚

那些不安份、不受管教的修道士，“即使在他们初次犯规时也应鞭笞体罚，因为《圣经》教导说：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修道士必须绝对服从修道院长，如敢顶撞，即予惩罚；

修道士的言行必须遵守七十二条规定，如任何时候不许发怒，不准发牢骚，不许说笑，不许贪吃贪睡，应当害怕末日审判，每天要流泪叹息，向上帝认罪，要以爱基督的心去爱仇敌，等等；

为了训练“谦卑”之心，修道士要经过十二个阶段，如“要愉快接受不公道待遇”，“要甘居卑贱地位”，“不但在口头承认而且从心里确信，自己比他人都更卑下，如同《圣经》教导的，我是虫，不是人”，最后要做到“时刻想到自己罪孽深重，如同站在审判台前，不敢抬头，不敢说，不敢动”；

修道士每天要八次集会读经祷告，还要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劳动。

这些修道院便是利用修士整年劳动和教会的免税特权，除从事农业外，还经营葡萄园、酿制葡萄酒，运销各地。修道院有一批商业代理

人，称为“教会商人”，从事长途贩运，牟取巨额利润。这种封建大庄园式的经济剥削组织，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是基督教神权后来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并统治中世纪欧洲达近千年之久的强大力量源泉。

当时，一个教区的主教不仅管理教会，操纵社会救济，控制学校，还管理金库、监狱、负责修筑城堡，甚至法兰克西北部赖姆斯城的城门每晚上锁后，钥匙也交由主教保管。7世纪后，主教又是法官，兼国王财政顾问。无论在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还是东罗马帝国，主教都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

公元511年，克洛维在他的王宫里死去，结束了其轰轰烈烈的一生。表面上貌似强大的法兰克王国迅速分裂，形成了3个独立的王国，它们是：东北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北部的纽斯特里亚，东南部的勃艮第。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不愿受毫无实权的国王的控制。克洛维的子孙们更不幸的是，他们在王宫内发号施令的权力也丧失了，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这一阶段，墨洛温王朝的权力由宫相查理·马太及其儿子矮子丕平掌握。他们俩人南征

北伐，打败了阿拉伯人入侵欧洲的企图，统一并扩大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与此相伴随的是教会势力的继续增长。

查理·马太大权在握时，实行军事采邑制，实施对象包括教会。国王赏赐给教会土地作为采邑，接受采邑必须附带军事服役。其督教会、修道院长连同他们的邑从都与贵族一样，编入军队。主教、修道院长都亲自带兵作战。查理·马太尔在新征服的地区建立主教区、修道院，又把教会职位作为对手下将领士兵作战卖力的奖赏。这样，神职人员同时又是国王的军队，国王的将领士兵又被派去充当教会和修道院的主持人，使宗教的魔力与世俗的武力紧密结合，成为一体。

查理·马太的儿子矮子丕平继任宫相后，决心与教会走得更近。他希望他在法兰克王国里有国王的权力，也有国王的头衔。他决心发动一场革命，把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懦弱的国王奇尔德里克三世赶进修道院，然后他本人登上王位。

当然，这一行动必须要有人支持才行，首先要取得法兰克贵族的同意，而且在道义上还需

要教会的认可。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

对此，矮子丕平胸有成竹，因为虽然他需要教皇的帮助，教皇同样也需要他的帮助。此时的罗马教皇因反对东罗马皇帝发动的圣像破坏运动而失去了利奥三世的武力支持，而贪得无厌的伦巴德人又步步紧逼，大有吞灭罗马城之势。向法兰克王国救援便成了罗马教皇唯一的解危手段。

于是，一笔基督与国王的交易很快达成。丕平致信教皇扎克赖厄斯（741～752年在位），请求他的支持，后者迅速答应。公元751年底，丕平正式登上王位，建立了加罗林王朝。当时有教会显赫人士卜尼法斯为丕平涂抹圣油，表明上帝拣选，名正言顺。

这笔交易在当时看来平淡无奇，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它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王位的授予和废黜都属于教皇的职权范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时虽未看出，但在西方重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教皇和该帝国间的相互利用相互斗争皆孕育其中，而这构成了整个中世纪史的非常庞大的一部分。

如果说教皇由此而帮助了丕平的话，那么

丕平能给予教皇的帮助也决不亚他。伦巴德国王艾斯图尔夫带领军队继续进逼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亲自去见丕平，向他求救。754年，他在巴黎附近的圣狄尼教堂为丕平及其诸子重新举行加冕膏立礼仪式，加给他们一个不明确的头衔——“罗马人的贵族”。这一头衔过去曾为拉文纳的帝国总督所有。这次加冕后不久，丕平便履行了他互惠的义务。次年初，丕平亲自率军队攻入意大利，两次惨烈的战斗之后，迫使艾斯图尔夫于756年交还了拉文纳和新近为伦巴德人所征服的土地。这样，以拉文纳为首府的整个总督管辖区及彭塔波利斯都成了教皇的领地。“教皇国”——教皇的世俗君主权开始形成，一直持续到1870年才结束。

矮子丕平死于公元768年。他是一位强大有力的统治者，但他的声望却不公平地为他的儿子查理的显赫声望所掩盖。查理在战胜其兄弟之后，开始真正大一统的统治，世人加于他名字上的头衔伟大的一词完全并入其名中，称他为查理曼。“曼”即“伟大”之意。

查理曼在位时统揽一切。其权威之大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他是一位具有伟大

天才的军人，把从其父继承来的疆土扩大了一倍以上。至他死时，他的统治范围包括现代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全境、现代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近半、意大利的大半和西班牙东北部的一角。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还没有见过任何国家在幅员的广阔上比它更接近于帝国。

但征服只是查理曼帝国事业的一部分。他除横刀立马，纵横驰骋之外，还赞助学术、爱护教会，尤其是后者，使他的名字更加光彩夺目。

在推进基督教的扩张方面，查理曼最重要的功绩是征服了萨克逊人。当时这些人正侵占着现今德国东北部地区。自772～804年，查理曼连续多年同他们作战，最终取得胜利。之后，他颁布一系列规定，强制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这些规定有：凡对国王不忠诚或胆敢违抗洗礼的，一律处死；凡父母不把婴儿送到教堂施洗礼的，或继续敬崇异族神祇的都课以巨额罚款；居民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教会不仅有审理民事诉讼的权力，而有权审理刑事诉讼。除这些血腥政策外，查理曼还采纳一批基督教神职人员谋士的建议，运用了一些改变萨克逊人信仰的和平策略。他在萨克逊地区，大肆修建教堂、修

道院。战争中被俘的萨克逊人被分派入法兰克王国的各修道院，在其中受训完毕成为僧人后，放他们回萨克逊，到新成立的修道院当僧人，再训练萨克逊的贵族子弟，争取萨克逊贵族。这样，逐渐使这支强悍的日耳曼部落皈依于十字架之下。

萨克逊人是日耳曼大部族中最后一支皈依基督教的，由于他们是日耳曼人中最有天赋和能力的部族之一，他们的皈依无疑给欧洲基督教大家庭带来了永久的利益。教皇利奥三世是如此感激他，以至于在公元800年圣诞节，当查理曼在对彼得教堂跪拜时，把罗马皇帝的冠冕加在这位法兰克国王的头上。罗马民众大声喝彩，西方民众也盛赞此举。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意味着消失了几世纪之久的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而这一举动把查理曼放在奥古斯都的伟大继承人的地位上，又给这个帝国打上神权政治的标记。对于查理曼这位伟大的皇帝来说，这似乎实现了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梦想——把基督教国家并入上帝之国中，而在这统一的上帝之国中，他是尘世的首脑。

当然，查理大帝对基督教的深远影响远不

止这些。

查理曼身边的神职人员使他相信了这样一个想法：要使被奴役的人民感到“基督的轭是轻省的”，要设法征服人心，为此，需要训练一大批知书识字，能对民众说教的神职人员，此外，法兰克帝国政府也需要训练一些知识分子充当它的各级官员。于是，查理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教会。就在镇压萨克逊人大起义的同一年（公元782年），由神职人员阿尔古因主持宫廷学校，训练皇室和宫廷贵族的子弟，并管理全国教会所办学校。自此，大量的教会学校出现于欧洲。它使教会垄断文化教育领域，训练一批掌握一定文化的神职人员，加强基督教会和法兰克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这正如阿尔古因在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

当时教会学校中设七门功课，称为“七艺”：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音乐。这些课程的宗旨只有一个：使学生接受基督教教义。中世纪教会使用的《圣经》以通俗拉丁文写成，拉丁文又是教会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

因此拉丁文法成为一门主课。逻辑和修辞主要用来阐述教义，战胜异端，后来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滥觞。数学只是用以对《圣经》中的数字给以宗教神秘解释。几何学描述大地是浮在水中的一个平圆盘，而天则是由四根柱子支撑的穹窿。天文学用来推算教会节日，音乐则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

除了建立教会学校外，查理曼还有效地利用教会，作为巩固其世俗权力的支柱。正是在他的手里，中世纪封建神权的统治体系得到了完善。

作法之一是利用神职人员干涉世俗事务。关于神职人员的职守，我们从查理曼的宠信、奥乐良城主教狄奥多夫给教区神职人员的指示中可以得到说明。这个指示包括四十六节，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神职人员应经常用《圣经》训诲教徒，一旦发现任何教徒有错误行动，应运用神职人员的权力和本事，训诲他改邪归正。在举行教区会议时，每个神职人员应报告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第三十一条规定，神职人员应利用教徒向神甫认罪的方法来控制教徒的思想行动。其中说："一切行动或思想犯罪都必须坦白

说出。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八种主要罪过如下：

第一，贪吃；

第二，淫乱；

第三，精神消沉，无精打采；

第四：贪婪；

第五，爱虚荣；

第六，嫉妒；

第七，发怒；

第八，骄傲自大。

因此，任何人前来问罪时，应对他详细盘问他犯罪的时间和情节，然而决定他应怎样悔罪。教徒应把思想中的邪念也坦白说出。神甫可按上述八种罪恶，逐一提出，责令教徒坦白交待。”查理曼还经常派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吏一起巡视各地。难怪现代天主教教会史学家丹尼尔·饶伯斯称教会是查理曼的高级警察部队。

要利用，也要控制，这是任何政治家都懂得的道理，查理曼亦不例外。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宗教会议的决议，由皇帝的《通令》予以颁布，其中如789年发布的《通令》，包括八十二章，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活动作出了极为繁琐的规定，如星期日无论男女必

须进教堂，弥撒礼未完毕前不准离去；奴隶和自由民的子女由神职人员监督管教；神职人员对教徒的讲道训诲，只准讲《圣经》，不准涉及其它，不准自由解释《圣经》；主教应监督所辖神职人员，遵循教会的正统信条；主教和修道院长应按照所辖教区和修道院的规模大小，财产多少，为帝国的军队出人出钱。甚至于宗教信条和仪式的细节也由皇帝《通令》予以规定，违犯的由国家判罪监禁。高级神职人员全由皇帝任命。通过这些措施，查理大帝牢牢将教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公元 1165 年，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烈特的傀儡教皇帕夏三世把查理曼封为基督教会的圣徒，就是为了纪念他建立封建神权统治的功勋。

在与罗马教皇结盟，取得教皇支持方面，查理曼做得并不比其父丕平逊色。公元 773 年，查理曼应教皇请求，出兵击败伦巴人，迫使伦巴国王削发为僧，他自己则当上了伦巴国王。公元 795 年，教皇利奥三世以阴谋手段登上教皇宝座，反对声雀起。利奥三世便致信查理曼表示忠诚，以换取这位铁腕皇帝的武力支持。公元 796 年，查理曼回函利奥三世，说：

“正如我们与您的前任哈德良达成过协议，我们同样愿与您建立牢不可破的信仰与仁爱的默契。”

“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这段话将国王与教皇间利害一致，相互利用的关系一语道破。

公元799年，利奥三世在一次政变中被推下教皇宝座，只身逃往法兰克，向查理曼求援。

次年，查理曼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罗马城，召集所有主教、神职人员及贵族开会，帮助利奥三世复位。

几天后，感恩戴德的利奥三世便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为查理曼加冕，封他为法兰克帝国皇帝。

查理曼时代的教会领土进一步扩大。

自由的法兰克农民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乞求新贵族或教会的保护。这使得教会拥有的农奴数量激增。据统计，在当时，位于现巴黎市内的圣热尔曼一德一普雷修道院的领

地内住有2788户人家，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

公元810年，阿亨宗教会议上，神职人员以财产多少为标准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拥有3000到8000处领地，第二等级拥有1000到3000处领地，第三等级拥有不满1000处领地。富尔达修道院是日耳曼著名的修道院，拥有的产业多达15000处，数目惊人。

在这些领地中，大部分是真正的庄园，其中有由依附农组成的村庄，也有些领地小而分散，只有少数农民居住。当时，一个小修道院的庄园，一般有二、三百户农户，大修道院，农户数常达几千。

修道院领地上的农户负担十分沉重，除承担繁多的徭役外，还要交纳实物租，如谷物、面粉、烧酒、啤酒、家禽、鸡蛋、麻布、毛织物。教会主教在它的领地上享有皇帝授与的"特恩权"，除征收捐税、罚金、各种苛捐杂税外，还拥有司法权，审理居民的民事、刑事案件。它还把居民组成武装，由主教或修道院长统辖。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就沦为修道院的农奴。教会还处

罚叛教者，不仅本人，连同后代都永远沦为奴隶。

根据法律，教会可以拥有奴隶。每个教区神甫有权领有两个奴隶，一男一女。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教会，从法国、德国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英国，拥有奴隶是常有的现象。神职人员对待奴隶的残暴，较之世俗奴隶主有过之而不及，反抗的奴隶常被砍掉手足，或活活饿死。

教会的“特恩权”，起初只限于教会领地之内，逐渐又扩大到周围地区。过路的旅客必须向教会缴纳通行税。

大大小小的教会领地，连同世俗贵族的领地，成为法兰克帝国内星罗棋布的“国中之国”。

查理曼的大刀指向哪里，《圣经》便出现在哪里。

公元794年，查理曼征服巴伐利亚。僧侣和贵族立刻蜂涌而至，夺取土地，奴役民众。

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教会的势力迅速蔓延到欧洲的各个角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教会势力的膨胀，越来越令查理曼不安。他觉得有必要采取些限制措施，以防止教会对皇

帝权威的威胁。从查理曼于公元811年颁布的《关于出征队的诏令》中，反映出皇帝对教会势力扩张的不满：

“穷人忿恨不平地说：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来；他们受主教和修道院长及其代理人的驱逐，也同样受伯爵及其百夫长的驱逐。他们说：如果一个穷人不愿交出他的土地给主教、修道院长或伯爵，这些大人们就捏造出种种借口，把他送交法庭，或命令他长期服军役，直至这人完全破产，不得不交出或出售土地。”

查理曼在诏令中还透露：神职人员“以天堂作为约许，以地狱进行恫吓，诱使农民放弃他们的财产，变为贫困。”“穷人们咒骂那些剥夺他们财产的人，无论主教，修道院长和伯爵都一样。”

查理曼晚年时，合并了一批修道院，把它们的财产收归皇室所有。对教会早已不满的世俗贵族趁机动手抢占教会地盘，力图控制地方教会，导致武装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羽毛日渐丰满的教会开始寻找机会摆脱皇帝的控制。

公元814年，查理曼死去。他以毕生精力构筑起来的帝国一分为三，由他的三个孙子分别

统治，彼此间战争不休。

50年后，昔日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便软弱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如400年前罗马帝国伏在法兰克人脚下一样。

业已发展为庞大封建领主的基督教会抓住良机，实施摆脱皇帝束缚的行动。

按法兰克帝国的宗教会议规定：主教违反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就褫夺神权。对此，教会大为不满。查理曼死后不久，一些主教们开始对皇帝委派俗人当修道院长，收回教会产业表示疑议。到858年，这些主教就联名向查理曼的孙子“日耳曼的路易”宣布，以后不再履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手续。与此同时，教会与世俗封建主的争斗亦如火如荼的展开。

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主教们企图依靠教皇权威，与世俗封建主和大主教相对抗。而早已耐不住寂寞的教皇亦想趁势扩张政治势力。

查理曼一死，教皇便宣布一批富有的修道院归教皇直接管辖。他与这些修道院的院长们结成攻守同盟，对抗国王、贵族的蚕食。不久，以教皇为首的中世纪教会便发展成为欧洲巨大的政治中心。

9世纪中叶，罗马教廷伪造了一份《艾西多尔文献》(艾西多尔原是西班牙教会总主教，精通古代教会文献)，其中说1世纪末到4世纪末曾举行过一些宗教会议，会议宣称君士坦丁大帝时已把统治全教会和罗马帝国西部的大权授与罗马主教西薇士德一世。所以，罗马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会也不应听命于国王，而是国王要听命于教皇。后人就把这个捏造的授权称为“君士坦丁赠礼”。

法兰克帝国统治时期，政府通过所控制的大主教去控制各教区主教。教皇就针锋相对地号召教区主教反对大主教和国王。他在《艾西多尔文献》中宣称，教会主教权力高于政权，只服从罗马教皇，不能服从政府；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和杂役亦不能听命政府，犯了罪只由教庭审判；主教神甫更是置身世俗权力控制之外，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只要坚信教会信条，就是祝圣的，是“神的眼珠”；俗人是肉欲的从属，触犯了神职人员便是触犯了神灵，当然更不能控告神职人员。

在权力争夺战中，重要的是实力。仅仅靠一束伪造的文件，就企图征服大权在握的皇帝和

大主教们，当然是一种幻想。

公元869年，法兰西王族为争夺王位大动干戈。大主教兴克玛支持篡夺王位的王叔，为他加冕登位。教皇尼古拉一世大怒，宣布新国王为非法，国王根本不予理睬。教皇见命令无效，便天真地援引《艾西多尔文献》，下令大主教兴克玛与国王断绝关系，否则将处以绝罚，革除教籍。兴克玛同样不屑一顾，还把《艾西多尔文献》戏称为教皇用以"钳制大主教的老鼠笼。"最后，教皇只得忍气吞声，让步了事。

如果说，上面的事只是表明教皇在与世俗政权的较量中无力取胜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经历则是蒙在罗马教皇脸上的耻辱了。

自9世纪下半叶起，一些意大利诸侯因经营从东方到欧洲的货物贸易而强盛起来，开始与罗马贵族争夺权力。由于当时教皇的产生还没有固定的制度，谁控制罗马城，谁就可以自立一个教皇，所以教皇成为贵族们权力斗争中的玩物。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9世纪初，罗马城元老西奥费莱克特家族操纵教皇人选的丑史。

西奥费莱克特的妻子西奥多拉把她以前的情夫立为教皇，称约翰十世。约翰十世与西奥多

拉的女儿玛洛齐亚闹矛盾，被后者囚禁起来，不久死于狱中。玛洛齐亚马上把她的一个情夫扶上教皇宝座，称塞吉阿斯二世。随后，又把她与塞吉阿斯的儿子立为教皇约翰十一世。玛洛齐亚的另一个儿子阿尔伯瑞克十分不满，遂发动政变，统治罗马城长达22年之久。公元954年，他又把自己的儿子，立为教皇约翰十二世。其残暴贪婪荒淫无耻，为历代教皇少有。

这段历史，被后来的教皇视为隐情，讳如莫深。它表明，教皇尽管有心称雄，却无力圆梦。教皇毫无权威自不待言，就是各地教会，虽有强大的势力，但还是不到与国王抗衡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对王侯俯首贴耳。何况，王侯还掌握着主教的叙任权，可以随时把不听话的主教赶下台下，削职为民呢。

法兰克帝国解体后，萨克逊王朝兴起于德意志。第一代国王亨利一世武功赫赫，四处征战。基督教亦随之在西北欧传播。

亨利一世把世俗和教会的封建主划入军士骑士等级，驱使他们南征北伐。一致的利益使教会和国王站在一起，共同对付贵族大封建主。神职人员为王权来往奔波，国王则不断赐给教会

特权。由于国王控制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如遇主教、修道院长出缺时，该主教区或修道院的土地的收入全部归国王所有。因此国王不惜一切增加教会的土地，从而使教会的土地占有量成倍增长。

亨利一世的儿子鄂图一世在位时，继续推行与教会结盟的政策。他曾多次借助教会军队的支持，击败了世俗封建领主的武装反抗。为此，他不仅继续扩大教会领土，还赐给主教们所谓"鄂图特权"，使主教们除在自己的领地里享有统治特权外，还可在周围地区享有特权。主教由国王任命，受国王管辖。

在对外扩张战争中，萨克逊王朝沿袭了当年法兰克王国马刀与《圣经》并行的方法。与丹麦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浴血奋战时，还在占领区建立教会、修道院，由教士率领日耳曼移民前往占领区，依教堂定居下来，成为王朝控制的政治、军事据点。这些教堂、修道院同德意志境内派遣它们的母教堂、修道院联系密切，向它们所属地区民众中传播德意志文化风俗，配合萨克逊王朝军队的征服战争。基督教在西北欧与中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

在西欧最后崛起的诺曼人(意为“北方人”)于公元8～9世纪间分别在丹麦、瑞典、挪威建立了王国。公元822年，丹麦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王位争夺斗争，日德兰诸侯哈拉德·克拉格向法兰克皇帝路易(查理曼之子)求救，在后者支持下登上了王位。作为回报之一，哈拉德·克拉格于826年率家人、廷臣到法兰克帝国宫廷受洗入基督教。当他回国时，修道僧安斯卡受路易之命同行充当丹麦国王的宗教顾问，在丹麦国内传播基督教。安斯卡辛勤耕耘，使基督教在丹麦境内慢慢扎下根来。

10世纪前半叶，丹麦与德意志为争夺领土不断交战，丹麦国王一度大肆镇压基督教。公元927年，丹麦战败，当时的丹麦国王、王后被迫到萨克逊宫廷，当着鄂图一世的面受洗加入基督教。此后，丹麦全国皈依于基督教的神威之下。

丹麦国王于967年统治挪威，强迫挪威人民全体改信基督教，不从者，处以极刑，财产没收。恐怖威胁之下，基督教很快流行北欧。

在中欧，公元950年，波希米亚被萨克逊王朝战败，被迫承认基督教的地位。此后，教会以

布拉格为中心，在中欧确立。

公元955年，鄂图一世战胜匈牙利人，在他们中间传播基督教。公元1000年，匈牙利国王史梯芬率众归依罗马教会。

在鄂图一世在位的时代，德意志与意大利的贸易突然繁荣起来。从意大利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德意志的商路对德意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鄂图一世不失时机地派兵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随后，命令这条商路沿途的教堂、修道院保卫商路的畅通无阻，作为回赐，它们享有商业和市场的特权，这包括：阿尔卑斯山区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征收通行税，维持道路、桥梁和驿站，提供运输工具，从中获益；教堂、修道院有权在所属庄园上设立工场。这些特权大大促进了教会财富的增长。

公元961年，鄂图一世乘教皇约翰十二世四处无援之际，借支持教皇的名义率军开入觊觎已久的罗马城，帮助教皇巩固了权力。翌年初，教皇为鄂图一世加冕，称他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德意志皇帝野心勃勃地想控制意大利和教皇，开始了与教皇长期的权力之争。此是后话。

上面提到的基督教传教运动都是拉丁教会开展的。希腊教会在这一时期亦成绩卓著。这将下节中详述。

基督教随着欧洲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在欧洲广泛传播，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后人对此有褒有贬，评价各异。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中世纪教会保存了古代的文化遗产；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针锋相对，说基督教会并没有真正保存下古代文化，反而毁灭了不少古代文化。

那么，随同古罗马的残墙败垣一同残余下来而后又被封建政权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应该说，它既非好事，也非坏事。

也许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基督教出现并占据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自有其适合生存的土壤，不然，它早已随西罗马帝国的大厦一道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换句话说，基督教广泛传播于中世纪的欧洲，是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所产生的正常的历史现象，而非“异

常”事件。

首先，刚从朦昧状态走出来的欧洲人需要宗教。现实社会中的各种苦难以及由各种自然现象和生、老、病、死等问题所带来的“无能无告”的困惑，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之中，幻想取得神灵的保护，默祷诸事如意，因此在基督教传入前，欧洲各族多信仰各种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多神教。

其次，统治阶层出于维护利益的需要，也希望利用宗教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由于民众都信仰宗教，因此本来属于子乌虚有的神权对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利用宗教来维护部落首领地位的做法，在原始氏族中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因此，把宗教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做法并非基督教首创，而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基督教做得更好，更完备罢了。基督教的传入，往往给一些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的部落首领送来了“万能的上帝”这座靠山，因此，他们在进行武力统一的同时，往往强制被征服的部落放弃原有的多神教信仰，改信基督教，以消除可能由这些氏族部落原有的多神教信仰带来的分裂隐患。

最后，作为统治者，亦需要宗教来抚平心灵的烦恼和失衡。统治者既非“超人”，他也有各种现实中的苦难，他在各种自然现象和生、老、病、死等问题的困惑外，还要背负保护统治地位的包袱，因此，宗教与当权者，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在基督教传入前，他们都信仰本民族的神，虔诚地献上习俗规定的祭品，在出征前和获胜后都要举行重大、肃穆的宗教仪式。基督教传入后，由于其神学思想具有比多神教高得多的文化色彩，因此统治者纷纷皈依基督教，除了巩固统治地位的考虑外，从自身的虚幻希望考虑，也想通过信仰，不仅赎去自己所犯的罪行，而且还能因为给予基督教会的各种赞助和支持，在死后进入天堂，享受上帝所给予的荣光。

以上这些，构成了基督教在欧洲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接下来的论述是，相对于野蛮的日耳曼民族而言，基督教是给他们带去了一丝文明的“光线”还是送去了文化的“黑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一方面在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

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蛮族”在基督教传教士的指导下，迅速臻于“成熟”。而这些蛮族在宗教上也放弃了原来民族内容的多神教的信仰，改信了基督教，又大大地促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基督教在西欧地区的传播，显然使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安营扎寨的这些民族部落逐渐失去了往日容易产生的“流动迁徙”思想，而且从基督教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中学习到了“社团”、“定居”和“国家”等观念。农业生产已成了这些过去被称“蛮族”的新居民的主要生产形式，使日耳曼族的文明程度大为提高。

尽管如此，这些“蛮族”的文化水准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到足以欣赏、学习和消受古希腊——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辉煌的文化精品高度。为了便于传教，神职人员只能在传教过程中给予他们文化上的“启蒙”。这就使原来西罗马帝国的文化水准，在它的废墟上一下子降到小

学的水平。从表面上看，西欧文化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倒退。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中世纪黑暗时期”，并把这种文化上倒退的原因归罪于基督教会。

这一观点未免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现实，而失之片面。持此种观点的人对于公元5世纪至7世纪的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爱尔兰人的文化状况没有一个客观而深刻的认识，而主观地认为这些“蛮族”的文化依然具有辉煌灿烂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全盛的“黄金时代”的水准。于是得出“文化倒退”的结论，并自然而然地将倒退的原因与基督教的传播联系起来。

其实，“文化上的倒退”的结论并没多大意义。实际情形是，正是这些传教士的活动才把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知识由浅入深地普及于“蛮族”人居住区，这无疑促进了古罗马文化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倒退”一词显然不妥。

更主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真正毁灭者并非基督教会。因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乃是由奴隶制度所引起的阶级矛盾激发的结果，是

西罗马帝国的贵族奢侈腐化、横征暴敛，以及对于“蛮族”进行血腥统治的结果。奴隶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战争不仅摧毁了帝国的经济制度，也使积累了几百年之久的文化艺术在战火中焚毁殆尽。而且，自进入公元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文化上的发展已趋于没落。这才是造成“中世纪黑暗”的主因。所以一味谴责基督教的过失，未免有点本末倒置。

随着基督教会在西欧社会的势力的日益增强，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繁荣，西欧的文化一改初期停滞的状况而向前发展。教会的建筑师们吸收了罗马建筑艺术中的一些特点，在各地建起了长方形的“罗马式”的教堂，而这些建筑技术不久又被用于城堡和要塞的建设上；古希腊、罗马的雕刻、绘画和装帧书籍封面技术，也开始在教堂内外和“福音书”的装饰上体现出来，精彩的宗教题材的绘画给予那些没有文化的信仰者一种具体形象的感染。在数学方面，其水平当然相对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海伦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黄金时代来说，只属幼稚水准，但在教士们的传授下，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公元8世纪的一位数学家阿尔昆所编写的一本数

学习题集的习题内容，可以看出这种进步的状况。而且，在修道院的斗室中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古希腊、罗马的数学研究成果。修道士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学习、思考和演算。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等人的著作都是在高高的修道院的厚墙内得以保存下来的。这对西方数学学科来说，至少起了传宗接代的作用。

所以，我们如果不事实求是地看待基督教会在西欧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对西欧文化的继承和复苏所发生的影响，就难以理解西欧社会在几百年后重新振兴，大放光彩的原因。

上面所述，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现在，我们将论述的焦点转向基督教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坏"的影响这一面上。

无可否认，由于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愚昧无知和不遗余力的推行以统治民众为宗旨的愚民政策以及对宗教异端邪说的仇视等原因，中世纪教会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作为中世纪欧洲社会中唯一能接受知识、

垄断教育的阶层来说，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之低下是令人吃惊的。格列哥里一世固执地认为，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括在《圣经》之中了，任何人遇到疑难，都可以从《圣经》中求得答案。因此，会解释《圣经》，便是最高深的学问。而解释《圣经》的方法只一点，即全凭神职人员的灵感。格列哥里一世曾洋洋得意地夸耀说："我向修道僧解释《圣经》含意，往往自己也不懂，但到时灵机一动，就能脱口而出。"

格列哥里一世还指示法兰西维昂主教，要反对传授任何世俗知识。这成为中世纪教会对待知识的长久态度。很多修道院把古代作家在羊皮纸上写的著作刮去，以便抄写《圣经》或著述教会编年史。罗马作家的作品在"异教"的罪名下被大批烧毁。

当时，一般神职人员连宗教仪式的拉丁文都不认识，经常对教徒们宣传的主要是地狱的血腥恐怖、圣徒们荒诞离奇的故事，借以胁迫民众归顺基督教会。

这些事实都说明，中世纪基督教相对于世界文明史而言，是好事，也是坏事。或者说，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后人要以客

观、容忍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去评价、看待这一切。

魔鬼的乐园：依附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

比起西部教会（罗马教会）来，东部基督教会的命运好多了。

当西部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们在“野蛮”的日耳曼士兵的追逐、杀戮下四处奔逃，惶惶不可终日时，托庇于东罗马帝国浓荫之下的东部教会的教士们却一边享受安适、奢侈的生活，一边多少带点幸灾乐祸地观望着西部帝国土地上绵绵的狼烟。

不甘心罗马帝国就此逝去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方面派大军讨伐蛮族，维持帝国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加紧拉拢、勾结基督教会，以保持帝国境内的稳定。

公元529年，由查士丁尼下令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公布于世。《法典》规定，皇帝是上帝加恩涂油而掌权的；君主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信仰，使全体人民崇拜唯一天主。《法典》中对教会问题十分注意，除利用神权维护君主政

体巩固统治外，还与当时在东罗马帝国有强大势力的修道院结成同盟，在《法典》中给修道士以特殊地位，并公开宣称，这不仅是为了崇敬上帝，也是为了巩固国家。帝国政府还修建了大批富丽堂皇的教堂，供养着无数的修道士、神甫。

7世纪后半期，封建制度开始在拜占庭帝国形成，受官方保护，享有特权的东部教会的势力急骤增加，仅土地一项，就几乎达到帝国土地的一半。

但好景不长。由于东罗马帝国受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的攻击，东部教会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之中，这时，西部教会已然走出危险，逐渐振兴起来。

公元7世纪上半叶，伟大的穆罕默德以真主安拉的名义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开始挥兵纵横亚、非、欧三大洲，构筑其阿拉伯帝国的梦想。首当其冲的便是横亘亚欧的东罗马帝国。

公元636年，穆斯林的军队在约旦河支流雅木克河岸上，同背水一战的东罗马军队进行第一次大会战。东罗马军队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特地组织了一个由司祭举着圣旗、圣物和圣画的随军队伍，唱着圣歌助威。但是当阿拉伯帝国

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来时，这场战争就变成了毫无抵抗的屠杀，雅木克河面上漂满了东罗马帝国士兵的尸体，河流也随之阻塞，不久，穆斯林大军进驻大马士革，叙利亚全境陷落了。

公元 637 年，穆斯林军队又进占安提阿，这样，东派教会的四大教区之一——安提阿教区就沦入他人之手了。

同时，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在东线战场上亦是节节取胜。卡德西亚一战，大败波斯萨珊王朝军队，波斯帝国的统帅卢斯泰姆也死于沙场。在随后的几年里，亚美尼亚被穆斯林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其征服了，埃及几乎没有抵抗地由拜占庭帝国拱手送给了穆斯林。耶路撒冷也随之陷落。

公元 717 年，穆斯林军队围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历时两年之久。在这期间，帝国内部也在席卷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这场风暴的起始力是由信仰基督教保罗派的农民提供的。

阿拉伯帝国军队的进攻虽然使拜占庭帝国相继失去了安提阿教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和

耶路撒冷教区，但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器在尚存的领土上仍然运转正常，收入减少，军事费用急剧上升，而军事贵族、皇族、皇帝不仅没有稍敛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反而变本加利地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以冲淡军事失败所带来的浓厚阴影。这使得国家财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填补国库的空虚，国家大量向农民增收赋税，所要求的赋税金额也成倍增长。帝国政府为了确保它的税收，实行了“全村连环保制度”，规定：凡是公社成员有逃跑者，其身上的各种捐税由全村人共同承担。同时，在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中，为了保证兵源的补充，国家实行了一种土地制度，其中规定：凡是租种由国家提供的土地的农民，必须承担国家的兵役，并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在这种残酷的剥夺之下，大批自由农民破产，成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佃农，还有些自由农民不能忍受沉重的赋税徭役而投身到大土地所有者或教会门下，成了依附农民。阶级矛盾迅速激发。

当时，教会的经济势力最引人注目。经过历代皇帝的赏赐和多年来的巧取豪夺以及大量依附农民的投献，东罗马教会的财富如同雪球似

的越滚越大。教会神职人员和修道院中的上层人士生活奢移，挥金如土，而皇帝和一些大贵族由于支付主手段日绌，财产不够挥霍，因此垂涎欲滴地觊觎着教会的财产。基督教保罗派的宗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展开的。

公元 8 世纪后，保罗派运动由亚美尼亚传入小亚细亚，迅速传播于下层民众之间。

这个派别相信善、恶二元论。他们认为，现实社会的罪恶是罪元的化身，因此反对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正统教会，要求简化宗教仪式，摒弃奢侈，取消圣像崇拜，废除教阶制度，撤销修院制度。保罗派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帝国内被压迫群众（特别是农民）反对世俗的和宗教的不合理制度的愿望，因而得到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就在君士坦丁堡被围期间，掀起了大规模的破坏圣象运动。

早就对教会财富垂涎不已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和一批新军事贵族乘机落井下石，投入到破坏圣象运动中，推波助澜，趁火打劫。

拜占庭帝国伊索里亚王朝皇帝利奥即位后连连下旨：废除圣像崇拜，把圣像移出教堂，刷去墙上的圣画。

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大权在握后，下令把修道院改为兵营，没收修道院的土地和财富以补充国库，修士、修女立刻还俗结婚。这一系列措施使广大民众的斗争焦点集中于教会头上，以皇帝为首的世俗当权派则借机打击了教会过于膨胀的势力，同时加强了新军事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面对来自四方的攻击，势力雄厚的教会不甘屈服，奋而还击。主张圣像供奉的大马士革的约翰撰写了《知识的来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东派教会的神学思想，以反驳保罗派破坏偶像的主张。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了知识来自“神的启示”，神学是最高的知识，神学如同皇后一样需要婢女侍奉。这些婢女就是哲学和各种世俗知识。

君士坦丁五世大怒，于公元754年亲自主持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违犯了圣经和诸教父的教导；将大马士革的约翰开除出基督教会。不久，约翰含恨而终。

公元780年，皇后艾琳掌管帝国大权。她明确表示反对破坏圣像运动，并于公元787年召

开尼西亚主教会议（史称第二次尼西亚主教会议）。罗马主教安德里安一世派特使参加，明确表赞同供奉圣像。这次主教会议严厉谴责了公元754年召开的君士坦丁保宗教会的决议，并且判决该决议是亵渎神明的异端，下令恢复神像，并允许在神像前焚香点烛；会议还宣布，对于圣像的崇拜同异教徒的偶像崇拜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为此，会议制定了二十二条教规，其中包括：严禁收藏异端书籍（包括反对圣像崇拜的书籍）；不准主教和修道院长变卖教会财产；贵族无权自选主教……

然而，这次宗教会议并没有能阻止住破坏圣像运动。特别是公元802年艾琳女皇被废黜以后，继任的利奥皇帝再度颁布废除圣像的法令，使教会的势力大受打击。

进入公元9世纪20年代后，教会的处境才逐渐有所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保罗派运动，其矛头不单对准教会，也指向皇帝和军事贵族。

公元821年，在小亚细亚地区席卷而起的农民起义大军，其声势之大，使帝国军队只能龟缩于君士坦丁堡城内进行抵抗。在这种情形下，

继续打击教会势力只会削弱皇帝维持统治的力量。皇帝和主教之间，到了以和解代替仇视的时候了。于是，双方对崇拜圣像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更重要的是开始携手对抗农民起义队伍。他们采取了各种收买、挑拨手段，分化了起义队伍，然后予以各个击破。起义失败，信仰保罗派的数十万农民被残杀殆尽。

公元842年，米歇尔三世即位，其母狄奥多拉皇太后摄政。她再次重申第二次尼西亚宗教会议决议。这样，持续了100年的圣像崇拜之争，终于平息下去。东部基督教会渡过了一场劫难，而继续发展。

9世纪，拜占庭帝国积极开展对外传教活动。当时包括现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等地区的摩拉维亚国为了抵制德意志封建主的军事扩张，设法取得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支持，为此欢迎与罗马教会对抗的拜占庭教会派遣能用斯拉夫语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

公元863年，拜占庭帝国派遣希腊贵族出身、曾在宫廷学校受训的修道士西里尔和他的兄弟莫多迪乌二人前往摩拉维亚传教。他们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了斯拉夫字母，把宗教书

籍译成斯拉文，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建立不依赖于德意志人的斯拉夫人教会。德意志传教士同拜占庭传教士之间为争夺控制摩拉维亚教会而斗争。公元870年，德意志封建主阴谋推翻摩拉维亚大公。德意志随后占领摩拉维亚，控制当地教会，把拜占庭传教士关进监狱，最后把他们逐出摩拉维亚。

拜占庭教会在摩拉维亚传教遭到失败，在保加利亚却取得了成功。864年，拜占庭军队侵入保加利亚，迫使其国王保里斯投降，并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接受基督教洗礼。保里斯也想利用基督教统一保加利亚。他强迫反对他的贵族皈依基督教，并派他的儿子到君士坦丁堡修道院学当僧人。

这个儿子后来成为保加来亚国王，强行在全国推广基督教，使之很快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封建组织。

基督教在俄国传播的情况较为简单。10世纪末叶，基辅大公符拉季米尔执政时期，趁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作战失利的形势，以援助保加利亚为名，出兵拜占庭帝国。后者以皇族公主嫁给符拉季米尔作妾，以求两国修好。公主带着

希腊教会神甫去基辅公国。公元980年，符拉季米尔受洗入教后，强迫全体臣民到第聂伯河里成批受洗入教。然后，他建立教会、修道院，并派传教士向北方居民传教，使基督教很快流行于俄国。

第四章　万流归宗

贪婪的“上帝之手”

当人类的历史进入11世纪时，中世纪欧洲也随之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封建神权统治普遍确立。

农业进一步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庄园林立，农田、牧地，处处是一片自然经济的优美图景。

与此同时，织布、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建筑业等悄然兴起、成长，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商业也发展起来，由此产生了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中世纪城市。

正是这些城市，构成了欧洲中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酝育了欧洲近代化的强大动

力。这迥异于东方专制社会中的城市。在东方，城市首先是行政中心，其次才具有商业中心的职能。

此时，与封建政权相依而存的基督教会不仅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也成为君王开拓荒地、山区、沼泽以及边远地区的得力助手。

作为交换，教会从君王那里获得了大量土地。主教领受教职时，也就成为国王的侍臣，享有世俗的权威。由于教会不必象世俗贵族那样往往因分封子嗣世袭而使占有的土地减少，相反，还可通过迫使小农、小地主破产的手段，不断取得新的土地，故而，教会领地越来越大。

这时，教会的封建教阶制也形成。全国范围内分成若干教区，每个教区设有主教，下面有若干教堂，教堂管辖的范围称作牧区，由主教派遣神甫。主教之上，有大主教。

由于财富的激增，必然刺激神职人员生活趋于奢侈、腐化乃至堕落。早在6世纪，不列颠的历史学家吉尔达斯就愤怒地指斥道：

“不列颠的神甫，多数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与其称他们作信徒的牧人，不如说是扼杀人们灵魂的豺狼。他们丝毫不为大众谋福利，而是为

自己的贪欲求满足，教堂竟成为他们满足淫欲的场所。”

当时英国教会的主教和伯爵一样，拥有大批侍从，前呼后拥，整日沉缅声色犬马之中，对宗教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9世纪英格兰君王阿尔弗瑞德登位时，竟为找不到一个神职人员解释拉丁祷文的含义而犯愁。

在爱尔兰，神职人员常与“残暴”一词连在一起。他们鞭打教徒如同鞭打牲畜一样毫不留情。教徒从事农牧生产，所有鸡、鸭、猪、羊、蜂蜜、牛奶、谷类、蔬菜，每年均要向教会交纳十分之一。每个酒坊，每年向神甫交一加仑酒。婴儿受洗、成年人受坚振礼、举行婚礼都要向教会捐献钱物。死去的人的遗产中，有十分之一归教会所有。

在欲望的刺激下，神职人员之间勾心斗角。圣洁的教堂里经常为阴谋的血腥所污染。为了利害冲突，有的大主教组织暴徒夜间谋杀属下主教，主教也同样还之以色，将雪亮的屠刀砍向自己的上属。

在欧洲大陆上，神职人员的腐化愚昧，较之不列颠的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992年，

罗马宗教会议召开，竟然找不到一人精通文字的神职人员，成为教皇、主教们脸上无光的事件。神职人员一任职，就肆意挥霍教会金钱，并想方设法把教会财产转到个人名下。神甫经常酗酒，然后酒气熏天地给教徒们讲经布道；平时则养鹰、养狗、打猎、赌博无所不能。他们出入酒店，娶妻纳妾，甚至沉缅青楼妓院，更是常见的事。

至于标榜弃世绝俗的修道院，其藏污纳垢的本事并不逊于教会。修道僧们同样纵饮、放荡、贪婪、猥亵，无恶不作。

基督教会的自我堕落行为，自然使笼罩其上的圣洁之光消失殆尽。而神秘的光环一旦离去，救世主耶稣也就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因为上帝之所以为上帝，是因为其身上的神奇的魔力和能救世人于苦难的本领。何况，神职人员在上帝名义下向世人伸出的贪婪之手，更激起了人们的厌恶和反感呢。

于是，无论教堂，还是修道院，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就失去了吸引力。这是很可怕的危机。没有信仰者，以思想崇拜为基点的教会，只有土崩瓦解了。

更不幸的是，教会又受到了来自合作伙伴世俗政权的攻击。原因很简单，教会势力的膨胀使国王的地位和权威受到了威胁；教会多样的敛财手段减少了国王和封建贵族们的收入，令他们眼红。一旦没了利用关系，双方的合作自然会出现危机。

这样的困境，迫使教会思考自我拯救之法。

而拯救的核心是，获得正在逝去的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只有这样，才会有可供国王看重的资本，重获国王的支持；也只有这样，教会才会有与一切反对势力对抗并战胜对手的实力。

于是，从10世纪开始，“克吕尼派”运动兴起，并主宰了此后教会的生活。

公元910年，法兰克南部勃艮底的阿奎丹公国的公爵“虔敬者”威廉在法国东部离马肯不远的克吕尼地方建立了一所大修道院，派一名伯爵担任修道院长。这所修道院强调修士们要遵守已被神职人员们置若罔闻的本尼狄克制度，对其规章予以严格的禁欲主义解释，并且十分重视宗教活动。同时还规定，克吕尼修道院的地产不受外来势力侵犯。这就为以后克吕尼派修道院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奠定了“法”的思想

基础。

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在教会中立刻产生了轩然大波。在第一任院长伯尔诺、第二任院长奥托的努力推动下，许多修道院，包括本尼狄克创立的、大名鼎鼎的那座设在意大利蒙特迦西诺的修道院都仿照克吕尼修道院的做法加以整顿。

到公元10世纪中叶，“克吕尼运动”已由法国发展到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地，并形成了“克吕尼派”这样一个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曾演出过不少悲喜剧。克吕尼派修道院均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长，凡是属克吕尼派修道院的院长也均由克吕尼修道院长任命，诸事都向他请命。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克吕尼修道院为首的独立的克吕尼修道院系统。随着实力的增长，其影响日渐深远。

奥蒂罗就任克吕尼修道院长期间，为了制止当时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和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和修道院之间因抢掠而发生的无休止的武装冲突，提出了上帝的休战的口号，规定在每周的星期三黄昏起到下周的星期一早晨为止这一段时间，为纪念基督受难的时间，凡在这一段

时间里动用武力者，必受教会惩罚。当然，这一规定在当时并未被遵守，但此事本身却已说明了克吕尼修道院在当时社会中已自认为有仲裁者的资格。由此可见其势力和影响。

克吕尼派的改革，逐渐由整顿修道院的制度转向反对神职人员的腐化。具体表现就是坚决反对当时的“西门主义”和“尼哥拉主义”。“西门主义”是当时盛行的用金钱和其他卑劣手段取得教会神职的一种现状和思潮；“尼哥拉主义”则是为破坏神职人员应遵守的独身生活，甚至提倡神职人员娶妻纳妾进行辩解的一种思想。克吕尼派竭力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世俗封建主控制教会，出卖教会职位；反对神职人员结婚；严防教会的权力、教产被神职人员的家族把持，以致世代相袭，造成教会力量的损害。他们积极提倡整顿教规、严守教条，提出首先从改革修道院入手，进而在整个教会内扩大影响，强调神职人员必须过禁欲生活。

实际上，克吕尼派改革家都是一批政治野心家，他们改革教会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教会的地位，并且增强教会同世俗统治者争夺权力的力量。正是在克吕尼派改革运动的舆论和组

织准备下，从11世纪中叶起，罗马教皇开始了树立教皇权势的斗争，以改变那种受制于国王贵族的局面。

这一斗争开始的征兆是势力日益强大的克吕尼派公然把神职由皇帝叙任的规定看作为“西门主义”，认为它同平常信徒委任神职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们在反对买卖神职口号下，要求调整教会同国家的关系。为此，克吕尼派积极抬高罗马主教的地位，鼓吹整个基督教会应听命于罗马主教。同时，克吕尼派也流露出觊觎罗马主教宝座的思想，认为罗马主教应由克吕尼派的人担任。凑巧，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德意志国王亨利三世为了把控制罗马主教这样一种权力从意大利贵族手中夺过来，也支持克吕尼派关于罗马主教候选人应由克吕尼派提供的想法，并企图利用克吕尼派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可惜，亨利三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已拥有近万名修道士和300余所修道院的克吕尼派决非三尺幼童，岂能听命于亨利三世？他们野心之大，不仅要同皇权分庭抗礼，而且还要凌驾于皇帝之上，让皇帝匍伏在教皇脚下，唯教皇之命

是从。这正是克吕尼派在11世纪要实现的目标。

正在这时，由于意大利贵族之间的派系斗争，罗马城内出现了三个教皇并存的局面。这三个罗马教皇及其背后的支持者都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进行裁决。正愁师出无名的亨利三世闻讯，立即于1046年率军浩浩荡荡地开入罗马城，把三个原来的罗马教皇予以废除，另派一个日耳曼籍的神父去当教皇。但这个教皇一到罗马便被毒杀。亨利三世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日耳曼籍神父去罗马继任教皇，同样死于非命。亨利三世大怒，第三次派一个日耳曼籍的克吕尼派神职人员到罗马去。这次总算没被毒害，顺利地登上了教皇宝座，称利奥九世。他是一个狂热的克吕尼派改革运动的鼓吹者。当上教皇后，就首先撤换了周围高级的神职人员，改变了过去枢机主教均由罗马及罗马城郊的一些教区主教担任的局面，使罗马贵族各派系通过这些主教来操纵罗马教皇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而且，他还把亲信的德意志克吕尼派的神职人员安插在实权位置。这就使枢机主教团的人选不再限于罗马一地，而是扩大到整个西派

教会，这对以后罗马教皇的改革，显然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利奥九世委任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霍姆伯特，他原是洛林的克吕尼派修士，被利奥九世任命为枢机主教，他竭力反对一般信徒有授圣职的权利，极大地促进了教皇集权思想的推行；另一个是“白人休哥”，他原是图勒附近的一个修士，就任罗马枢密主教后，终生致力于教会改革，晚年竭力反对希尔德布兰（即格列哥里七世）的政策；第三个就是希尔德布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实干家。

公元1049年，利奥九世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严厉申斥“西门主义”和教牧人员娶妻等事；同年，他又在理姆斯宗教会议上，规定教会合法选举原则时说：“非得神职界和信众公举，任何人皆不得升至教会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处于意大利各诸侯重重包围之中的小小的教皇想树立权威并非那么容易。在几番明争暗斗之后，利奥九世只得抱着失望的心情承认失败，并把已宣布免职的主教、神父予以复职。这次改革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公元1053年，利奥九世亲自率军与侵入意

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作战，战败被俘，获释后不久便去世了。临死前，基督教发生了一个巨大事件——东、西两派教会正式破裂，分为两大独立的派别。

追溯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派分裂的根源发生，两派在某些问题上的争执而引起的感情上的"伤痕"只是次要的原因。下列两点才构成了二者永远也弥缝不了的鸿沟：

(1) 强烈的封建意识和宗教上唯我独尊思想的结合，表现在争夺基督教会的首席地位这一问题上。从公元325年尼西亚主教会议召开以后直至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前，东、西两派教会的争执和仇恨，虽然各个时期表现不一，但均可归结于一点——"谁是基督教会的首脑"？

(2) 文化上的差异，这也是两派教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难以划分，因此，在希腊文化同拉丁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各自特殊性的一面，也必然会在宗教中有所反映。东、西两派教会虽然在表面上都信仰同一上帝，都以新旧约全书作为信仰的依据，但是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在神学思想上就存在着

深刻的分歧。例如在神学思想最基本的理论上，东派教会认为“得救之道”是“道成肉身”，而西派教会则强调“救赎论”。由此可见，这两派教会都属基督正统，但他们之间早已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了。分道扬镳，各行其道，是必然发生之事，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从公元9世纪至公元1054年为止，接连发生的几件争执终于使两派教会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得不分手了。

（1）在前节叙及东派教会的传教活动时曾提及过，公元9世纪，拜占庭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争夺摩拉维亚之争实质上是东西部教会之争，结果以西派教会的胜利而告终；在随后争夺保加利亚的较量中，拜占庭帝国和东派教会捷足先登，迫使保加利亚国王保里斯率臣民皈依基督教，并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地位，雪了前败之辱。

但是，君士坦丁堡对保加利亚王国不断提出的得寸进尺的要求，大大伤害了保里斯国王的自尊心，他开始考虑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一直虎视眈眈看着保加利亚王国事态发展的西派教会闻讯，立刻在罗马教皇授意下，从事争取

保加利亚王国的倒戈工作。公元866年，保里斯决定承认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佛提乌闻知这个消息暴跳如雷，立刻以牧首名义指责罗马教会犯有六项异端罪行：

①令保加利亚教会在星期六禁食；

②在四旬斋期吃奶油、牛乳和奶酪。

③排斥已婚司祭（东派教会的司祭们可以结婚）；

④不承认司祭所行的敷圣油圣事的效力；

⑤把“和子”一词加入《尼西亚信经》中；

⑥令神职人员剃去胡须。

公元867年，拜占庭皇帝米歇尔三世在佛提乌牧首的鼓动下，下令召开东派教会的主教会议。会议决定把罗马教皇开除出基督教。但是，米歇尔三世不久死于宫廷政变，继任的皇帝巴塞尔一世撤去了佛提乌牧首的职务，让佛提乌的对手伊格纳提乌斯担任牧首。当时的罗马教皇约翰八世以为有机可乘，便致信伊格纳提乌斯，提出将保加利亚教会划归罗马教会，他写道：

“我已经两次致函于你，要你将自己的权力

限于君士坦丁堡教区，因为这个教区是由于罗马主教的权威给予你的，你不应该跨出这个教区。”

他还威胁说，东派教会的教士必须在30天内离开保加利亚，否则就撤销伊格纳提乌斯牧首的教职。

伊格纳提乌斯并非软弱可欺之人，在巴塞尔一世的支持下，断然拒绝了约翰八世的要求。于是，东西两派教会为争夺保加利亚教区，矛盾再次尖锐起来。

公元870年，保加利亚国王保里斯向罗马教皇提出在保加利亚设置大主教座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保里斯割断同西派教会的来往，而再次同君士坦丁堡及东部教会眉来眼去。

公元877年，伊格纳提乌斯去世，佛提乌再次担任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但地位不甚稳固。罗马教皇乘机拉拢，派特使参加东部教会的宗教会议，以示对佛提乌的支持。随后，他故伎重演，在给拜占庭皇帝的信中再次提出了对保加利亚教会的要求。为后者和佛提乌所拒绝。于是，在公元881年，罗马教会再次指责佛提乌。

公元884年，保里斯国王去世，由其子西缅

继位。西缅自小受东部教会的熏陶，自然倒向君士坦丁堡。他当上国王以后，把东部教会的组织制度在保加利亚全境推广，并把村庄、城镇和大量土地赏赐给教会，命令百姓要以虔诚的信仰为修道院拥有的庄园劳动。至此，东部教会在保加尼亚的地位牢不可破了。

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在摩拉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之争，以一比一平的结果表现了两派教会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2）在佛提乌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的问题上，也是东、西两派教会激烈斗争的一桩公案。公元 842 年，拜占庭皇帝米歇尔三世登上皇帝宝座时还是一个幼童，由其母狄奥多拉皇太后摄政。米歇尔三世长大成人后，力图摆脱其母的制约。行动之一就是于公元 858 年将狄奥多拉任命的伊格纳提乌斯牧首撤职，而换上听命自己的皇室首席书记官佛提乌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由于佛提乌是平信徒，没有神品，无资格任牧首，因此米歇尔三世就想依靠西派教会的支持使佛提乌的牧首地位合法化。于是他向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位一世求援。

公元 861 年，米歇尔三世召开宗教会议，罗

马教会派人参加。特使当场宣读了尼古拉一世的亲笔信。大意为：强调了罗马主教在整个基督教会中的首脑地位，未得罗马主教（教皇）同意，教会中的重大人员变动均属无效；东派教会只有将西西里和伊利里克教区交给罗马教会管辖，罗马主教才同意佛提乌担任牧首的合法性。

对这些条件，参会的米歇尔三世和佛提乌牧首不置可否，而罗马教会的特使却误认为对方已然默认，便在会上同意将伊格纳提乌斯撤职，由佛提乌担任牧首。

事后，尼古拉一世才发现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因为君士坦丁堡根本就无意把西西里等教区送给罗马教会。恼羞成怒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于公元863年召开罗马宗教会议，宣布开除佛提乌教籍，承认伊格纳提乌斯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

这场两派教会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人选问题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玩弄权术的斗争，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双包案"。这场争斗，使东、西两派教会之间本来已存在的尖锐矛盾更加激化。

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为了在这场斗争中

取胜，有法律根据（虽然只是单方的意愿），重新编订了《东方教会法纲要》，增设了许多利于己方的内容，并重新注释了一些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两派教会分裂的进程。

(3)公元963年，罗马教皇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举行加冕典礼，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此，拜占庭帝国和东部教会深恶痛绝。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一直认为自己的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嫡传。虽然罗马帝国西部已沦入蛮族之手，但帝国东部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依然存在。如今，罗马教皇竟然将日耳曼入侵者的国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还将皇冠戴在那个可恶的蛮人头上！这可是难以忍受的耻辱！于是，东部教会对罗马教皇的刻骨仇恨，便变得永远无法消弥了。

两派教会经过这些事件的一激再激，终于促使了分裂日子的加快到来。

公元1043年，迈克尔·色路拉里乌斯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这是一位不甘居人之下、野心勃勃的牧首。他一方面处心积虑想趁皇权逐渐衰弱之机改变东派教会历年来听命于帝国皇帝的状况，另一方面准备伺机痛击西派教

会关于罗马教皇是整个基督教会首脑的言论。

当时，拜占庭帝国仍然统治着意大利南部。为了保住这块土地，东派教会坚持在喀拉布利亚和阿普里亚的教会中行希腊式仪式，以排除西派教会侵入的势力。公元11世纪，罗马主教怂恿诺曼人进入南意大利，企图利用诺曼人的刀剑来消灭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从而在鹬蚌相争之际，坐收渔利。不料，掠夺成性的诺曼人在洗劫了南意大利之后，挥兵直驱罗马城。教皇利奥九世羞愤之余，率乌合之众仓惶迎战诺曼大军，结果兵败被俘。

同诺曼人决战之前，利奥九世派人与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修好，缔结军事同盟，以共同抗击诺曼人。谈判中，君士坦丁九世考虑到国力衰弱，已不宜远征，因此答应在适当的时间里将阿普里亚等教区交罗马教会管理。不料这一密约内容为迈克尔·色路拉里乌斯得知，他勃然大怒，一方面下令在拜占庭帝国境内所有行拉丁式礼仪的教会一律采用希腊式礼仪；另一方面于1053年致信刚刚获释的利奥九世，列举了罗马教会的异端罪名：

①在圣体血圣事中用无酵面饼。

②四旬斋期中星期六禁食。

③四旬斋期中不唱“哈利路亚”。

④吃勒死之动物。

⑤喝动物的血。

利奥九世在读完这封信后，本因战败被俘的怒火更是高炽三尺，决定立即割断同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联盟关系。他即刻复信，指斥君士坦丁堡牧首滥用“普世牧首”的称号，因此侵犯了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首脑和安提阿教会首脑的权力。信中写道：“彼得建立的宗座高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友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四十宗座，高于一切教会；罗马宗座的最高司祭——罗马主教在任何时候都应认为较世界上一切司祭更为崇高和光荣，关于礼拜仪式和信仰问题，只有罗马主教有权决定一切。”

东派教会不甘示弱，立刻于公元1054年召开东部教会的主教会议。会议革除了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的教籍，并说“罗马主教（教皇）的特使及其随从人员，象野猪一样来到圣城，诬蔑真理”。

东、西两派教会在历经800年的纷争之后，终于分裂了。东派教会自称正教，因其教区在地

中海东岸，故亦称“东正教”；西派教会自称公教，亦称罗马公教。

两派教会正式分裂后不久，利奥九世便含恨而终。扶植他登上教皇宝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于1056年神秘地死去，年仅6岁的皇太子亨利四世在其母帮助下登位称皇。教会便趁幼儿寡母之际，开始对皇帝的神职叙任权采取反抗的态度，从而开始了罗马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之间长达200年之久的权力争夺。

权力诱惑下的反目：教会与国王的正面交锋

亨利三世皇帝在世时，一直紧握皇帝有权任命神职人员这一权力，以此控制教会。他认为，既然皇权来自神授，他就是上帝所膏立者，就不是一般平民信徒，而是具有了神职的司祭，可以代表基督，掌握世俗政权，并可依靠属下神职界和世俗贵族掌管属灵的或属世的事务。克吕尼派对这套皇帝兼有神权的理论十分恼怒，但慑于亨利三世的权威，不敢发难。

亨利三世死后，克吕尼派认为时机已到。公

元1057年，在刚登上罗马教皇宝座的斯捷凡九世默认下，枢机主教霍姆伯特写了一篇名为《反对买卖神职三篇》的文章，公然宣称平信徒的神职授与权无效，指出，皇帝作为一个平信徒无权将一枚戒指、一根权杖作为接任的表记，赐与受任的主教。这篇文章，不啻是克吕尼派否决皇帝有神职叙任权的"檄文"。但不幸的是，克吕尼派尚在酝酿如何实践上述内容的计划时，斯捷凡九世便去世了。

不久，克吕尼派又扶植佛罗伦萨的主教、洛林的格咯德登上教皇宝位，称尼古拉二世。他担任教皇后，依靠他的谋士希尔德布兰的策略，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结盟，就神职叙任权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展开了正面交锋。同时，他还取得了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封建领主多斯加尼女伯爵庇特里丝及其女儿马梯尔达的全力支持。1059年，尼古拉二世召开罗马宗教会议，规定了罗马教皇的选举法规。其要点如下：每逢教皇去世，继任人应由枢机主教会商议，然后向枢机主教团提出人选，经枢机主教团会商议和选举后，再由一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投票选举。从中可看出：

(1)教皇的人选由枢机主教掌握，他可以来自于主教会的任何教区，这就消除了罗马豪门操纵教皇选举的可能；

(2)选举教皇的问题，亦由枢机主教团从提名的人选中选举，这就使皇帝的神职叙任权消于无形；

(3)教皇在任何地区均可选举，一经选出，即可行使权力。

不料，正在这一法规推行实施之时，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61年去世。同年，克吕尼派的理论家霍姆伯特也死去，使克吕尼派的企图又遭受了一次打击。

真正揭开教皇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帷幕的是格列哥里七世和亨利四世。

格列哥里七世（希尔德布兰），生于多斯加尼，家境贫寒。他早年随被放逐的罗马主教远走德国，后随利奥九世返回罗马，加入本狄尼克修会当了一名修道士，热衷于实现克吕尼派“教权高于皇权”的目标。利奥九世担任罗马教皇期间，他以助祭品级担任副执事职，为教廷掌管一部分财产，甚为卖力，已显示了充分的权术才华。以后，他在罗马教廷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逐

渐成为罗马教会中的幕后主持者。他遍访德、法等国，积极扩大罗马教会势力，收效颇著。公元1049年，他在罗马宗教会议上激烈谴责当时买卖神职和神职人员的婚娶的行为，名声大震。同年，他又在法国理姆斯城主持宗教会议，公然宣称：

"任何人非由神职界和众信徒所荐选，皆不得担任教会领导职务。"

由此锋芒大盛，为克吕尼派中的激进分子所拥护。

公元1073年，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殡葬礼正在隆重、肃穆的气氛中举行。不远处的圣约翰拉特兰聚集起来的激进的克吕尼分子发动了骚乱，他们以暴动方式将希尔德布兰抬到"带锁链的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宝座上，称格列哥里七世。

公元1074年，已然大权在握的格列哥里七世乘亨利四世皇帝因国内贵族的叛乱和农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无暇它顾之际，逼迫亨利四世在纽伦堡当着教皇使臣的面，对过去同教皇亚历山大二世争权之事表示忏悔，并立誓以后唯教皇亡命是从。

之后，在1075年召开的罗马宗教会议上，格列哥里发表了《教皇敕令》，共二十七条，其中包括：

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唯有教皇一人有权制定新法律，决定教区划分，设立新教区；罗马教会完全为上帝所建立；只有罗马主教堪称普世主教；只有他能动用皇帝纹章；他也有权废黜皇帝；一切君王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统治者效忠的誓言；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凡不与罗马教会和谐的不得视为基督教徒；教皇可以命令臣民控告他们的统治者；教皇永不受审判……。

任何人均可以看出，《敕令》赤裸裸地向全世界宣告了克吕尼派主宰世界的野心。其首要的目标有二：确立教权高于皇权的体制和实现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会（东、西两派）的一统局面。此后以血腥和屠杀书写的十字军东征史只不过是上述目标的进一步深化而已。

正当格列哥里七世踌躇满志，准备去实现克吕尼派的宏图时，亨利四世已平息了国内的叛乱，回过头来开始对付罗马教皇。他利用法兰

西和德意志的数千名主教、神父反对格列哥里七世颁布的有关禁止买卖神职和禁止神父结婚的禁令这一浪潮，于公元1076年1月24日在沃姆斯举行会议，由红衣主教“白人休哥”带头控诉格列哥里七世的罪行。在亨利四世的授意下，会议致函格列哥里。信的开头是：

“致希尔德布兰，不是教皇，而是假修士。”

信中指控他靠阴谋手段和金钱收买的方法爬上了教皇的宝座，滥用权力，必须予以废黜。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许多神职人员的拥护。

对此，格列哥里七世立即予以反击。他于公元1076年2月22日发布了被称为“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宣布革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他统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权力，撤销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对亨利四世所立的一切誓愿与义务。

亨利四世亦以攻对攻，在写给格列哥里七世的信中骂他是已失去教皇身份的伪修道士，应立即从教皇的宝座上滚下来，永远被诅咒。

正如格列哥里七世预料的那样，早对亨利四世有离异之心的主教、修道士们趁机反对亨利四世，反戈一击。公元1076年10月，德意志

的王公贵族在特里布尔集会，一致宣布，假如亨利四世在一年之内不能恢复教籍，就算放弃皇位；并决定于翌年2月在奥格斯堡举行大会邀请格列哥里七世到会，共商德意志的政治和宗教问题。

亨利四世一下子陷入了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绝境。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忍辱负重、耍苦肉计的手段来缓和困境，争取时间。他估计教皇到奥格斯堡去，途中必须经过阿尔卑斯山，于是他就在附近选择了一个地点，专候教皇到来。

格列哥里七世路经此处，听说亨利四世在等候他，有点惴惴不安，急忙躲进庇特里丝之女的堪诺撒城堡中，以防不测。此时正值隆冬，阿尔卑斯山白雪纷飞，寒气刺骨。出乎教皇意外的是亨利四世并无任何迎击之意，相反，却赤足披毡站在城堡前整整三天，以示悔过。格列哥里大受感动，满以为他的行动已使最强悍的敌人亨利四世臣服了，遂召见并接受亨利四世的忏悔，让他返回德意志。

其实，格列哥里七世的这一"高明"之举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他的赦罪，亨利四世得以

保住了皇位，可以重新利用皇权和德意志的军队同他作斗争，这无疑是放虎归山。那些原本在奥格斯堡会议上废黜亨利四世皇位的皇公贵族们见状大为寒心，不再信任教皇格列哥里。真所谓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亨利四世皇帝受赦回到德意志后，积极策划，准备重振旗鼓。一些原来支持他的王公、贵族、主教又聚集在他周围，而那些感到受了教皇愚弄的人也投奔到他的麾下。经过几年内战，亨利四世战胜敌对的贵族势力，遂于公元1080年6月在布利克生召开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格列哥里七世，另推拉文那教区大主教维白特为教皇，称克雷门三世。随后，亨利四世率大军进入意大利，将罗马城围困两年后攻陷。格列高里七世仓皇出逃，向诺曼人屈膝求援。

不久，诺曼人攻入罗马，大肆烧杀抢掠，破坏极甚。诺曼人走后，格列哥里教皇因怕承担引狼入室的罪名，也随诺曼人南撤。几个月后，一代枭雄郁郁而终，极为凄凉。

纵观格列哥里七世一生，他在神学上虽然没什么贡献，但毕生从事克吕尼派整顿教规和提高教皇权力的政治斗争，为教皇的权力达到

鼎盛创造了条件。公元1728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封他为“圣徒”。

格列哥里七世死后不久，不甘失败的克吕尼派又推枢机主教法国拉加利的奥托为教皇，称乌尔班二世。乌尔班二世是一个很有谋略和政治手腕的人物，他处事不象格列哥里那样锋芒毕露，而是柔中有刚，头脑极为冷静。他登上教皇宝座后，在希尔绍修道院修士们的帮助下，取得了德意志教会中部分人的支持。他表面上应付亨利四世及其权贵、主教，暗中则利用亲信拉拢、离间亨利四世阵营中的实力派人物，逐步削弱亨利四世的力量。到公元1093年，羽毛已丰的乌尔班二世十分轻松地逐驱了亨利四世扶植的教皇克雷门三世，统管了罗马城。

公元1095年5月，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翌年，又利用十字军打败了“卧榻之侧”的宿敌教皇克雷门三世及其追随者，并把他们全部开除教籍。

公元1099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由帕斯迦尔二世继任。他在位期间，皇权和教权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公元1105年，帕斯迦尔二世支持亨利四世

的儿子发动政变，逼迫亨利四世逊位，由亨利之子继位，称亨利五世。

亨利五世继位后，为争夺神职任命权与教皇闹翻，并于1110年进军罗马。教皇提出：德意志主教放弃政治、经济权益，皇帝也放弃统治教会的要求，然后教皇为亨利五世加冕。双方签订条约后，德国主教拒绝放弃自身政治、经济特权，群起反对教皇。教皇又拒绝为亨利五世加冕。亨利五世就把教皇连同红衣主教们逮捕监禁，以迫其就范。教皇无奈，又与亨利五世另立新约，承认皇帝对教会选举产生的主教、修道院长有叙任权，以此换取释放。获释后，教皇反悔，于公元1112年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推翻条约。亨利五世再次出兵，将帕斯迦尔二世驱逐，另立卡里克斯托斯二世为教皇。

教皇与皇帝间长期的争斗，使双方逐渐意识到，如果继续斗争不息，只会危及双方的统治地位，而这时，正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东方领地的时候，皇帝与教皇无心再战，而将目光转向了富庶的东方。于是，亨利五世同卡里克斯托斯二世签署了表示和解的《沃姆斯教约》，时间是公元1122年。双方同意：在德意志境内，所

有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由教会按法规规定选举产生，皇帝可临场监选，如果在选举过程中发生分歧，皇帝可与省主教以及该省内的其他主教商榷后决定；皇帝交出神职叙任权，但仍享有管理主教财产的权力。

《沃姆斯教约》的签订，表明教权、皇权之争暂告一段落。

《沃姆斯教约》签订后不久，因德意志国内政权的更替，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又拉开了帷幕。

公元1125年，德意志旧王朝因亨利五世的逝去而寿归正寝。王公贵族们为夺得皇位相互交战。最终霍亨斯陶芬家族取胜，建立了霍亨斯陶芬王朝。

王朝的第一任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心怀大志，决心有一番作为。他即位不久，便远征意大利，以巩固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北部富饶地区的统治，并由教皇加冕，确立法统地位，随后就可名正言顺地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全部，重温神圣罗马帝国之梦。

此时的教皇哈德良四世同样雄心万丈，力图借加冕表明教皇地位高于皇帝，皇位授自于教皇；同时，他还想取得教皇对罗马城的管理

权。

于是，双方势同水火，明争暗斗，各自拉拢党羽，争取支持。

公元115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登位，腓特烈心中不服，另行扶植亲信、红衣主教渥大维为教皇维克多四世。同时，他又以武力驱逐了亚历山大三世。

亚历山大三世逃亡法国，在那里策动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城市和南部城市的诺曼人结盟反对腓特烈，同时争取其它国家的支持。公元1176年，各方联军全歼腓特烈的军队，腓特烈被迫投降，于次年签订威尼斯和约，放弃他扶植的傀儡教皇维克多，承认伦巴城市的自治权。

亚历山大三世为杜绝以后皇帝对教皇选举的干预，于1179年制订了《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只要有红衣主教中三分之二赞成票便可当选。直到今天，《教皇选举法》依法有效。

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教皇动用了大量教会理论家，鼓吹“教皇权力至上”，“皇权来自教皇”，“教皇除严重传播异端，不得予以废黜”等理论，为教皇攫取更大权力大肆宣扬。

到英诺森三世担任教皇时，教会权力达到

了世人瞩目的巅峰状态，实现了克吕尼派几代人的梦想。

英诺森三世是前叙教皇克雷门三世的侄子，天赋极高，权力欲很强。他在公元1198年当教皇时才30岁，年纪之轻为历代教皇少有。

他认为，主教的职责就是要协助教皇管理教会，并“分担他的忧虑，使他肩负的巨大责任在下属的协助下，得以稍稍减轻”。所以在教会内，英诺森三世完全按专制帝王的观念行事，大权独揽。对于克吕尼派未曾实现的梦想，他一直耿耿如怀，决心继续实施格列哥里七世教皇未竟之事业。当时西欧各国的世俗君主们因十字军东征之事彼此不和，不可能共同联合起来抑制教会的力量，而教皇却能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因此，在神职叙任权上，英诺森三世已大权在手。他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命运。

他认为，教皇有权决定诸侯选出的国王是否符合条件，在选举发生争议时，他有权在候选人中进行选择。对于罗马教廷来说，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才是罗马帝国继承者，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有由罗马教皇加冕，才具有上帝所赋

予的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

英诺森三世正是坚定地抱着“教皇权力至高无上”这样一个观念来处理国际间和教会事务的。

公元1202年，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就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怂恿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又想方设法逼迫拜占庭帝国皇帝和东派教会向他俯首称臣，遭拒绝后便干脆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在巴尔干至小亚细亚建立起十字军的王国，以刀剑推行他的意志。

在西欧，他为了扩张教皇国的领土，在取得了奥托四世所许的“登上皇位以后保证扩大教皇国领地”的诺言后，积极支持奥托四世攻击施瓦本公国的菲利普。但是，当奥托四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时，罗马教皇毫不留情地把他废黜了，支持又一个贵族当上了皇帝。

英诺森三世还迫使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阿尔冈国王彼得、雷翁国王阿尔丰斯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英吉利国王约翰屈服于他的淫威，在他的面前唯

命是从。

他有一条著名的信条：

“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是整个世界。”

他，英诺森三世教皇，就是世界之主。

坐落在小小的罗马城里的罗马教皇，终于通过他之手，具有了主宰世界的力量。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他送给中世纪欧洲的，却是一片黑暗

12世纪，一位四处游历、见识颇广的德意志作家在书中不无忧虑，却又无可奈何地写道：

“修道僧和修道院简直充斥世界了。”

这正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势力鼎盛时期的最好写照。

自10世纪以来急骤发展的修道院到12世纪时已达至高峰。从富饶、繁荣的平原到贫瘠、偏远的山区，处处可见修道院即高大、灰沉的建筑。可以说，哪里有居民，哪里就有修道院；哪里没有民众，哪里却不定没有修道士的身影。

以恪守清规戒律，主张清心寡欲而闻名的

克吕尼派修道院盛极一时。到11世纪，它们已拥有了数目惊人的田地、森林、牧场、磨坊、葡萄园，财富如同变戏法似地越来越多。这时，克吕尼派修道士们早已忘记了昔日刻苦修行时的誓言，而捡起了自己曾经不遗余力攻击过的东西：奢侈、腐化、堕落、卑鄙、贪婪……。积年累月的声、色、犬、马的生活已磨灭了他们锐意进取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从公元1098年开始又兴起了新的息斯特西安派修道院。这派标榜“修道院改革”，抨击克吕尼派后期修道院的富裕奢华，强调修道僧必须到荒野僻壤从事劳动。

息斯特西安派的修道院中，修道士分为两类，一类可受神学教育，经过训练后，成为正式修道僧；另一类被认为是不能读书认字的“蠢汉”，准许加入修道院，只能在修道院内或在庄园、作坊、森林、采石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学习信经、主祷文和《福哉玛利亚颂》，终生不娶，被称为“世俗修士”，实际上是修道院的农奴或工奴。

息斯特西安派利用政治特权，不仅夺得大量土地，还控制修道院周围的水利，并进而垄断

了磨坊业，迫使农民不得不把谷物卖给修道院。这样，教会就控制了周围地区的谷物种植。

除经营谷物种植和磨坊业外，各地修道院还利用牧场繁殖牲畜。德意志巴明地区的天堡修道院，一处农场上就养了80头牛、60头猪和800多只羊。另一个圣天累德蒙修道院中的文献中记载，他们一年就出售了7000包羊毛。德意志的息斯特西安派修道院还垄断另外一项行业：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开酒店，收入十分丰盛。同时，他们还经营苹果园，同样有利可图。

盐业是中世纪欧洲社会最为赚钱的部门。一探知何地有自然盐井，修道院便利用特殊权力抢先开发，煮盐销售。仅此一项收入，就构成了许多修道院巨额钱财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修道院经济的发展，修道院本身固有的世俗修士忙不过来。于是，修道院便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农奴，为自己干活赚钱。

修道院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最初的农业扩展至手工业和商业。到13世纪时，波罗的海沿岸的修道院利用海运，把货物运销到丹麦港口，牟取巨额利润；立陶宛的修道院，经营着与俄罗斯的商品贸易。修道院为了

从事陆路贸易，备有马车。他们组织商队，派遣武装队伍，护送商队往来于各国之间。自13世纪起，他们又从皇帝那儿获得了许多地区的市场特权，因而权力与财富与日俱增。

后来，欧洲城市兴起，货币经济发达起来。商人意识极强的修道士们又经营抵押和放款业，建立了中世纪最早的银行。尽管教会规定不许重利盘剥，但修道院却阳奉阴违，收取高额利息。当修道院的贷款业规模日渐发展之后，往往雇用最熟练的兑换银钱商和掮客、犹太人和伦巴人，来主持修道院的贷款业。

在这种情形下，观念灵活、组织严密、经营集中的息斯特西安派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很快超过顽固保守的克吕尼派修道院。自然，其在教会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大大压倒了后者。

为了保护日益增多的教会财产，修道院也仿效世俗贵族，把修道院建成庞大的封建城堡，有城墙、护城河、棱堡、守望楼。哨兵林立，戒备森严。修道院俨然已成一方霸主。

在意大利，教皇通过它的庞大的财政活动，取得了城市商人的支持。身为教会首脑，教皇敛财的手段比起他的手下来不但毫不逊色，反而

更为高明，更为气派。自英诺森三世起，教皇每年向英国、葡萄牙等教皇侍臣国勒索巨款，称作“彼得辨士”。此外，教皇的收入还包括征收什一税。每一教区新主教上任后第一年的全部收入称作“初熟之果”，要解交罗马教皇。另外，教皇给人赦罪要收费，教皇法庭要收诉讼费。据统计，教皇每年的收入比欧洲各国国王的收入总和还要多。

庞大的经济实力必然助长教会在社会地位、政治生活以及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强烈而深刻的影响力。这首先就体现在中世纪的社会等级制度上。

公元821年，法兰克主教们在一份给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的呈文里，首次使用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三等级”——僧侣、贵族与平民——这个名词，至于农奴和奴隶，立在等级之外，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9世纪末期，三等级在修道僧的《圣柏腾奇迹录》中已完全区分开来。

稍后，克吕尼派修道僧鄂多阐述第二、第三等级，即贵族与平民的关系，是贵族“保护”平民，平民行劳动之责。

10世纪末，法兰西主教阿达尔贝伦更把当时社会的三等级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联系起来。他在递呈法兰西国王虔诚者罗伯特的奏章中说：“因为上帝家庭的三位属于一体，所以（地上）有的人祷告，有的人保卫，其他的人劳动。”

不久，修道僧札克·德·维特里又作了类式的比喻，以表明教会地位的崇高：僧侣是眼睛，因为他们给人们指示道路；贵族是手臂，维持社会秩序并保卫王国；平民则是人体的下部分，支撑政治机体的上层部分。

奇怪的是，标榜“普人救世”、“慈善、博爱”的基督教会对遗留下来的残绝人伦的奴隶买卖不但不予以反对，反而乐此不疲。直到11世纪以后，在意大利的教会领地上，以至教皇国里，还可常见奴隶们憔瘦不堪的身影。教会法甚至规定，禁止释放奴隶或农奴。12世纪城市兴起后，世袭农奴制已受到猛烈的冲击，而正统经院哲学的奠基人、坎特布雷大主教安瑟伦还顽固地坚持农奴制。他宣称：农奴是因为犯罪而“被公正地降低身份”，他们的子女，理当属于同一的农奴身份。

在长达数世纪的权力争斗中，教会深感武力对夺取权力、巩固权力的重要，因此极力鼓吹基督教的武士精神，培养骑士阶层。中世纪的贵族子弟，不当神职人员，便去当骑士。他们自幼习武，成年之后，经过一种半宗教式的仪式，在教会参加下，由老一辈的骑士授与他们以骑士称号。骑士必须是基督徒，在形式上臣属于一个封建领主，听从封建领主的驱使，或镇压农奴，或与其它领主作战；同时，骑士还必须致力保护教会，无情消灭异教徒。教会史上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以这些骑士为主力的。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神权统治的神圣光环是由基督教会提供的；国家运行的理论依据亦来自教会。

当时，教会法成为欧洲封建王国通用的法典。教会自身还拥有法庭、监狱，教会法庭甚至凌驾于国家法庭之上。

早在5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就宣称：贵贱不等、贫富不均缘于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的罪孽，应视为合情合理之事。这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世纪欧洲教会法的核心内容。

教会法的形成与它的地位则是在神职人员掌握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查理曼时代，皇帝往往委派神职人员充当法官。这以后，教会法庭的权力日益增长。

教会的法律理论之一是，应以审判对象来划定法权范围，唯有教会才有权审判教徒。当时欧洲的情形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信徒，因此，世俗法官不得触动教会有意保护或惩罚的任何一个人。

1279 年，阿维农宗教会议通令，任何政府官员如逮捕神职人员后拒不引渡给教会法庭，即将该政府官员革除出教。致使政府的法庭只能审判重婚、伪币犯和异端分子。

教会的另一个法律理论是，以案件性质确定教会法权范围。凡涉及教会利益的案件或涉及宗教信仰的刑事案件，或与教会有关的民事案件，都得由教会法庭审理。中世纪的各种活动几乎均在宗教的名义下举行，故而事实上，教会法庭可以审理任何一件想审的案子。

到 12 世纪初，主教直接充任法官。由主教指派，在一个教区内由若干名专学教会法的神职人员充任专职的教会法官。每一教区还有一

名大法官，等于高级法院，接受上诉案件。教皇又在罗马教廷中设教皇法庭，作为教会法庭系统的最高机构。当时，被后人称为圣徒的贝尔纳这样描写教皇宫廷："每天从早到晚都听到上诉者的尖声喊叫。"

由于教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国家司法权力，加之神职人员对这份权力的钟爱，所以，教会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的主要法律制订者。这使得原来只限于宗教法规的教会法，其内容大大扩展，可谓包罗万象了。

公认为12世纪最出色的法律书籍是《教会法规歧异汇编》，由意大利北部波隆那大学的修道僧革拉先编纂出版。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法律的来源和神职人员的特性；第二部分列举触犯教会法的案例并加以分析；第三部分论圣事的本性。

革拉先采取经院学者常用的"辩诘"方式，把案例分类编排，再就每一案件分析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原理问题，然后就每一条法律原理问题列举赞同或反对的理由，以及双方所引用的教会法条文。下面就是此书中很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例一，某地区人民信奉异端教义，影响周围地区的教徒，于是该教区主教遵奉教皇命令，调动军队，向异端分子发动战争。异端分子大部分被杀，被判刑入狱，财产没收，少数人屈服，重新接受教会管辖。革拉先分析道，这一案件至少涉及到八个问题：战争是不是一种罪恶？基督徒能参加哪一种战争？当不是自卫时，能否使用武力杀伤别人？家族间宿怨是否可借机会把对方消灭？法官对已在服刑的犯人能否下令处决？对坏人是否应强制他弃恶从善？对异端分子的财产是否应予以没收？神职人员能否进行战斗？

对于上述问题，革拉先援引《圣经》、教皇敕令以及教会会议决定进行推理，最后结论道：神职人员可以发动战争打击上帝的敌人，但神职人员自己不应参加战斗。这就为教会以武力镇压人民和对外扩张制造了法律依据。

例二，关于偶像崇拜问题。书中引言写道：

“凡参与拜偶象者应从信徒社团中分离出来。”

革拉先分析说：

“凡对神的信仰背离正道者，就不是属于神而属于魔鬼。《圣经》上说，万物都是神所创造

的。因此，任何人相信事物可由人手创造，或相信任何生物可以改变另一较好的物种而不通过造物主，他便是个确凿无疑的不信者。”

这便为教会镇压“异端分子”提供了法律根据。

革拉先的著作后来被教皇收入《教会法典汇编》，成为官方文件，在罗马教会中沿用了500年之久。

随后的50年里，阐述教会法的书籍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教皇与皇帝在权力争斗中为了战胜对方，都组织了一批法律学者为自己编撰子无虚有的法律依据。宣传战的焦点集中于下列几点：教皇与皇帝，谁权力大？皇帝的权力是否来自教皇？教皇能否废黜皇帝，教皇能否直接行使世俗政府的权力？

拥护教皇的法学家争辩说，教皇无论对宗教或世俗事物均具有最高权力。12世纪下半叶，他们又提出所谓“两把刀”理论，并从《圣经》中找出了根据。《新约·路加福音》称，耶稣叫门徒预备两把刀，这两把刀即指神权与政权，它们都属彼得（即教会）。教皇亲自掌握神权这把刀，而在为国王加冕时，把政权这把刀暂时授与

国王。教皇也随时准备拿起政权这把刀。依皇权由教皇授与的理论，教皇就有废黜皇帝的权力。

拥护皇权的法兰西法学家反驳说，没有教皇之前，皇帝就已存在，教会对此作何解释呢？因此，皇权来自上帝，教皇不应有废黜皇帝的权力。

此后，代表贵族的法学家又与教皇党法学家展开论战。双方信件来往如雪，或公开辩论，唇枪舌战，不亦乐乎。

客观地讲，中世纪基督教会开办的教会学校，为欧洲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广泛的基础。欧洲现存几所最古老的大学，就是演化于教会学校，即为明证。

当然，教会开办学校的初衷 可不是为了替社会造福，而是用以灌输神学思想，巩固基督教会高高在上的统治基业。当时各级学校基本上被教会控制。每一个教会牧区，都在教堂中设一所小学。教堂的文书通常就是学校的老师，学习的课程以宣讲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为主。

高一级学校附属于修道院或大教堂。12 世纪初，仅法兰西的修道院就设有 70 所学校。后来，又由教区主办这一类学校，每个教区办一

所。教区学校由主教指定神职人员当校长，招收7岁到20岁的男青年（女校为数极少）。十二、三世纪时，学校课程还沿袭查理曼宫廷学院的作法，即七艺，即文法、逻辑、修辞称为三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称为四科。其中逻辑被列为主科，因为被当成训练青年战胜异端思想的有效工具。

从12世纪时起，随着工商业城市在西欧的兴起，出现了新的非教会学校。它是城市居民争取自由、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控制斗争的产物，以较为自由、开放的特点吸引大批学生。也就在这时，阿拉伯文明经过西班牙和西西里王国传至欧洲，掀起了一场文明冲击的浪潮。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与阿拉伯算术、代数、三角、天文学等著作重新流行于西欧城市中，古代罗马法也于11世纪下半叶重被发现。在这些浪潮的冲击下，西欧城市中出现了大批游学青年。他们到处流浪，追求新知识，而对基督教繁琐、枯燥的教义不屑一顾，并猛烈抨击教会修道僧和教皇，抨击修道生活及基督教教义，令教会大伤脑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世纪大学。

公元 1158 年，波隆那大学成立。学生们仿照城市工匠同业公会的组织，自雇讲师，付给学费，独立性极强。法律是这所大学最主要的学科，它是由于当时最知名的罗马法学者艾尼利阿斯创立的新兴学科，首次从神学中独立出来的。罗马法和教会法是对立的，罗马法的复兴，反映了欧洲新兴市民阶层和国王权力上升，为反对教皇专制统治，极力寻求理论支持的一个表现。

波隆那大学成立不久，教会便将手伸了进去，却遭到城市富商的反对。因为教会想借这块阵地宣传教会法，而富商和学生们则要讲授罗马法。于是，波隆那刚刚建成的校园里，两派斗争不休，甚至还引起了暴力事件。

大约与波隆那大学兴起的同时，巴黎也同样成为私人讲学、吸引游学青年的一个中心，并很快自行组成了巴黎大学。公元 1200 年，法国国王以授与大学“神职人员特权”，免受政府军队干涉为名，将巴黎大学交与教区管理。大学师生为抵制主教操纵，向教皇申诉。英诺森趁机伸手，一面宣布要保护巴黎大学，一面把他的亲信派去大学，预备开设神学院。受骗的大学师生们

群起反对，与教皇斗争达五年之久。最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采取强暴手段，把所有反对教会的人开除校门，才算控制了巴黎大学。从此，巴黎大学成为宣扬宗教哲学和神学的中心。

13世纪，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波兰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大学；14世纪，在德意志的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等城市也出现了大学。但它们的命运也和巴黎大学一样，成为教会手中的木偶，任其摆布。

就这样，教会垄断了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向全体人民灌输神学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使欧洲陷入了一片文化的沙漠之中。

与中世纪基督教会极盛名声相表里的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在经院哲学的名下的极端成熟。

“经院”本义是“学院”。8世纪末，查理曼创立宫廷学院，罗致一批教会知识分子，用抽象而繁琐的哲学推理（特别是三段论）来论证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信条，并使之系统化。这批人被称为经院学者。其后发展起来的学说，被总称为经院哲学。

下面就分类论述当时经院哲学家中代表人物的神学思想，以便了解巅峰状态下中世纪教

会的内在含义。

安瑟伦（公元1033～1109年）的神学思想。安瑟伦，意大利神学家，“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出身于意大利奥斯塔的贵族家庭。公元1060年加入本尼狄克修会。公元1078年任法国诺曼底省贝克隐修道院院长，教授神学。公元1093年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在教皇支持下就神职叙任权同英王亨利一世进行较量并取胜。

安瑟伦的神学思想主要承袭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他说：

“我不是为了信仰而寻求理解，我是为了理解而信仰的。”

他竭力探求与证明上帝的存在，提出了论证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法，认为人们是以完美的实体观点来思考上帝的观点。他指出，“完美”本身是实体存在的，否则怎么能说“完美”呢？既然上帝是完美的，那么上帝也就确实存在。他还认为，抽象的观念不仅是主观上的存在，而且它先于个别事物。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客观实体，凡是愈普遍、愈实在的，也就愈完美。所以，上帝是最实在、最完美的，因而上

帝和教会应高于一切。

在救赎论方面，安瑟伦在《上帝为何化身为人》中对悔罪、补赎的信念以及赏善罚恶的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其要点是：没有补赎便得不到赦罪，人的罪由于亵渎了上帝的荣耀，它需要无限大的补赎，而这样大的补赎只有靠上帝的帮助才能完成，上帝的这种帮助体现在基督为人所作的牺牲中。

安瑟伦除了在"救赎论"、"上帝论"和"教会论"等方面以"实在论"的观点加以阐述外，还对三位一体论、原罪论、圣餐圣事中的变化论进行了论述。代表作有《证道论》、《独白论》、《上帝为何降世为人》等。

阿伯拉尔的神学思想。阿伯拉尔（公元1079～1142年），经院哲学"唯名论"的代表人物，与其师罗瑟林、"实在论"者安瑟伦一道被后人称为经院哲学的开创者。他生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帕勒。曾求教于"实在论"者威廉，后受业于罗瑟林。一生坎坷，屡受教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实在论"派的迫害，最后凄凉地死在克吕尼派的一所修道院里。其代表作是《是与否》。

他虽然是一个唯名论者，但认识水平远远

超出了一般唯名论者。在其名著《是与否》中，阿伯拉尔提倡仿效亚历士多德的怀疑精神，说：

“的确，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

他还指出，使徒教父们包括奥古斯丁也会有错误，《圣经》的手抄本也会有错误。从而对教会、《圣经》和信仰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阿伯拉尔以前的基督教伦理思想，始终没有跳出“摩西十戒”的范围，要求信徒信仰虔诚。阿拍拉尔按照自己的神学观点，把基督教宣扬的伦理道德内容，从信仰的基础移到了理性的基础上来。由于他否认原罪理论，因此他认为，人虽然容易走向邪恶，但正是人能同邪恶不断地斗争，这就形成了人的“德性”。他的道德学说强调人的行为动机，认为善与恶原在人的本性之中，而不在行动上。

托马斯·阿奎那和《神学大全》。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公元1243年，加入多明我修会，以后，在阿尔伯特·马格努斯门下受教，不久到巴黎，获神学学士学位。公元1248年回科伦，帮助阿尔

伯特·马格努斯进行教学，同时继续钻研学问。公元 1257 年在巴黎大学任教。公元 1261 年赴意大利，教学几年，先后担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乌尔班四世和克雷门四世的神学顾问。以后，到巴黎大学讲学，同时担任法兰西路易九世的神学顾问。公元 1265 年以后，他动笔撰写《神学大全》。这部著作逻辑清楚，内容洲博精深，是天主教神学理论集大成者。公元 1879，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将该书定为罗马教会神学教育的基本课程。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体系的核心，并没有超出“实在论”的界限，即认为理性不能同信仰（宗教的）发生矛盾，理性必须服从信仰。但在形式上，他又同安瑟伦不同，更多地运用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他认为，哲学和神学可以同时存在，而理性和信仰则可共存。但它们有主次之分，即神学要高于哲学和科学。

依托马斯·阿奎拉的见解，探讨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如何才能认识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归宿”等问题。他认为，仅从自然中得来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由启示来加以补充和引导，启示来自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最高权

威，但圣经必须按教会的立场来认识、理解。由启示得来的真理不能从理性中获得，但这些真理与理性并不冲突。

对于基督教的核心——“上帝无时无处不在”这一命题，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安瑟伦从“本体论”来予以证明无多大说服力。他以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把上帝作为“第一推动者”和“终极因”，来阐述他的上帝论。这个论证分为五个方面，故而称为“五大论证”。托马斯·阿奎那的“五大论证”不仅涉及到神学的基本问题，也涉及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他以人的狭隘经验为论证的出发点，引导人们进行机械的思考和追溯，表面上十分理性化，但是无穷的追溯只会使人陷入迷茫之中，而不自觉地同意托马斯·阿奎那所要证明的“上帝确实存在”这一观点。

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论的思想要点是：上帝是无始无终地存在着，它是不能用时、空概念来表现的。上帝是最实在、最完美、最绝对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归宿，是“第一推动者”。上帝创造世界完全是出于“爱”，他将受造物看作施爱的对象。上帝主宰一切，他预定有些

人将得到永生，而有些人将被弃于罪恶中永受诅咒。托马斯·阿奎那强调，人虽然有自由，人的行动出于自己的意志，但是上帝有从中决定或应允的主宰权。他还认为，世界上所以有恶，那是因为上帝通过允许“恶”的存在而使人能在上帝的指引下，达到善的境界。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取消了“魂”和“灵”概念上的区别。他认为，“魂”和“灵”之间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的东西，具有理智和意志。他指出，人在心灵中得见上帝，又以信仰上帝为乐，乃是人生善德的最高造诣。人除了具有普通天赋的才能外，在受造时，又承受一种超然的能力，使他能够达到最高的善，并实行基督徒的“三德”：信、望、爱。

他还认为，人只有依赖上帝赐予的恩典，才能获取赦免由亚当带来的原罪，才能取得上帝原来要赋予人的能力。上帝恩典的基础，在于基督的救赎之功。因此基督徒的三大美德，也是取得救赎的条件。人在获救之后，赖上帝的恩典而行的善功，仍然会获得赏赐。得救的人不但要遵行福音的教条，而且还要按照福音的劝勉立份外之功，其中最重要的是虔诚地实行修道生活。

这些虔诚的信仰者不但自己能升入天堂，而且还能在基督与圣徒的功德库中提供自己一份功德。

由此可见，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体系，主要论述两大问题：恩典与功德。这也是一般信徒最关心的问题。

关于圣礼。在托马斯·阿奎那以前，一直把圣礼看作宗教的神圣行动，认为圣礼主要由五件圣事组成。后来，伦巴底人彼得将圣礼定为七件圣事，并且认为这七件圣事是由耶稣或使徒所设立的，通过这些圣事能将上帝的恩典带给信仰者；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它神秘的身体，除圣事以外，别无同基督交通的办法。托马斯·阿奎那将彼得的观点加以发挥、阐述。他认为，人因受洗而得以重生，原罪与个人受洗以前的罪均可赦免，但并不是以后就不会犯罪了，受洗以后，人只要能按照诫条享受上帝的恩典，就可以抵抗罪恶，形成基督徒的美德；在圣餐问题上，他指出，当神父诵读设立圣餐文时，上帝的权能即在完成神绩，虽然和“偶性”尚存，但是“实质”已变化为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在告解圣事上，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赎罪必须经过四

步：痛悔、认罪、补赎和赦免。

上述神学思想在《神学大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这部神学著作，虽然因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突然去世而没有最后完稿，但是，已经表述了系统的神学思想。可以说，该书是用基督教观点说明当时人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认识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神学著作。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神与自然，作者先阐述“三位一体”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叙述神创造世界，统治世界，人靠“神所启示的理性”通过世界认识神，但神又超越世界，因此单靠理性决不能认识上帝，必须凭信仰“超越”自然，这是神学的基础；

第二部分，论神是至善的，是世上万物的归宿，他由神的至善，进而分析道德伦理，分析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论述人由肉体而来的感觉、理性、情欲，有诱导人类犯罪的趋向，惟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加以克制。在第二段里，他论述了“神的恩典”，认为它表现为人的七种美德，前三种美德即：信、望、爱，这是人对神的仰赖关系；后四种美德是：公义、谨慎、刚毅、宽容，这是人与人关系的准则。

第三部分是《神学大全》中最短部分，主要阐述罪人皈依神的道路，宣扬救世主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及七件圣事（洗礼、坚振礼、领圣餐、告解、圣职、婚配、终敷）的功效等。

由于时代的不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较之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有了较大的不同。《上帝之城》反映的是奥古斯丁面对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时的虚幻的希望和理想。他诅咒世界的堕落、败坏，认为人类只有依赖上帝的“恩典”才会有得救的希望，他向往“上帝之城”，把人的理性看作罪性。而托马斯·阿奎那生活的时代正值教皇权力的鼎盛时期，由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流行，激发了更多的人进行理性的思考，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系统论述了系统化的神学思想，用以支持罗马教皇的统治。因此，托马斯·阿奎那死后不到十年，多明我修会就把《神学大全》定为该修会的准则。

在中世纪史上，一直习惯把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称为“黑暗时期”。有些人甚至把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罪因全归之于经院哲学。其实，这一观

点未免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一定时代社会存在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院哲学乃是这一时期西欧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所需要的思想体系。所以说，造成这个“最黑暗时期”的真正罪人是封建制度本身，而不能全怪罪于经院哲学。

当然，以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体系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作为天主教会的理论依据和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成为当时封建统治者扼杀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思想的武器。因此，经院哲学亦是罪不可推。

第五章　滴血的十字架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的强大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的前行，这样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

——教皇乌尔班二世关于东征的演说词

在金钱和权力的刺激下，残忍替代了博爱，仇杀替代了和平。

十字军东征，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出 华脱·司各特的长篇小说《巴黎伯爵罗伯特》和《爱凡荷》中引人入胜的几段描写。在有些人的记忆中，则可能记起历史教科书中比较枯燥、但是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中世纪西方骑士为争夺耶路撒冷与异端派们作战的故事。但是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将是：十字

军东征的起因是什么？具体情形如何？影响是什么？

在基督教会史上，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并不次于基督教的诞生。正是在这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圣战中，基督教会走上了势力发展的巅峰；也正是在十字军东征后，基督教会迈开了衰落的步伐。

而对于写作这本通俗历史著作的宗旨来讲，十字军东征的描述能使读者了解基督教残忍、血腥而狭隘的一面。

在规定这场战争的性质上，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宗教学者，更多的将之罩上一层宗教色彩，即认为它是一场基督徒对穆斯林的战争，因为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耶路撒冷，还残暴地对待基督的信仰者。故而，在许多宗教史书上，这场战争被冠以“十字架与新月”的战争。

但是，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为此，我们不妨先对这场战争的起因予以分析。

大致说来，几种因素的交炽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原动力。它们是：倍受压榨、生活困苦的农奴为摆脱困境，也为赎罪，参与了东征大军的行列；没落破产却又贪梦成性的骑士阶层构成

了东征的骨干；企图消灭异端，一统东西教会的罗马教廷组织、策划了这场战争。

总之，贪婪、扩张与抢掠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基色。

对中世纪欧洲的农民来说，公元11世纪是段难熬的岁月。土地被掠走，自己被迫投靠在封建领主或教会的门下，以宝贵的自由换取一条苟延残喘的生命。

据估计，西欧各国的农民几乎完全沦为农奴。他们要为领主服劳役（每周多至3天）。土地收获的农产品，大部分用于缴纳封建领主的地租、人头税、使用森林或草地费、领主作战时的养兵费。另外，还有象征农奴人身附依的种种特别义务，例如依照死手法，已死农民的财产应交给领主，如果死者的继承人想保有这份财产，必须贿赂主人，献给他最好的牲畜，最好的衣服。除此之外，农民还须负担的东西有法庭费、桥梁费、市场费以及教会的“什一税”等。这些如重重枷锁，压得农奴直不起身来。

到城市出现，商业随之发展，农民的生活更加苦楚不安。封建主迫切需要货币购买市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于是就普遍地实行了将农奴

的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的作法，对农奴加重了剥削。而且，封建领主之间连年混战，农奴被迫当兵，农村遭受战火的毁灭和领主军队的抢劫，生产破坏极为严重。据记载，公元1032年，法兰西许多省份连续3年歉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整个11世纪中，法兰西曾出现过26个荒年。在公元1087～1095年间，西欧发生了连续7年的荒年。

从现存的公元11世纪的编年史、修道院的户籍薄和圣徒传中可以看到当时农奴大批逃亡，田地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的情况。在法兰德斯（今荷兰、比利时一带）、英吉利……有不少走投无路的农奴挺而走险，群起抢劫领主、教会和富裕商人，常常被血腥地镇压下去。这就使当时的农奴从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除了苦难、悲伤之外，就是绝望，因而把心中虚幻的希望寄托在信仰的基督教上。

因此，当教会宣布参加十字军的士兵死后可以不受炼狱的熬炼而直升天堂时，负债累累而又无力偿还的贫民不仅在信仰上感到了希望，而且因为参加十字军后能够免付欠债利息，出征一年后还可免纳赋税，认为这是争取灵魂

得救和摆脱穷困的好机会。当时，教会还宣称，参加十字军的战士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向教会作借款抵押。教皇又派出使者四处游说，指出参加十字军是获得上帝赦罪的好机会。这就在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吸引了正处于“无能无告”状态的农奴，并在一定程度上把部分农奴对封建主的仇视转到了东征的征途上去。

公元11世纪的经济大变局，亦强烈地震撼着统治阶层。一方面，贸易的发达引起领主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而另一方面，满足他们无底欲望的可能性却不很大。技术简陋得可怜，又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和自然灾害的农业，贡献不了多少东西。何况，农村人为生活所迫，常常骚动。领主们的深宅大院里，时常为危险的气氛所笼罩。

为了争夺土地和财产，领主之间兵战不止。任何小事都可引起一场战争，而且目的只一个——占据新的土地和农奴。

领主为了能够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供养许多陪臣——为其服兵役的骑士。服兵役的酬劳是赏以土地。然而在法国、德国以及西欧其它国

家，已经没有无主的土地。现有的土地呢，又都已经分给陪臣。于是许多好战的领主陷入苦思之中。到哪里去掠夺土地？又从哪里获得作战费用呢？

而且，一个十分重要的局面使情况变得分外复杂。在11世纪中叶，中、小地主的土地愈来愈成了大封建主的财产。大土地领主“吃掉”小土地者的方法不一。最常见的方法是战争中强行掠夺或者小土地者自愿转让土地给大领主或修道院，借此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好处（如庇护、职位和“免罪孽”等）。土地垄断化运动与其它情况结合在一起，就造就了一大批无地无财却又贪婪残暴的骑士。

许多骑士之所以无地，是由于当时的封建领地继承制——长子继承权，即封建主的领地不是分与诸子，而是全部传给长子。结果封建主家庭中有不少儿子分不到产业，于是出现了绰号“无地”、“无产”、“光蛋”的骑士。正是这部分人，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骨干力量。

这些“破落户”式的骑士，既无财产，又要摆阔、装门面，入不敷出，渴望占有领地和农奴。在他们心目中，解决困难的最方便捷径便是抢

劫掠夺。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单枪匹马，横行于法国、法兰德、洛林和其它地方，袭击商旅，洗劫农村，劫掠农民手中可抢的东西：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衣服，甚至于农具。骑士们甚至不以拦劫路人为耻。

公元1096年，培隆的领主罗柏向阿尔的主教申诉说，他的农奴带着葡萄酒到阿尔城市场出售，半路被骑士洗劫一空。甘勒累的编年史作者称主教管辖下的一个城堡是附近农民的灾星，因为城堡主人的突然抢劫使农民损失惨重。

成群结队的骑士们也时常袭击大的领地，教会和修道院的巨额财富常常引得他们以身犯险。据11世纪中叶的文书记载，虔诚的骑士竟然“袭击手无寸铁的神父、修士或修女”，他们甚至于“使牧士会会员的公社，教会，赤手空拳的神父和修士修女享有的田地和所有物受损失”。他们夺取马匹、耕牛、大小绵羊、山羊和驴子；他们在法国南部纵火焚烧橄榄树林。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曾生动地描述这批光蛋骑士，他写道：

“我知道这种蛮横的人，凶悍达于极点，背信弃教甚于异教徒，到处破坏上帝的教会，追击

基督徒，有时候以酷刑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对儿童、老人、妇女都不知怜惜。"

农奴的反抗，穷困骑士的抢劫、领主间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一切在西欧社会造成了一种人心惶惶的"乱世"图景。那个时代的作家的著述和教会活动家的演说，都充满着对社会生活动荡不宁的唉叹和焦急。法国诺戎修道院长奇伯特有关于"法国全国叛乱"的记载。德国修士奥吕的埃哈特讲到11世纪人民所处的环境时说："社会的纷争、饥饿和时疫死人无数"。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演讲中痛心疾首的呼吁："盗匪使人日夜不得安宁。"

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重大利益，当前的任务是寻求一种方法，使它既能满足领主们愈来愈甚的对于土地、奴隶、货币和一切财富的要求，又能消弥正在形成、扩大中的对当权阶层的种种威胁。这一方法由天主教会指示出来了。

此外，促成十字军东征的还有深刻的宗教原因，即来自克吕尼派掌握罗马教廷实权以后所要追求的目标。

自教皇斯捷凡九世登位以后，教皇不仅在神职的叙任权上表示了教皇权力高于皇帝权力

的思想，同时在对待当时已分裂出去的东正教会的问题上，也抱着耿耿于怀的态度，企图有朝一日统一东西教会（当然以罗马教皇为首脑）。

格列哥里七世登上教皇宝座后，立刻着手实施上述目标。公元1073年，他在给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歇尔七世的信中指出：

“恢复由上帝制定的昔日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间的一致”是双方教会的共同愿望，但两派联合的前提是罗马教皇必须是基督教会首脑。

但拜占庭帝国和东部教会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格列哥里七世于公元1074年先后“下谕”勃艮底公爵威廉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多斯加尼女伯爵马替泰以及所有的“圣彼得信徒”，号召他们积极参加向东方的“圣战”，他写道：

“起来英勇的作战，取得胜过你们一切期望的天国光荣。你们有了费力不多而能获得永恒幸福的良机。”

这一号召在西欧封建主中掀起了响应的热潮。但是，由于教皇格列哥里七世和亨利四世皇帝的争权夺利斗争，使这一计划搁置起来。

也就在这一期间，掠夺成性的自由而穷困的骑士们，作了一次侵略他国的远征，为其后的十字军东征作了经验上的某些准备。

从11世纪起，法国的骑士就投身于夺回被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领土的战争——所谓的收复战争。诺曼底和法国南部省份的骑士们与领主的队伍一起，纷纷奔赴比利牛斯半岛。公元1063年，由阿奈坦公爵率领的远征大军首先抵达厄波罗河流域。关于他们大发横财的故事刺激了骑士们更大的贪欲。征伐西班牙的新队伍不断组织起来：在公元1073年，有香槟男爵埃培尔·德·拉西率领的远征；自1085年起，有柏干提领主和骑士的远征。在公元1085年卡斯提尔王阿尔封索六世攻取托利多城战役中，参加者不但有西班牙骑士，而且有法国和德国的骑士。

公元1087年，法国人又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统率这支军队的是柏干提公爵埃得和后来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土鲁斯伯爵雷门。这次远征的结果除了抢劫外一无所获。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参加者不但有骑士和侵略成性的贵族，而且还有农民。

这一切动态不会不使教会注意。它本来关心封建的土地占有者的地位，力图增强自己的势力。克吕尼派修士们以狂热宣传煽动法国封建主参加收复西班牙的战争，教皇也赞许法国人远征西班牙，并使参加西班牙远征的人获得为信仰而“受难”的荣誉。

由此可见，在十字军开始远征东方以前的几十年中，作为“封建体系国际中心”的天主教会的，对于由西欧社会生活在各面的发展而摆在它面前的困惑和危境，一直在摸索解决的方法。

现在，教会已然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即十字军东征。而所需要的就只有“天时”——东风了。

这个时机很快到来。到乌尔班二世担任教皇时，拜占庭帝国已然陷入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中无力自拔。

公元11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好不容易消除了来自西方的彼米纳格土耳其人的威胁，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又遭受了来自东方的侵略。大批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如潮般涌入美索不达米亚、巴格达、亚美尼亚和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省份——卡巴多喜亚和弗里基亚，并占领了

这些地方。

公元1071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同塞尔柱人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克特交战，结果惨败，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被俘，帝国朝野震动，惶恐不安。此时，它的领土已被塞尔柱土耳其人挤压得只剩下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几个沿海城市。据说，当时从君士坦丁堡皇宫的窗户里，能望见已不属于帝国版图的东部山脉。

从公元11世纪70年代起，塞尔柱土耳其人加强了攻势。公元1071年，占领属于穆斯林法蒂玛王朝控制的耶路撒冷，公元1084年又攻陷了安提阿，不久，大马士革和叙利亚的其他一些城市也陷落于塞尔柱土耳其人之手。

过去，曾有些教会史学家把公元11世纪末发动的十字军东征的原因归结为塞尔柱土耳其人迫害了东方教会的基督教徒，虐待了西方到耶路撒冷圣地的朝圣者，亵渎了基督教的圣物……。这种观点不仅肤浅，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塞尔柱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继续执行了阿拉伯人所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当时安提阿牧首区的牧首和耶路撒冷牧首区的牧首仍然在他们的驻节地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基督教视

为神圣的一些遗迹也没予以破坏，只是对前来的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这与后来十字军东征时的烧杀抢掠、大肆破坏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该说，乌尔班二世在公元1095年发动的这场十字军东征是克吕尼派长期以来在东、西两派教会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实践，是要把西欧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转嫁到拜占庭帝国的政策的行动，是对东方进行掠夺以繁荣西欧社会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是罗马教皇为使教皇权力高于皇帝权力的有效战略实施。当罗马教皇准备进行这场战争时，正好由塞尔柱人送来了东征的借口和已软弱无力、任人宰割的拜占庭帝国这样一个“天时”。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公元1095年夏，教皇乌尔班二世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同年9月，他在法国南部克莱芒地方召开了宗教会议，参加者有14名大主教，200多名主教和400多名修道院长。

9月26日，宗教会议结束这一天，乌尔班二世在露天下发表了庄严、煽动力极强的东征演说。听众不仅有几百名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还有成百上千的骑士和神职人员聚集在会

场外，在城外的田野上还有来自西面八方的农奴和平民，他们在这里搭着帐篷，沉浸在向东方入侵后能使其灵魂得救和经济上富裕的幻想中。

据修道僧罗伯特的追忆，乌尔班二世在演说中呼吁道：

“啊，法兰克人，你们是上帝拣选宠爱的种族，你们曾跨越崇山峻岭，建立起上帝所悦纳的国家，又加上圣教会的信仰，使你们能光照四方。

“但愿你们祖先的光辉业绩激励着你们，去完成男子汉的事业。当年查理大帝和的他的儿子路易，以及其它历代国王摧毁异教徒的王国，推广了圣教徒的版图。现在我们救主的圣墓被不洁净的国家占领、玷污。啊，英勇的武士们，要追忆祖先的光荣，要不愧为无敌祖先的子孙。

“你们之中，如有为父母、妻子、儿女所牵累的，应当牢记主在福音书中的话：‘凡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不要留恋家园，不要牵挂家务。你

们现在的土地，四周被丛山海洋包围，这狭小的土地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口，而且土地贫瘠，收获不足糊口。于是你们人吃人，进行战争，彼此杀伤。现在，但愿你们彼此间不再争吵仇视，而共同踏上去圣墓的征途，把那块流奶与蜜的大地从邪恶民族手里夺过来，它就成为你们的产业，因为那是上帝为以色列人的子孙所预备的。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的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

“我现在恳求你们，劝勉你们，不，不是我，乃是主之愿，我只是作为主的使者向你们劝勉，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的人，乃至所有的骑士、士兵、富人和穷人，都必须迅速地给予东方基督徒以援救。

“让那些从前十分凶狠地因私事同别人争斗的人，现在为了上帝去同异教徒斗争吧！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和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去同那些亵渎圣地的蛮族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的收入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

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对于目前的不公平状况我还能说些什么？这里到处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而东方充满了欢乐和富饶。……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等待了，赶快回去料理好事务，筹集足旅费和置办好行装，到冬末春初之时，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程！”

乌尔班二世关于东征的演说如同兴奋剂，刺激得各阶层的人狂热起来。

首先，这番号召完全投合于农奴们的苦行情绪。穷苦农民因为要摆脱封建的桎梏，原来就梦想作出“赎罪的功德”。教皇把握农民群众的这个心理，就向他们提出完成这种功德的具体计划，给予了群众的反封建情绪的一条发泄之路。

但是教皇也考虑到只答应来世的幸福还不足以吸引大量民众参加他所策划的事业，因此，他承诺在“天国”的幸福之外，还答应给予参加者以人间利益。他使立誓前往“圣地”的穷人不但指望在天上得救，而且战胜了“不信者”后，还有具体的人间利益可得。对穷人不会不起作用的教皇口中的最有力论据，是他提出来的这一基本命题：

“在这里悲惨贫困的人，到那边就欢乐富有！”

乌尔班二世力图鼓动在国内“叛乱”威胁封建领主安宁的人尽量加入远征，愈多愈好。所以，他在捏造的天国幸福和未来的尘世快乐之外，再加上一条：到耶路撒冷的路途并不遥远，到达“圣城”并不十分困难。他故意小看平民为这个事业所将遭遇的艰苦，虽然他明知道他是因此驱使了千万穷人流血丧生的“主的路径”。可是他只号召他们出发远征，不顾一切。穷人为了援救“东方兄弟”，必须抛弃他们的生命。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不仅旨在打动下层人民。教皇首先号召贫困的骑士和那些力图增加自己土地财富的大封建主侵略东方国家。他以富庶的东方国家抢劫和夺取土地的远景引诱骑士，他使无领地的“不可战胜的祖先的后裔”想到他们生活着的土地狭小而贫瘠，率直地号召骑士去东方抢劫，去占领敌人的土地，向骑士们指示了一条出路——参加十字军东征。

教皇在号召人们为“神圣事业”牺牲最后财产的同时，没忘记附带一个特别的忠告：为了使走上“主的路径”者的财产在他远征期间得以保

全，应该将它交给可靠者保管，而这可靠者，不言而喻，当然就是天主教会。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教皇在他的演说中无论怎样也掩饰不了教皇与这个即将出发的远征联系起来的宏大计划。罗马教皇是打算借十字军的力量击败塞尔柱土耳其人，而在牺牲了“获得解放的正教徒”以扩张天主教会势力范围之后，夺取东方教会的财富。这才是罗马教廷组织十字军东征的最重要的目的。

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军事远征揭开了帷幕……。

哭泣的耶路撒冷：发生在耶稣殉难地的杀戮

公元1096年春初，法国北部和中部、法兰德、洛林的首批农民队伍，从莱茵河出发“朝圣”。继他们之后的是几批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穷人队伍。他们由于现实社会中各种难以忍受的苦难，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同时还由于无知，携老带幼，有的步行，有的坐着牛车，象古代民族大迁徙一样，沿着“主的道

路”，向东迈进。他们差不多都没有武器。穷人拿棍棒、镰刀、斧头和铁耙代替刀枪，而且连这些农具也并不是人人都有。

由破产骑士穷光蛋瓦尔特率领的法国北部农民队伍，约有 15000 人（其中只有 5000 人有武器）。人数略少的是追随者隐士彼得的队伍，约有 14000 人。归法国骑士奥尔良的俘尔舍尔指挥的有约 6000 农民。另外还有英国和洛林的农民队伍约 12000 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奴，也有一小批骑士和封建领主。

这批人经过匈牙利、保加利亚进入拜占庭帝国境内。他们沿途抢劫，纪律极坏。在贝尔格莱德附近，他们强夺城郊农民的大量牛羊；时隔不久，他们在攻陷了匈牙利的那特拉城之后，又蹂躏了塞姆林城，屠杀居民约 4000 人。因而引起了沿途群众的极端仇视。

公元 1096 年 10 月，到达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东征队伍与强悍而训练有素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军队相遇。一阵屠杀之后，东征军四散崩逃，留下了 25000 具尸体。当时这样记载：

“死于伊斯迈尔剑下的高卢人和诺曼人，为数之多至于积尸不是如丘陵高地，而是如崇山

峻岭。”

此次战役，生还的“上帝之师”不过3000人左右。

这次结局悲惨的贫民出征，只是继它而起的“伟大十字军”东征的前奏。

公元1096年秋，第一次东征军队伍组成，主要是骑士和贵族。这次远征军共10万人左右，较之先前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这支打着绣有十字架的圣旗、以“主”的名义进行东征的骑士队伍，一路抢劫，以致十字军未到之时，农民就屠宰牲畜，逃离乡村。达尔马提亚的居民只把十字军当作盗匪和暴徒。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被誉为“最杰出的”十字军人首脑土鲁斯伯爵雷门，由于对待地方居民的残暴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下令将一个捉来的人斩首剜目，砍去手足。然而，这类事还不过是个开端。“基督军人”的一切丑恶行为，在以后还有更充足的表现。

君士坦丁堡听说无数西欧骑士向东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因为抱着侵略目的前来的“援军”的侵入，对拜占庭来说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他们人多势众，人数不下10万，且装备精良，当时的帝国皇帝亚历克修·科姆尼那亚对于基督战士并不表示欢迎，而且绝不信任他们，他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保卫骑士队伍经过的拜占庭领地不受未来的“圣地解放者”的横暴和贪婪之害。为此，拜占庭的军队，常常奉命不时袭击向拜占庭首都进发的骑士。双方冲突不断。

公元1097年春，骑士大军陆续开往小亚细亚，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耶路撒冷远征。

领主和骑士们身临小亚细亚后，就馋涎欲滴的急于争夺土地和财产。每攻入一座城市，十字军骑士就恣意屠杀居民，抢劫金银。公元1098年，法国布洛瓦公爵司提芬在攻陷安提阿后写信给妻子说：“请相信，我现在所有的金银，已经比与你分别时多一倍。”一些编年史描写十字军侵入叙利亚：“无论城镇田野及其它地方，我们都叫鸡犬不留。”那些贵族骑士们的最好消遣，就是竞相吹嘘掠夺到了多少财物。

由于土耳其人内部不团结，十字军连连取胜。争先恐后地前进，真如赛跑一样奔向耶路撒冷。十字军东征将近结束了。

十字军围攻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埃及在不久前才从塞耳柱人手中夺取的。一阵猛攻之后，城市陷落了。

占领城市后的洗劫和屠杀，充分暴露了十字军士兵的贪婪和残暴。骑士们冲进伊斯兰教国王奥玛的清真寺，搜寻以前听人说过的珍宝。他们在这里杀戮穆斯林和犹太人。据编年史家记载，在奥玛清真寺中，血流成河，鲜血漫及马上骑士的双膝和马颚。骑士们在抢劫之后在出于神话的"主墓"前祷告，祷告完了再杀人。他们无人不杀，不论男女儿童，将死者的头颅在岩石上摔碎。据说十字军大屠杀之后，又分头闯入市民家里，抢夺所有的财物。他们定下这样的规矩，就是最先侵入人家者，不论这家是贫是富，就占有、取得房屋或住宅及所有财物。

一个十字军武士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在所罗门圣殿里屠杀了近万人。如果你站在那里，死人的鲜血能从你的脚面直染上大腿。他们（指穆斯林）之中，谁都不能保住生命，妇女婴儿也不能幸免。你们可看到，我们骑士的侍从和较穷的士兵，怎样剖开死人的肚皮，为要取出他们生前所吞下的金币。为此，骑士们把尸体堆积起来，

烧成灰烬，以便容易找到黄金。在这样大流血之后，士兵又到居民家中，劫取其中一切东西。这样，许多穷汉变成了富翁。”

圣战名义下的十字军杀戮，将圣洁的耶稣受难地变成了血淋淋的人间地狱。18世纪末叶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他的名作《罗马衰亡史》中就称十字军骑士为“抢劫者放火者杀人者”，他们只想以剑获得“富饶和有名的领地。”这确实是鞭辟入里的评述。诚如马克思所说，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的行为“激起东方一切信仰伊斯兰教民的愤怒。”

而教皇给十字军的赦罪书，实际是支持它的血腥屠杀与抢劫财物。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支持下，十字军于占领耶路撒冷后的几年内，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全部。他们陆续征服了重要的海港城市——海法、阿苏、的黎波里、西顿、贝鲁特，最后是在公元1124年占领了泰尔。

在这里陆续建立了十字军国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北面的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提俄克公国和南面的耶路撒冷王国。

这样，在12世纪初期，西方封建主借“十字军东征”之名，在富饶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十字军在东方大获全胜。十字军之所以取胜，不是由于宗教观念使他们与“异端”分子作战时有了某种特殊的非常的刚强和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组织胜过敌人。十字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基于自己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穆斯林方面的无组织。穆斯林世界分散为许多小国家，由于这个分散，“基督教军队”虽然遭到了不小困难，而整个来说却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反击。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重要的实际结果，是西方侵略者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地区，这首先满足了一小撮教会领主和非教会领主熏心的利欲。对西方人民来说，这结果的代价是巨大的。因罗马教皇的罪恶，法、德、意及其他西欧人民死亡了成千上万。骑士也死亡不少。公元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已经死亡了几万人。1096～1099年名义上“为信仰”而实际为西方统治阶层而战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又葬送了几万人。这其中，大多数是穷困的民众。

而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死亡的人远不止此数。起于公元1100年的十字军运动的新浪潮，是这一次东征的直接余波和延续。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轰动了西方。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回来的十字军大讲其在东方获得金银财宝的故事。这正好打动许多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的人们的贪心，刺激他们的欲望。伦巴底、柏干提、香槟、德国的穷困者纷纷出发，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兹所说，他们“并不是反对异端的战士，而是财富和幸运的寻求者。”据统计，公元1100年前往东方的伦巴底人有15～16万，仅农民就有6万。参加这次“后卫”十字军东征的民众约20万。可惜，梦幻迷人的东方等待他们的不是幸运和财宝，而是无情的杀戮。在公元1101年夏天的战役中，这批人几乎伤亡殆尽，鲜血染遍了整个小亚细亚。

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国家，都按法兰西封建制度，建立起封建军事专制统治。把土地分给骑士作为领地，当地阿拉伯穆斯林和叙利亚、希腊基督徒都沦为骑士领主的农奴。

仿佛一夜之间，骑士和封建贵族们获取了巨大财富。当时的一个随军神甫夏特修道院的

修道僧伏歇描写说：

“在欧洲只拥有一个小村庄的骑士，现在成为一座城市的领主，原来只有几个铜板的，现成了大富豪。在这里应有尽有，谁也不愿回欧洲了。”

当时，这些留在巴勒斯坦的骑士领主不过几千人，而他们狭长的十字军国家从南到北有1200公里疆界，突厥人不断袭击，农奴不断起义，骑士领主左奔右跑，难以兼顾，急需一支常备军来维护统治和抵抗外族的攻击。为此，教皇又在西欧组织起几个军事修会。最早成立的是公元1118年组建的法国圣殿骑士团。其缘起是，在11世纪，教皇为到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中途病倒而成立一个慈善组织，它于1120年仿效圣殿骑士团，发展为意大利人组织的圣约翰骑士团。12世纪末，又由德意志骑士组成条顿骑士团。这些僧侣骑士绝大多数是西欧各国破落贵族出身的亡命之徒，按照修道会方式组织起来，直属教皇管辖，开赴叙利亚、巴勒斯坦，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与毗连的穆斯林国家作战，保卫并扩大十字军领地。

这些骑士团受到西欧和十字军国家统治者

的欢迎与支持。在西欧、叙利亚及巴勒斯坦，骑士团拥有大量田产，享受免税特权。圣殿骑士团不仅作战，还趁机大肆抢劫。他们并且建造船队，经营贸易，利用从东方抢来的金钱放高利贷，成为欧洲最有势力的早期银行家。难怪当时有人说，在圣殿骑士团那里，“契约、账薄比宗教书籍多得多。”

12 世纪上半叶，各伊期兰教王国在摩苏尔统领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地向十字军国家发动进攻。内部分争不已的十字军国家屡战屡败。偏偏在这时，拜占庭帝国军队乘火打劫，不断杀向军心涣散的骑士团。公元 1144 年，塞尔柱土耳其军队攻陷十字军在叙利亚北部的要塞以德撒。这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不到 50 年，十字军骑士们便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侵占的领土，而无可奈何地向欧洲崩退逃窜，沿途丢下无数同伴的尸骨。

第一次东征的结果不论使教会多么高兴，到底还是辜负了教皇的许多期望。罗马教皇为缓和西方社会矛盾驱使东征的人民，在异国他乡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然而这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虽然天主教会暂时转移了部分农民的

斗争目标，使他们不至于在国内骚动暴乱，但到12世纪时，社会斗争的空气不但没有消除，反而适得其反，剧烈地强剧起来。农奴苦于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和领主的专横暴虐，继续暴动不已。除此之外，教会和世俗封建主又面对着一股新兴的敌对力量。这时，城市如春笋般在欧洲大陆上出现、兴起。农奴大批逃入城市，想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正是在城市里起而反对封建领主的压迫，有时不惜武力抗争。

“造反”的趋势如火如荼。处处出现了城乡下层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的“异端运动”。这一运动在法国和法兰德，在英国和德国的城市里蔓生滋长。

面对这些震动封建统治大厦的潜流，教会又陷入了它在50年前曾遇到过的困惑之中。就在这时，远征东方的“圣战士”们连连败于阿拉伯穆斯林剑下，圣地耶路撒冷岌岌可危。于是，教会又开始鼓吹再度远征东方的大规模运动：“圣幕”已陷入危险之中了！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这次十字军东征最卖力的组织者和鼓吹者是教皇尤金尼乌三世的亲信、息斯特西安派克

莱奥修道院院长贝尔纳。这个战争狂人，后来被教会列为“圣徒”的修士，对于十字军国家的命运极为关心。在一篇题为《圣殿骑士新军颂》中，贝尔纳号召圣殿骑士们毫不留情地屠杀异教徒穆斯林，征服“非基督徒”的领土为教会增光。他写道：

“如果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制止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过分敌视和迫害，不必加以杀戮，否则以杀尽为上策。”

这就是这位以新的“圣战”的说教首领自任，以杀人为乐的天主教修道院长提出来的黩武的天主教纲领的要点之一。

公元1146年春，贝尔纳出席在未斯雷举行的法国男爵、骑士、教会高级僧侣参加的大会，鼓吹了发动“圣战”的理论。之后，开始漫游法德的许多地方，到处煽动骑士和平民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宣传的对象中，不但有“善良的天主教徒”，还有杀人凶手、窃贼及其它罪犯，勉励他们为圣地而战以赎罪孽。

农民已经吸取了第一次十字军的东征中的惨痛教训，对“圣战”已无太大热情，故而只有几千农民响应贝尔纳的号召。封建主和骑士从

第一次东征中发了财，自然积极响应贝尔纳和教皇的号召，自告奋勇地站在十字旗帜下准备与异端作战，目的在于谋取更大的利益。正是这批人组成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主力，这是迥异于第一次东征的特征。

贝尔纳还亲自说服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参加东征。当时，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为巩固王权，正企图掠夺新的财富，开拓新领土。从东方贸易中取得巨大收益的法德两国王室尤其对十字军热衷。因此，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与康拉德三世都决定亲自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147年夏，法、德都已编成十字“大军”。两国各有7万左右骑士，追随他们的还有贫苦农民群众，人虽不及公元1096年那一次东征多，但还有好几千人。

法国的远征军由路易七世统率，教皇派使臣随行。德国军人的领袖是康拉德三世。德军先行出发。一个月后，法国队伍也踏上了“主的道路”。

德国骑士跨越匈牙利领土经希腊土地前进，沿路洗劫居民，虽然此时德皇与拜占庭正处

于联盟关系。德国骑士在色雷斯的肆意横行，使得拜占庭皇帝纽伊尔·科姆尼那斯不得不以武力教训这批“基督教的保卫者”。在阿德利安诺普附近，双方发生血战。不久，康拉德三世率兵抵达君士坦丁堡，表现了抢劫、酗酒及诸如此类的功业。随后，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于1147年10月末与穆斯林苏丹的强大军队遭遇，毫无组织和斗志的德国十字军惨败。“基督战士”在崩败之后又遭到饥饿的困扰和瘟疫的袭击，大部分人死亡。幸存者含羞回国，发誓不再参战“圣战”了。只有人数不多又最好战的德国十字军人，包括康拉德三世及其侄子腓特烈（后为德国皇帝，第三次十字军统领）在内，决心等待法国骑士，继续十字军东征。

公元1147年9月，法国军队开抵君士坦丁堡。其时，西西里王国的国王罗泽二世正围攻君士坦丁堡。据记载，法王的左右侍臣建议他与罗泽二世合作占领君士坦丁堡，消除东征的后顾之忧。特别主张实行这一计划的是贝尔纳的学生、隆格尔主教哥德佛利。这位虔信基督的主教绝不考虑到拜占庭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上述计划并未实现。因为据闻德国十

字军已然在与异端的战斗中大获全胜，正全力向东部的富沃之地挺进呢。于是，利欲熏心的法国骑士们急忙随自己的国王渡海东去。在尼西亚，他们与腓特烈率领的残余德国队伍会合。十字军继续前进，改道走小亚细亚的西、南省份，沿途皆是高山急流，使得士兵筋疲力竭。德国人中途退缩，说是去君士坦丁堡重整为异端们击溃的骑士队伍。

1148 年初，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法国队伍，从雷俄提西阿沿山岩重叠的道路向前进。塞尔柱克人不断偷袭十字军，使他们伤亡甚众，粮食丢失严重。

2 月初，十字军到达拜占庭城市亚达里亚，这城市的统治者同意供应十字军船只，运送他们到叙利亚。但船只太少，于是信奉基督教的“热爱邻居”这一训诫的出身名门的骑士，不顾贫民的死活，毫不迟疑地扬帆离小亚细亚海岸而去。被抛弃的人大部分成了塞尔柱克人屠刀下的鬼魂。

人数不多的法国十字军到达了安提俄克。不久，康拉德三世也率少数德国骑士赶到。这时，耶路撒冷王国正与大马士革作战。十字军的

统领们忘记了他们当前的任务是驱逐异端出伊德萨城，抛开与摩苏尔作战的念头，与集合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军队猛攻城防坚固的大马士革。

由于德、法骑士间的不断争吵及耶路撒冷王国中贵族的叛变，大马士革久攻不下，而摩苏尔的穆斯林骑兵又从北面开来。

康拉德三世知道前途无望，于 1149 年春萧然归国。几个月后，路易七世亦返回国内。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就样不欢而散。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完全失败。它严重损害了教廷威信，也动摇了骑士团的势力。教会的最高统治集团开始找寻使这次宗教事业的失败的罪人。教皇将全部责任推到贝尔纳身上，而贝尔纳则声称他是奉教皇命令行事。为了保全罗马教会名誉，教会的上层人物互相指责起来。

公元 1189 年，埃及、叙利亚联军在穆斯林苏丹萨拉丁统率下攻陷耶路撒冷。一场疯狂的屠杀和抢劫之后，这块神洁的朝圣之地再次血流成河、尸骨遍地。

罗马教廷和欧洲大为震惊。教皇格列哥里八世和继任的克雷门三世立即号召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势力日益增强的英、法、德三国国王

率领骑士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第一、二次有显著的不同。当时西欧的农民对于到东方去获取土地和摆脱封建压迫的幻想已然破灭，不愿意再参加东征，空耗精力和鲜血。热衷于新十字侵略的是西欧的骑士和大封建主，以及从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中大发横财的意大利北部从事东方贸易的城市。

这次东征军共约3万人，由德、法、英三国国王分别率领。他们都企图控制地中海的贸易线，故而争先恐后的参加了这次东征。而沉重的军费负担却落到了农民的头上。按教会训谕，凡不能亲自参加十字军的，应出钱支持十字军，农民除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外，又被教皇课以“萨拉丁什一税”。

但是，这次表面上准备充分而声势浩大的东征，并没有取得什么预期的实际效果。

这首先是因为君士坦丁堡对十字军将士们的不信任和警惕。拜占庭皇帝偷偷与苏丹萨拉丁签订秘密结盟条约，准备共同将十字军赶回欧洲老家去。不料消息走漏。德国十字军就借机报复，攻占了一系列希腊城市，迫使君士坦丁堡

屈服求饶。公元1190年，德军攻入小亚细亚不久，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特烈跌入河中淹死。群龙无首，他率领的德国骑士队伍作鸟兽散，大部回折回欧洲。

英、法两国沿途抢掠，进军迟缓，公元1191年才抵达叙利亚。两国国王同床异梦，明争暗斗。在攻陷阿克要塞后，法国军队就携带抢来的珠宝回国了，留下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在东方与强大的阿拉伯骑士兵苦战。理查以残暴闻名，曾一次处死3000名俘虏。在攻占沿海地带之后，他的兵力也伤亡殆尽，无力再战。于是转而与作为异教徒的萨拉丁讲和，把他的妹妹嫁给萨拉丁，还放弃对耶路撒冷的领土要求，把耶路撒冷王国让给萨拉丁。作为交换，萨拉丁同意西欧朝圣香客和商人在三年内可以进入耶路撒冷。随后，理查仓皇回师。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便这样虎头蛇尾宣告结束。

公元1202～120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它依然以“收复圣地”为口号，实际是推行罗马教廷征服拜占庭帝国、建立封建神权大一统天下的计划。

这次十字军的圣斗士们既没有前往圣地巴勒斯坦，也没有进攻控制巴勒斯坦的埃及，而是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了东方的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建立起一个听命于罗马的傀儡拉丁帝国。十字军的本来面目，从这可见一斑。

公元 1198 年，野心勃勃的英诺森三世当上教皇后，就积极着手实施罗马教廷的“伟大”计划。他向西欧各国发出通谕，号召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又以基督教首脑的口气通谕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三世，要求拜占庭帝国为“上帝的战士”提供人力物力，君士坦丁堡教会并入罗马教会，实现教会的统一。他暗示道，如果亚历克修三世不应上述要求，那么，西方就可能对拜占庭采取行动。

拜占庭帝国断然拒绝了教皇的狂亡自大的通谕，虽然此时帝国已是兵衰力弱，无力承受强大的打击。

于是，攻击垂亡的拜占庭国的各种力量在“圣战”的名义下聚集起来。它们是，法、德两国的封建贵族，承担运送十字军的威尼斯舰队。

公元 1202 年春，法、德、意的十字军骑士们集中于威尼斯。他们之中，大部分是骑士亡命

徒，只知抢劫掠夺，而不问抢什么地方，抢什么人。威尼斯总督提出，十字军欠付兵员的运输费，应由协助国威尼斯进攻匈牙利属下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萨拉城，夺得城市后，战利品由威尼斯和参加十字军的骑士均分。一场卑鄙的交易达成了。

是年秋，十字军由海上突袭萨拉港，一举成功。骑士们在城里大肆抢劫，连教会也不能幸免。事后，精明的威尼斯商人统治了萨拉港。

公元 1203 年春，十字军借口帮助希腊皇太子推翻篡位者，恢复法统，直驱君士坦丁堡。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前，十字军的首领们就预先商订了瓜分拜占庭帝国的计划，战利品由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平分，十字军中的主教还宣布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骑士罪行可得以赦免，借以刺激骑士们的斗志。

翌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骑士们立刻蜂涌而入，侵入宫殿、教堂、修道院、店铺和民宅，大肆抢掠，无恶不作。十字军骑士维拉杜安以惊喜的心情描写说，战利品包括“金、银、宝石、金银器皿、绸缎衣服皮货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多得数不清。”拜占庭元老院的一位议员是

这样叙述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暴行的："他们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镶满宝石的圣台砸成碎块彼此瓜分，把马匹牵进教堂，搬运抢夺到手的金银。还让一个妓女坐在大主教坐位上唱淫荡的歌曲。"十字军中主教、神甫在这场可耻的抢劫中不甘落后，与骑士们合伙抢劫修道院，把战利品装车运回西欧。收藏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在这场大劫难中化为灰烬。

十字军的罪行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的仇视。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任何一个十字军骑士只要在任何希腊城市出现，就会被人绞死。

面对十字军玷污十字架圣洁的丑行，英诺森三世不得不装腔作势地谴责十字军的抢劫行为。但这只是作作样子，以维护罗马教会的名誉。接着，他就把君士坦丁堡陷落称作为"神的奇迹"，是拜占庭帝国教会背叛罗马教会所应受到的惩罚。他还催促十字军的将士们严密监督君士坦丁堡教会，使之恢复对罗马教皇的崇敬之情。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弱小的"拉丁帝国"，由法兰德伯爵鲍尔温当皇帝。为争取教皇支持，鲍尔温立

刻上书教皇，要求将东部教会置于教皇领导之下。英诺森三世大为感动，便号召全体基督徒保卫拉丁帝国。息斯特西安派修道僧、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闻讯纷纷前往拉丁帝国。

公元1204年秋，十字军又攻占希腊和小亚细亚各地。教皇立刻派出红衣主教出使拉丁帝国，迫使希腊正教徒改信罗马教会，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先是劝说，劝说失败，就采用暴力，把不从命的逮捕下狱，封闭希腊正教的教堂，将神甫赶走，改派罗马教会的神甫去主持教会。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希腊民众的信仰，拉丁神甫始终未能控制希腊人民。

十字军用刺刀建立起来的拉丁帝国，不断遭受来自人民的攻击，半个世纪后，于1261年覆灭。之后，拜占庭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其势远远不如昔日了。

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野蛮占领，表明十字军东征已成为教皇争夺霸权、抬高政治地位的工具。在此后的四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参加人数不多，也不再具有欧洲参加的规模与气势了。

但是，既然东征这一工具已给罗马教廷带

来了巨大的收益，教皇又怎会甘心放弃呢？于是，罗马教皇继续站在圣彼得大教堂前，举着十字架，向教徒们宣传要“收复耶路撒冷”、“进行圣战”。

公元1212年，一个自称是“上帝使者”，说上帝任命他为解放“圣地”战争的儿童军指挥的12岁牧童在教会的支持和操纵下组织起了一支“儿童十字军”共约3万人的队伍。教会借机大肆宣传：

“儿童能凭虔诚信仰，感动上帝施行奇迹，完成十字军未竟之业，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耶路撒冷。”

于是，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捧着旗帜和十字架，唱着祈祷诗，随着12岁的小牧童前进。他们一到达马赛港，立刻被驱赶到码头上，登上了早为他们预备好的贩奴船。两只船在撒丁岛附近沉没，其余的五只船到达埃及。在那里，船主人把可怜的小“基督战士”卖给了奴隶贩子。这批纯洁的儿童，就成为了教会煽动的十字军东征中最悲惨的牺牲品。

无独有偶，德国也出现了一个骑士，他带着10岁的儿子在下莱茵河一带活动。这个幼小的

孩子在父亲的训导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骗子。他竭力使大众相信：据上帝示兆，他将脚不沾水地走过大海，在耶路撒冷建立“神国”，而且这目的将不由征服“圣地”来达到——儿童们能使穆斯林改信基督教。

小骗子的行骗行为非常成功：约有 2 万名男女儿童聚集在他周围。这支儿童军立即从科隆出发，沿莱茵河前进，越过阿尔卑斯山，历尽艰险（在路上，约有 2/3 的儿童死于饥饿）。公元 1212 年 8 月，孩子们到达热那亚，然后继续南下。到罗马后，一部分逃了回去，一部分到达布林的西。幸亏有当地政府的干涉，这部分孩子才没成为奴隶贩子们赚钱的货物。

英诺森三世对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视而不见，反而利用几万儿童十字军的死亡，大肆宣扬东征，企图激发成年人的远征狂热。

公元 1217～1221 年，匈牙利国王和德国、奥地利、荷兰的贵族领主在财富的诱惑下率队进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进攻埃及，结果大败而返。

这次东征失败以后，骑士们再也不愿远征东方了，受长途跋涉之苦。东方居民的敌视情

绪，以及阿拉伯骑兵的屠刀已使他们谈虎色变。所以他们宁愿在欧洲以讨伐异端为名进行抢劫，或干脆呼啸山林当草寇。

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为向东方扩张势力，于公元1228～1229年组织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教皇格列哥里九世宣布禁止这次十字军东征，说腓特烈二世企图占有耶路撒冷王国，是居心不良，并开除腓特烈二世的教籍。后者无动于衷，依旧按计划向东方挺进。

腓特烈二世到达地中海东岸，他利用大马士革总督与埃及苏丹之间的敌视关系，与埃及苏丹达成秘密协定，保证支持苏丹，反对苏丹的一切敌人，并互通贸易；埃及苏丹则把耶路撒冷及其它城市交与腓特烈二世。

格列哥里九世闻知这一交易后大怒，立即出兵进攻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迫使腓特烈回师欧洲。此后，十字军首领之间又纠纷暗斗不已，并与大马士革总督勾结。公元1244年，埃及苏丹出兵重新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

公元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宗教会议上又号召进行十字军东征。当时法兰西国的王权势力日盛，与东方贸易关系到法兰西的

繁荣。因此法王路易九世积极响应教皇的号召，以便从事向地中海上的向东扩张。在他亲自率领下，举行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间是公元1248～1254年。不过这次东征与前两次东征一样，以失败而告结束。路易九世成了埃及人的阶下囚，最后花巨款赎身，才获自由。

公元1270年，不甘失败的路易九世又亲自统率军队进行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时的欧洲人已对十字军的命运不抱任何信心，都不愿把宝贵的生命赌在一场毫无把握的战争上。志愿东征的骑士少得可怜，以至于路易九世不得不重金聘请骑士同行。

此次攻击的目标是繁荣、富裕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十字军顺利地在威尼斯登陆，正准备猛攻这座城市时，天不遂愿，瘟疫席卷十字军兵营。大部分骑士病死，连路易九世本人也未得幸免。残余者惊恐不安，仓惶回国。

13纪末叶，教皇又多次号召进行东征，但由于新兴的民族国家长期混战，而近东也因十字军的多次掠夺不再富庶而失去了对欧洲人的吸引力，所以，十字军东征计划再也没有付诸实现。

到公元1291年，失去了西欧支援的十字军在东方的殖民地，全部陷入埃及人之手。

“解放圣地”的目标已随岁月之水无情流逝了。

直到今天，罗马教会还把十字军东征歌颂为中世纪教会的“丰功伟绩”。不少西方学者则强调十字军对沟通东西文化，促进西欧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与上述观点相反的看法则是，十字军东征纯粹是一场西欧封建主和教会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欧洲和东方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本书对此的评价是：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仅要用各种手段掠夺被压迫阶级的劳动果实，而且也往往使用军事力量夺取别国的领土和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如同亚历山大皇帝的东征、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西征一样，都是奴隶主统治者和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向外掠夺的侵略战争。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从客观上讲，我们也要全面而真实地分析这场“上帝”名义下的战争在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经济关系中造成的变化，

以及随这些变化而来的诸种深远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十字军东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大致说来，结束于公元1291年的这场战争给后世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方面：

(1) 罗马教皇通过十字军东征(主要是前四次)，提高了权威，成了西欧统治集团内的霸主。它的政治势力在公元1095年至公元13世纪末达到鼎盛时期。通过对东方的掠夺，西欧的教会、国王、大领主及部分骑士积敛了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教会内部沉缅于享乐之中，慢慢腐败下去了。

(2) 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人民的负担较之以前更为沉重，由此激发了西欧社会的阶级矛盾，为教会的衰弱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3) 东方的财富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条件。这是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之初所始终不及的。

(4) 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这是此次东征最恒久的影响之一。当时西欧由东方传入了造纸、制火药、印刷等技术，获得了失传8个世

纪以上的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取得了东方人在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建筑等方面的杰出成果，并且从东方学会了种植稻米、荞麦、西瓜、柠檬的技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还从东方学会了纺造印花布，毯子，缎子，薄纱等工艺。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欧洲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苦涩之果：基督教异端派运动的兴起

中国有句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最好注解。

当雄心勃勃的西罗马帝国教会借助十字军的刀剑建立起对欧洲世界的绝对主宰权威时，它也正准备吞下自己酿就的苦涩之果：来自内部的异端派运动的冲击。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不错，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受益者是罗马教廷：大量财富源源而来，大批的领主贵族、国王唯教皇之命是从。但另一方面呢？财富也刺激了西欧商品经济的膨胀，产生了教会的敌人——资产阶级；印刷术的传入使普通民众读书识字、分辨是非正邪的能力大为增加；火药的传入则为国王在以后与教会的战斗中提供了猛烈的火力；更主要的，广大农民从十字军的残忍而血腥的屠杀中认清了教皇贪婪而残暴的嘴脸，从而站在了教会的敌对面。这一切后果，对教会来讲是一件十分头痛而恼火的事，因为它们发展的结果是要动摇教会的统治大厦。

教会现在不得不要吞下的苦涩的果子便是及教会的异端派运动。

基督教会史上的异端运动可谓渊远流长：7至10世纪，在拜占庭帝国有保罗派农民运动，他们谴责官方教会是魔鬼的王国，要求废除教会等级制度，取消修道僧，简化宗教仪式，取消社会不平等现象；10世纪初，在巴尔干半岛又兴起鲍格米勒派农民运动，反对教会的特权，要求没收教会财产……。

从中世纪西欧史籍中可以看到，从10世纪

下半叶起，在意大利、法兰西、法兰德斯、德意志都出现了农民和城市市民反对教会的活动。公元970年，意大利中部的拉温那有一个叫维尔加德的人，向人们宣传反对教会的信条，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们或被处死，或遭严刑，结局十分悲惨。公元1000年，法兰西的夏龙地区的一个农民勒塔德号召农民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他还冲进当地教堂，把十字架和耶稣像砸得粉碎。结果，勒塔德被逮捕，以异端罪名处死。

更令教皇不安的是，在法国奥尔良，竟然有10个低级神甫，听信一个“乡下人”的宣传，完全否认救世主基督的存在。教会大怒，毫不留情地将这10个叛逆分子绑在火刑柱上予以烧死。

教会和世俗封建领主为扑灭异端派运动可谓煞费苦心。但异端派仍是层出不穷。据记载，11世纪上半叶，从法兰德斯到意大利的广大土地上，到处都现出了反抗罗马教会的“异端”运动。其攻击的目标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教会的腐化及罗马教皇的无上权威。当时的修道僧学者以无可奈何的感情记述道：

“那些本来无知，又笨口拙舌的人们，一旦参加这种谬误，立刻就变得比最有学问的公教

徒还滔滔不绝，能说善变。”

“这些该死的人们(指异端)，每天都在向乡下人散播他们的谬误理论，使更多的人追随他们，使主教忧虑。”

“当他们被押到主教面前时，为首的侃侃而谈，任何问题都对答如流；同时，他完全准备受各种酷刑，仿佛以此为乐似的。”

“在主教指示下，地方贵族点燃起大火堆，旁边立起十字架，把所有异端分子带出去，让他们选择：如果他们放弃异端，敬崇十字架，承认全世界都信从的公教信仰，他们便能得救；否则，便把他们扔进火堆，活活烧死。结果，有几个人走向十字架，承认公教信仰，而其余的许多人却以手掩面，纵身投入火焰之中。”

进入12世纪后，城市逐渐成为西欧经济的中心，市民与教会及封建领主的冲突日渐尖锐。最能表现这种尖锐程度的便是公元1112年法国的琅城市民起义。

琅城是法国北部最富庶的城市，交通发达，商业兴旺。公元1106年，琅城市民利用主教不在的机会，与他的代理人缔约，以一笔巨款换取了琅城的自治地位，并成立公社，以摆脱教会主

教的贪婪之手的控制。随后，市民又以巨额献礼，使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批准了公社的成立。然而主教很快就花光了市民交纳的款项，而决定撤销公社，又贿赂国王废除公社的自主权，以便重新勒索市民的财富。琅城市民十分愤怒，群起攻击教堂，与主教和手下的骑士进行战斗，结果在教堂地下室的酒桶中抓住主教，用斧头劈死。法国诺尚修道院院长于贝特在《自传》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凡是走过主教尸体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向尸体投掷石块，不谩骂他的。……主教的尸体赤裸裸躺在地上，好象一条狗的腐尸一样。"

在这种激化的形势之下，异端运动在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发展至高潮。其矛头由反对教会人员的贪婪残暴、腐化堕落发展为反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宗教仪式，如婴儿受洗、敬拜十字架，否认领圣体仪式的酒饼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有什么神奇的赦罪功效；不信地狱，也不信来世；不信所谓的"圣徒"，甚至否认耶稣是童贞女所生。

斗争的方式日趋公开化。12世纪初叶，法国勒曼地区的异端运动领袖享利，在城市乡村

进行反教会宣传。他抨击原罪说，斥责神职人员的腐化，号召人们不要向神甫忏悔。在他的鼓动下，许多人不进教堂，不向神甫捐献，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商人们也拒绝向神职人员出售货品。

在意大利，12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异端运动领袖是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的学生阿诺德。他青年时期在伯利霞城当修道士，由于猛烈攻击教会的腐化，被教皇革职、逐出意大利。到法国师从阿伯拉以后，阿诺德继续宣传，揭露教会和神甫、修曾僧的罪恶，又被驱逐出境。公元1145年，阿诺德回到罗马，又公开斥责红衣主教团是"一伙偷窃犯"，教皇只是靠火刑和刀剑来维持权威，压迫无辜人民，掠夺别人的钱财以饱他的私囊；教皇既不叫人顺妥，也不配受人尊敬。他还认为，罗马城应恢复元老院，改变教皇一人独断的状况。这些思想深为群众所接受。一时之间，群情激愤。众人捣毁红衣主教的官邸，痛打红衣主教，吓得教皇和主教们都不敢公开露面。

1155年，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进军罗马，受教皇哈德良之命将"叛逆"阿诺德逮捕，处以绞

刑，把尸体焚化，骨灰撒入台伯河中。阿诺德死后，其追随者继续活动，称为阿诺德派，长期坚持斗争。

12世纪中叶，法国列日城主教向教皇报告异端运动兴起的形势时说：

“从审讯异端分子获知，在整个法国教会，都与我们本教区一样，受到异端谬误的相当毒害。”

公元1145年，修道僧贝尔纳在巡视了异端运动最活跃的地区——法国南部的土鲁斯之后，悲哀地感叹道：

“教堂里没有信众，信众没有神甫，神甫没有威信，教徒没有基督。教堂不再被认为神圣，圣事也不被认为神圣，节期无人遵守，儿童不受洗礼。”

贝尔纳秘书的叙述更令人沮丧：

“为死者祈祷献捐受到嘲笑，兴建教堂受到反对，教会的圣事和神职人员受到怠忽。一句话，教会的一切制度都受到攻击。”

面对如火如荼的异端派运动，罗马教会惊恐万分，决心以武力和酷刑来予以镇压。公元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召开第三次拉特兰

宗教会议，动员全部西欧教会的力量来镇压异端。公元 1198 年，英诺森三世登上教皇宝座后，立即着手镇压异端。首要的打击目标便是土鲁斯地区的阿尔比城。

阿尔比城是信奉教会异端鲍格米勒“卡塔尔派”教义的群众的聚集地。这一派的神学思想主要反映了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反封建的要求。他们认为，天上有善、恶两种神在交战。地上的一切都属恶魔，人的目的就是要从世界的罪恶中解放出来；他们公然宣称罗马教皇是魔鬼，要坚决打倒罗马教会；他们还否认地狱、炼狱的存在，不信洗礼和弥撒的作用。到 12 世纪末，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已超过罗马教会。故而教会对阿尔比城恨之入骨。

公元 1206 年，英诺森三世亲自指挥十字军骑士攻入土鲁斯地区，大肆烧杀抢掠。当十字军攻陷土鲁斯的要塞比塞埃后，对城中的居民不管其身份、年龄、性别，一律不饶。死于刀下的约有 2 万人。整座城市，顿成人间屠场。这场屠杀持续了 4 年才结束。大批的阿尔比信徒被处以火刑。

除以军事手段对付异端外，教会还专门成

立了异端裁判所，交多明我修会和方济名修会的修士们管辖。依照公元1252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手谕，凡被控告为异端者，将受到严刑拷打、秘密审讯，或火刑处死。

异端裁判所制定了严酷的审讯条例：

(1) 在法庭上，被控告的人不能知悉控告人和见证人的姓名。

(2) 任何人（包括罪犯）都可以充当控告人和见证人。有两人作证，控告即可成立。证人如撤回证词，作异端同谋犯处理。

(3) 被控告人如不承认犯有异端罪行，可反复用刑讯问，不仅要他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要检举同伙和可疑分子。

(4) 一切有利于被控告的人的证词都不能成立。任何从事有利被控告人的活动，都要予以最严厉的惩罚。

(5) 任何人对被控告人给予法律援助或为他请求减刑，即予革除教籍

(6) 被告可以不经审讯便予以处死；凡承认犯有异端罪行者，量刑处以鞭笞、监禁以及终身监禁等处罚。

(7) 被告认罪后，如又翻供否认，即不再审

讯，予以火刑。

（8）被判异端者，没收全部财产。

这个教会异端裁判所，前后存在近 500 余年。以镇压异端闻名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先后对 38 万异端分子予以判刑。

但这并不能阻止住教会的衰落。自进入 14 世纪以后，教会便在各种新兴力量的打击下从权利的宝塔尖下跌落下来，急剧衰落了。